



我心目中的 十字架

——思考是种享受

赵鑫珊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思考是种享受 / 赵鑫珊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ISBN 7-200-06390-8

I. 我…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9279 号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思考是种享受

WO XINMU ZHONG DE SHI ZI JIA

赵鑫珊 著

出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印装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16

印张 13.125

印数 1-8 000

书号 ISBN 7-200-06390-8 / I · 944

定价 2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目录

CONTENTS



1 本书的缘起——序

【第一章】

9 笛卡儿直角坐标

17 命运

32 理性和感情

34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37 黑与白

68 钢筋和混凝土

70 骨骼和肌肉

【第二章】

74 钢琴和乐队

79 势能和动能

81 红灯和绿灯

82 限制和自由

93 原因和结果



114 入世和出世

117 慢节奏和快节奏

【第三章】

126 两重人格：我和俺

【第四章】

160 自然律和道德律

【第五章】

180 男人和女人

185 身与心

187 时间和空间

201 我敬畏，故我在——结语



思考也是一种享受，
而且还是一种最广大、最深沉和最自由的享受。
谁也不能剥夺我这份崇高、纯粹、干净的享受。
当年的“文革”也不能，那时我被关在“牛棚”，因为我
从阶级队伍中被清理出来。

—— 题记，2004年9月于
卢森堡一家临街露天咖啡屋



这是卢森堡一家临街咖啡屋。
我坐在这里，一来歇歇脚，二来把一大堆感觉印象记在《旅欧日记》本上。《我心目中的十字架——思考是种享受》一书的提纲便是这样一点一滴列出来的。

献 辞

谨以此书献给好学、深思、明辨的青年一代读者！

人需要一个个结实的惊叹号来滋养。

从一些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事物中见出、听出一个惊叹号来，

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学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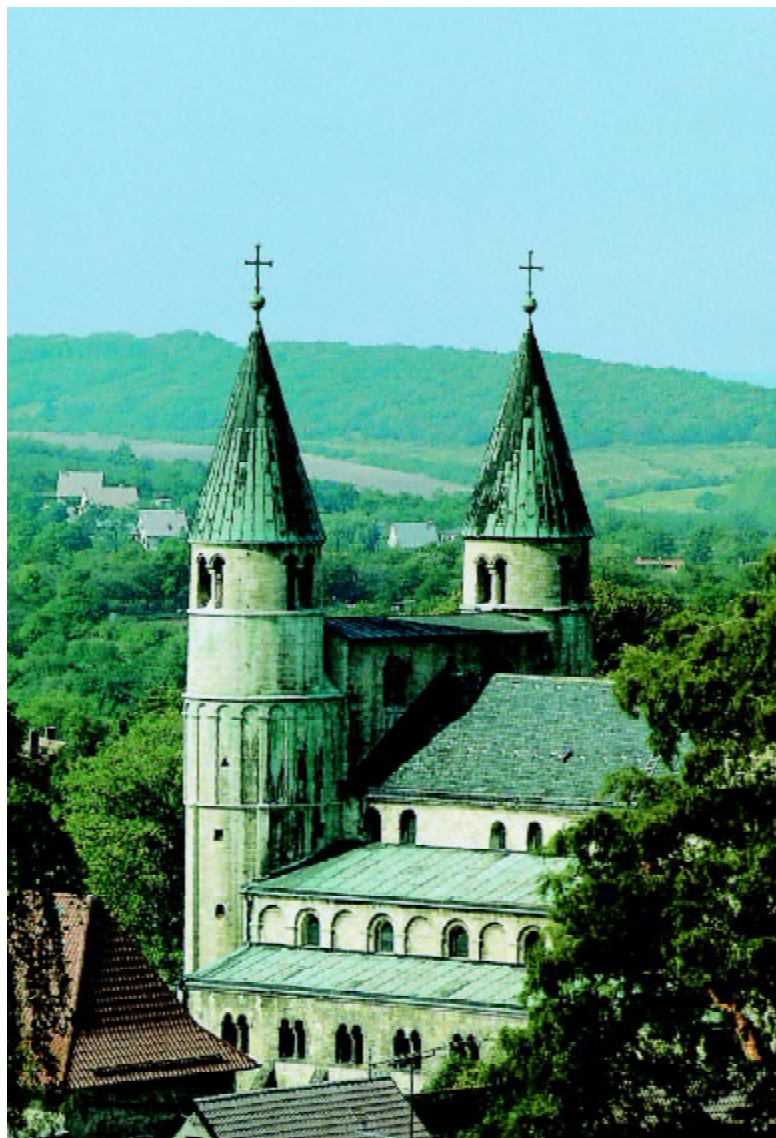
没有惊叹号的人生是枯井无波、死水一潭的人生。

这种人生即便有 90 岁的寿命也不值得一过。

惊叹号越多，越大，越重，生命质量也越高。

其实，初恋和失恋便是两个大大的、重重的惊叹号！！

你能忘却？



欧洲古老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

路过这里，我总是习惯仰头看看它，观照它，琢磨它。

从一开始，我就背离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符号，自有我的理解。渐渐地，日积月累，便形成了“我心目中的十字架”，同教堂十字架完全是两码事。于是才有了读者手中这本书。可以说，这也是1988~2004年我四次造访欧洲的一大收获。我感悟到太阳底下有新事。

本书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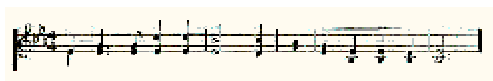
——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

自 1988 年我首次访问欧洲以来，至今总共有过四次出访，对我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非常有益。

在诸多深刻印象，教堂、墓地的十字架是其中一个。我知道，它是基督教信仰的符号。在西方文明之旅的历史进程中，大约有七个符号最重要

1. 西文字母A,B,C……
2. 十字架
3. 阿拉伯数字,0,1,2,3……(据说最早是从印度和阿拉伯传入欧洲，后经欧洲学者加工、完善，最后才定型) 电话、手机号都是它。当然远不止这些。
4. 古希腊建筑柱式语言
5. 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6. 微积分符号: $F(y) = \int_0^y f(x, y) dx$
7. 乐谱记号



如果拿掉这七种符号，西方文明大厦顿时便会轰隆一下坍塌，不复存在。

也正是这七种符号把东西方文明明显地区别开来。



西文 26 个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也是代表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符号系统



古希腊神庙和它的柱式。

后来，这类柱式便成了西方建筑风格一个有代表性的符号。

16~19 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扩张，开辟了广大殖民地，并把西方文明带到了那里。其中最醒目的两个标记或符号便是十字架和古希腊柱式建筑语言。



柏林一座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古希腊柱，辛克尔，1816~1818 年。

这种柱式成了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符号。今天的欧洲城市若是没有这种柱式的古典建筑，便觉得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文化底蕴，市民会抬不起头来，为自己所生活的这座浅薄的城市没有教养而脸红。

在欧洲城乡，我经常到处漫游，闲逛。教堂是绕不过去的。有教堂，必有高高尖顶上的十字架耸立。遇上天高云淡，或有团乌云久久停留在十字架的上空，这时恰好又有几只点碎夕阳天的乱鸦掠过教堂屋顶，我便会抬头看着那个无言的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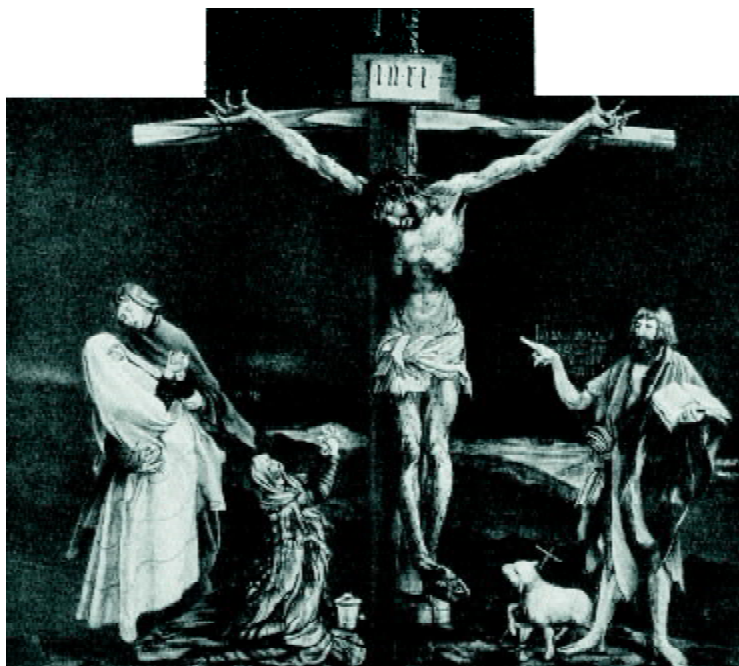
若是正好碰上教堂在缓缓悠悠地敲响起钟声，我便会情不自禁地坠入沉思状态：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汉代，贾谊《过秦论》）

渐渐地，日积月累，即形成了“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每每有点滴体认和领悟，便写在随身带的《旅欧日记》本上（至今已有三册）。

按我的理解，十字架是由纵轴、横轴垂直交叉而成的一个笛卡儿直角坐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1511年，尼特哈特。

十字架原为古罗马帝国的残酷刑具。基督教相信，耶稣为了替世人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故尊十字架为信仰标志。

今天，我只是把这个符号接过来，成为我手中的一张网，试图囊括人生世界纷然杂陈的万千现象，使之秩序井然，便于我们理解。

标系。

宇宙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个十字架。这是原（元）十字架，大十字架。其他的所有十字架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

其他的十字架计有：男女、善恶、战争与和平、静和动、东方和西方、电与磁、微分和积分、命和运、个人与社会、脑和手、自然律和道德律、对称和不对称……

其实十字架是个特大的“空筐”，我把许多事物经过梳理、归类之后都放了进去，还填不满，永远也填不满！

所谓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创造性无非是用非同寻常的方式（或法则）将普通的信息（事物）整合成一个有机体的过程，该有机体又叫秩序。

于是便有了读者手中这部书稿——它是诸多学科交叉的集合。

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有过“十字架”这个观念，只是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没有用“十字架”这个说法一语道破。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

在中国哲学中，阴（纵轴）和阳（横轴）交叉是最高、最古老、最伟大，也是最普遍存在的一个十字架。

“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吕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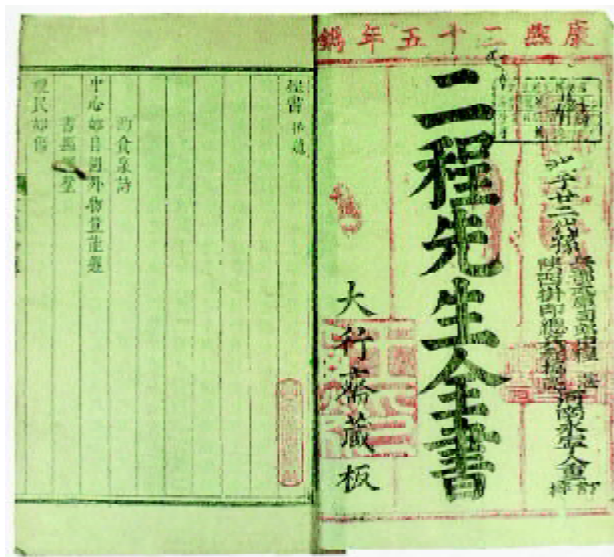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庄子》）

意谓：能够明白自然大道之理，又明白人的种种作为，便达到了认识的极至。

这里提出了人类认识自身和大自然的一个十字架，文理两科交叉。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

意谓：生与死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它好像昼夜不停地运行，是自然规律。



《二程先生全书》，宋代程颢（程明道）、程颐（程伊川）著。

这里，生和死交叉又是一个十字架。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

祸福交叉是人生一个怎么也挣脱不掉的十字架结构。

十字架即笛卡儿直角坐标，祸为纵坐标，福为横坐标。

宋代哲人程伊川（1033~1107年）已经领悟到了（只是没有直接使用“十字架”这种说法）人生世界对立统一的构成：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语录十五）

“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

程明道（即程伊川的兄长）也说：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语录十一）

程明道说没有安排，其实全是造物主（大自然上帝）一双无形的手的巧妙安排，精心安排。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语录十一）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很形象描述了哲人灵感闪烁，领悟了人生世界



河南伊川二程祠庙。兄弟俩均为宋代著名理学家，其学说被称之为“洛学”。

我把这张图片放在这里，是为了表明“我心目中的十字架”的学术渊源之一——洛学。这叫“先生滴水之恩，学生涌泉相报”。

构成大法的狂喜。的确，思考是种享受。

可见，隐隐约约有个“十字架”像条红线，贯穿了整个一部中国哲学史，令我惊讶，深思：

是人生世界原就有这个十字架结构，抑或是人的思维能力把这个十字架赋予了人生世界？人是“十字架”的制定者吗？

最近几年，我有了这方面的一些体认和感悟，心中也有手舞之、足蹈之的喜悦，所以才决定借来“十字架”这个简易、醒目的符号外壳或空筐为我所用，并将它作一详尽展开，深入推广，并赋予它时代丰富、结实的内容和戏剧性色彩——这便是我的“推之其远乎”。

2004年9月，秋高气爽的一天下午，我在波恩附近的莱茵河岸边散步。在一棵大树底下，我看到地上散落一些干枯的树枝，我突然灵感一闪，捡起两根如大拇指粗细的枝条，带回德国书房，自己动手做成一个小十字架。于是便有了上海浦东书房挂在墙壁上的这个具有空筐结构的符号，最后引出了这部书稿的构思和写作。

在我手中，十字架是个大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渔夫撒下这网，是哲学性质的潇洒走一回。

从表面看，是我写十字架。实质上是十字架塑造我，拔高我，给予我“浩然之气”：

“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明代，吕坤）我明知达不到，但可以努力，努力走近目标。

努力总是可以的吧？

谁也不能阻拦一个人朝纯正目标去努力。上帝也不能！

上帝暗中鼓励我去猜测他建造、构筑世界的总方针和最高法则。

写到这里，我真想抱头痛哭一场：

人生世界为什么总是呈十字架结构？比如有聚必有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有来必有去……

为什么会有“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

哦，没有回答。因为那是上帝的绝密。

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至道绝言。”

2005年5月4日深夜两点



这是我在德国莱茵河地区乡村、我的朋友米歇尔屋子里的一张床。我特别偏爱斜屋顶底下的建筑空间，尤其爱听9月的落叶动秋声。这时候，我便会动情，再次追问“时间空间”这个十字架结构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因为1993年我也是睡这张床。相隔11年，我又回到这里，能不感慨万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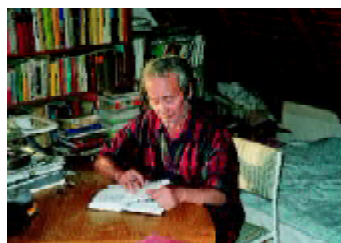
德国邻居说我老了不少，原先是黑发，现在是白发。从黑到白，是时间准确的度量吗？

我在德国斜屋顶下书房兼卧室读书和写日记的情景。

屋里的藏书约有1000本，其中一半是米歇尔的父亲遗留下来的。人一死，什么也带不走。

人的一生，匆匆来，匆匆去，活动的舞台不在时空这个十字架之外。每个人都被钉在这个无处不在的十字架上。人死后，还跟时空这个十字架有关联吗？

我的有关死亡的定义是：死亡就是摆脱了这个十字架。人活着就是人同时空十字架发生种种关联的一连串的故事：何时，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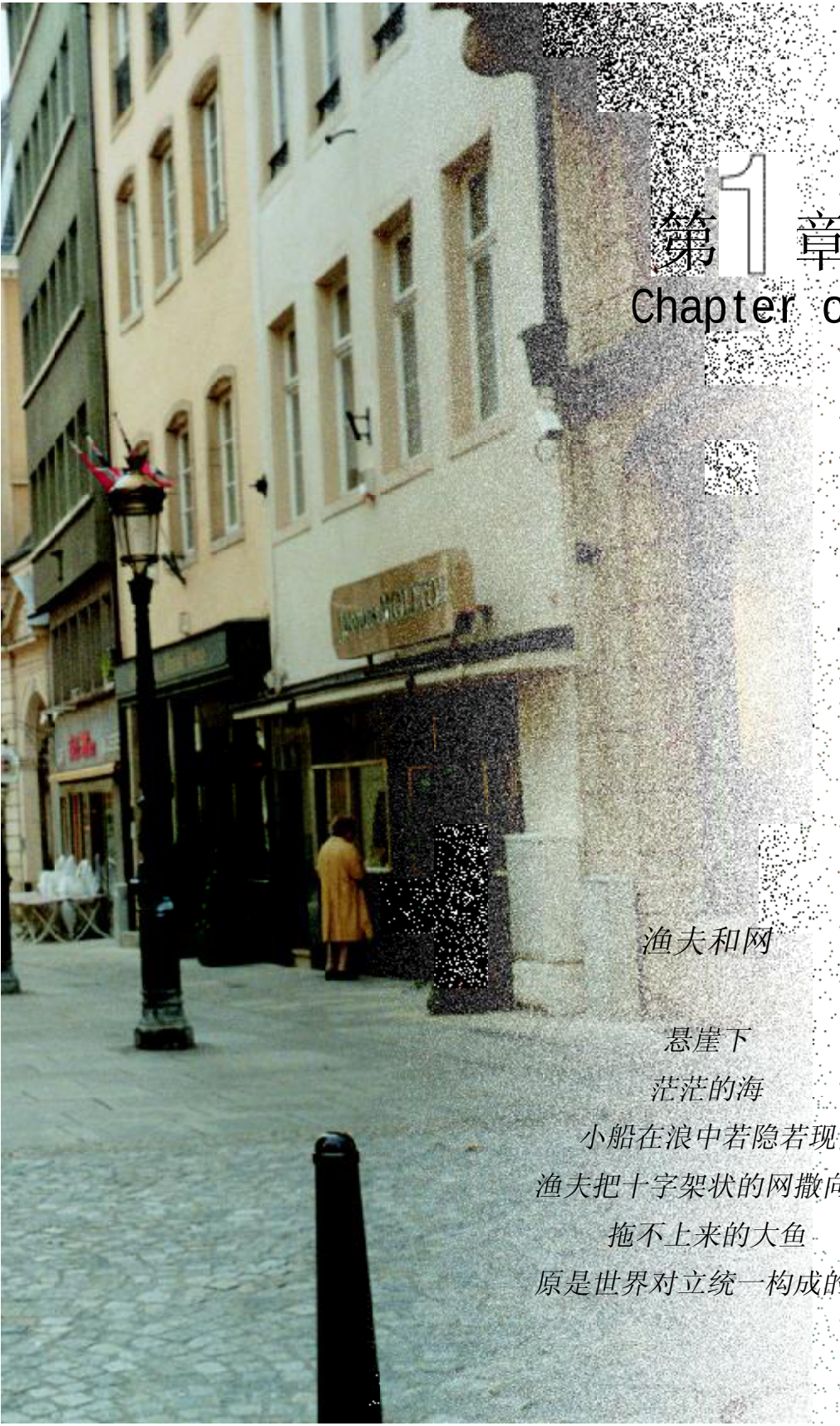
这是我在上海浦东十字架书房（仅10平方米）写作的情景，2004年11月8日。

右手墙壁上方的小小十字架是我自己动手用两根枯树枝制成的，材料是我从德国莱茵河岸边捡来的。

十字架于我既是一个艺术标记，更是一个哲学（世界哲学）符号。它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日夜都在拓展、拔高我的胸襟、志气和灵魂状态。

于是我决心把这个符号，这个象征，写成一本书。





第1章

Chapter one

渔夫和网

悬崖下

茫茫的海

小船在浪中若隐若现

渔夫把十字架状的网撒向前

拖不上来的大鱼

原是世界对立统一构成的链

笛卡儿 直角坐标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黄金十字架 纵坐标和
横坐标垂直交叉，具有囊括天地间万事万物、
无时不在变化的世界的伟力。

——2004年秋于德国哥丁根大学

如果要我推选人类科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十项成就，我会投“笛卡儿直角坐标”一票，当然还有电磁理论。

高中生都读过法国人笛卡儿的这一绝妙发明，但有关它的方方面面的含义（尤其是深层含义），并不是人人都一清二楚的。

首先，我想在这里介绍笛卡儿（1596～1650年）其人及其在解析几何方面的成就。

笛卡儿年幼丧父，并继承了一笔遗产，使他一生免去了衣食之忧，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去从事自己乐意去从事的活动——在我看来，这对他一生取得许多伟大成就是很关键的，也是自由的大前提之一。

闲暇永远是从事科学、艺术和哲学活动的前提。

在这一点上，笛卡儿非常幸运。

他从小时候便对人生世界一些现象充满了好奇心和惊叹。这是他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禀赋。八岁那年他进了耶稣会学校读书（相当于我国明代万历末年）。由于他从小体弱，校方特允许他不受校规约束，早上可以躺在床上，直到他自己愿意起来，走进教室。这样，他便养成了清晨躺在床上琢磨问题的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他老死。

只有静悄悄地一人躺在床上，他才会灵感附身，白日梦一个接一个地萦怀，这叫静者多心妙。在这种灵魂状态下，他才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

“我思，故我在。”

的确，他不仅把思考看成是人生的一种最高享受，而且还是他的唯一生存方式和存在本身。

“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关键词，而且是生死攸关的：

“人在大地上。”

“人在世上。”

“在”具有普遍世界的结构，每个人都不能疏离、更不能脱离“在”。
但每个人又有各自的、独特的“在”。

牧羊人说：

“我放羊，故我在。”

农民说：

“我耕作、收获，故我在。”

李白、杜甫说：

“我写诗，故我在。”

对于爱因斯坦，生与死的区别，仅在于他是不是在琢磨物理学问题“我琢磨时空、物质和力，故我在。”

对于某个权力欲很强烈的人，他的内心有句潜台词：“我手中握有权，故我在。”

一旦他失去了大权在握，他便会失魂落魄，丧失了“在”，仿佛是第一次死亡。

一个赌徒则坦率地宣称：

“我赌，故我在。”

以表演为生命的影视明星斯琴高娃则说：

“我演戏，故我在。”

可见，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他便是什么人。

这种划分三六九等人的方法比从经济、社会和阶级地位去划分具有更为普遍的世界性，因为这是哲学层面的分析。

交待完了这段插曲，我们才懂得笛卡儿那个命题的真正含义。

在数学领域，笛卡儿的野心是把逻辑、几何和代数三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抛弃它们各自的缺点，从而建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的一种新数学。他的独特思路是用代数方程去研究几何曲线，这样数学才结束了独脚的残疾时期，几何和代数成了两条腿，或者说，几何曲线是任何具有代数方程的轨迹。

笛卡儿的雄心壮志是企图通过坐标几何，把原先几何学中必须分别处理的情形用代数语言去作统一处理。（要害是“统一处理”）

笛卡儿发明的坐标几何（直角坐标）是可以一箭双雕的伟大工具。

或者说，坐标几何（其实也可以叫“代数几何”）为代数和几何的相互置换或“兑换”成为可能，而且非常方便！

坐标几何就好比是在五星级宾馆“希尔顿”的大堂设有外币兑换处，通

过很简便的手续，美元可以换成人民币，人民币也可以换成美元。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坐标几何给抽象的代数以几何直观形象语言的解释。

从古希腊到1637年，几何在数学中一直占统治地位，而代数是个配角。1637年，笛卡儿的《几何学》出版，科学史家认为这是解析几何（坐标几何）的正式诞生。在书中，笛卡儿提出“用不确定的”代数方程去表示并研究几何曲线。

笛卡尔的后继人、18世纪法国伟大数学家拉格朗日（1736～1813年）算是吃透了解析几何的真正含义。他说：“只要代数同几何分道扬镳，它们的进展就缓慢，其应用也狭窄。当这两门学科成对时，便会彼此吸取新鲜的活力。自那以后，它就以快速的步伐走向了完善。”

17世纪以来，西方数学有长足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笛卡儿的有关坐标几何的思路，即设立了一个“外汇兑换处”，美元与人民币相互兑换的手续变得非常简便：

在笛卡儿坐标系中，平面上每一个点，都完全对应于确定的一对坐标 x ， y ；反之，对应于任意两个数 x ， y （实数），平面上都可以找到一个完全确定的点。

x 便是横坐标， y 是纵坐标。

笛卡儿发明的解析几何把代数提升到了同几何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地位，这便超越了古希腊人。这样，数学才用两条腿（几何和代数）稳健、飞速地走路前进，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伟大工具，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到今天。要知道，农业文明不需要笛卡儿直角坐标，也不需要微积分。因为农业文明少变化，“运动量”少，工业文明的“运动量”多，变化大且复杂。

若用中国哲学去理解、把握， x 和 y 便是一对同时出现的范畴。

x 是天，是刚； y 便是地，是柔。

如果 y 是阴， x 即阳。

笛卡儿直角坐标系才真正、定量地体现了《系辞下》的这个命题：“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中国哲学企图用定性语言（哲学概念）去刻画、囊括天地万事万物的变化；

西方自然科学则用定量的数学语言去描述、把握宇宙万事万物函数的关系。只有定量的语言才能承担起工业文明的伟大工具。中国的阴阳、乾坤学说是定性的，成不了工业文明的工具。

直角坐标系是一个最伟大的大网。它和微积分一起，是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作准备的工具。这叫物质未到，思想先行。

你能想像西方工业文明可以没有直角坐标系这个简洁、直观的“十字架”吗？

在今天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等领域，它有着广泛的应用。

如果说，西方人是通过基督教的“十字架”去走近道德、伦理上的上帝，那么，自笛卡儿以来，他们则是通过直角坐标“十字架”和微积分去走近上帝的。

最后我想说，科学创造的要害常常是在两种看似毫不搭界的事物之间架设起一座简洁、绝妙的桥梁——这便是对立统一的结构。

直角坐标系即是很典型、很高超的一种。它是一个气魄很大、很宏伟的舞台，宇宙间万事万物惊心动魄的一些戏剧性事件变化都能在这个“十字架”状的简易舞台上得到生动、形象的刻画或描述。

在爱因斯坦手里，笛卡儿坐标的简洁性和绝妙被推向了极至。他有个命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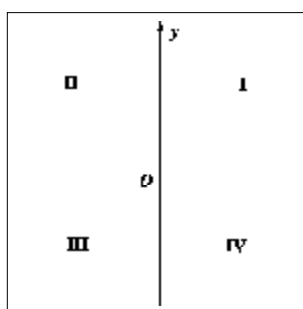
所谓世界就是空间·时间·事件的总和，全部物理事件都镶嵌在时空坐标中。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自然哲学概括的气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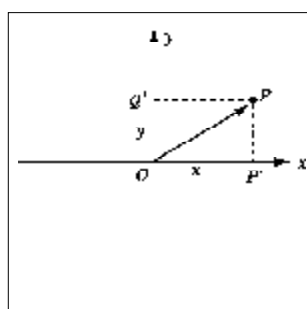
他用了“镶嵌”这个动词。

我则用“钉”这个动词。意思都一样。

时间是横轴，空间是纵轴。两者垂直交叉成了天下第一个十字架，元



直角坐标系的四个象限



用来刻画平面上任意一点 p 的位置的笛卡儿直角坐标系。x轴和y轴是一对固定的“对立统一”垂线。

(原)十字架，太十字架。

万事万物都钉在上面，无一例外。

笛卡儿直角坐标的伟力恰在于它具有空筐结构。

重要的是坐标本身，而不在乎它们代表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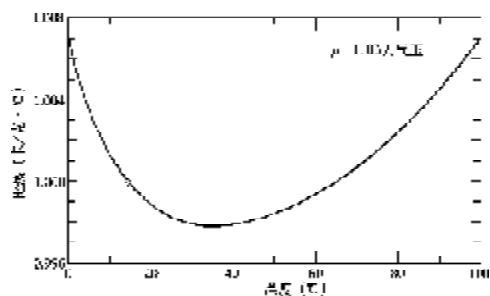
或者说，该坐标系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无形的、又大又深的空筐。至于你把什么东西（事件）放进筐子里，它都接受，都成立。

这些事件可以来自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和地质学，也可以来自历史、考古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工农业生产……

就这一点而论，笛卡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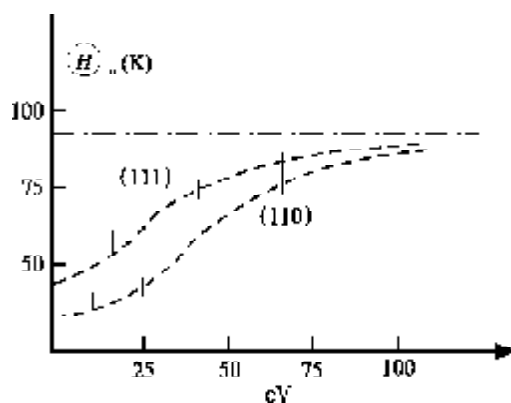
如果 x 和 y 都是正的， p 便在坐标系的第1象限；如果它们都是负的， p 在第3象限；如果 x 是正而 y 是负， p 便在第4象限；又如果 x 是负而 y 是正， p 则在第2象限。这样一来，这个“十字架”状的舞台便很广大、幽远、深远了。在本质上，这已经远不止是解析几何，而是一种哲学，一种高超的艺术或天下第一等诗。

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无时不在变化的世界，事物变化路线都是曲线。笛卡儿认为，全部物理学都可以归结到几何形象——这便是笛卡儿思路。



表示在1个大气压下水的比热随温度的变化情况，位于标度15℃处的小圆圈表明卡的定义。

表面德拜温度与电子束能量的函数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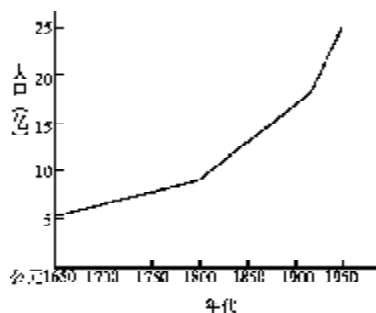


他既是一位进行哲学思考的数学家，又是一位进行数学思考的哲学家。

直角坐标系语言把这种非常复杂的函数关系用非常生动、形象的几何曲线表示了出来。青年时代在北大读书的我，便领悟到了坐标几何这种工具具有囊括宇宙万事万物的伟力。在我眼里，它同莫扎特音乐、西方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建筑艺术和我国的唐诗是等价的，都处在同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最高层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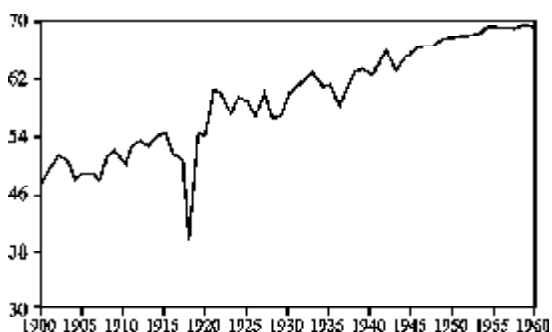
直角坐标系才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它才有资格堪称为天地之心，之声，之律动。对它，我只有满心赞叹！

1650~1950年这三百年间世界人口增长几何曲线



注意，是条曲线，不是直线。我们生存的这个无时不在变化的复杂世界的运动轨迹是曲线，不是直线。直线是曲线的一个特例，因为常量是变量的一个特例。

在数学家眼里，常量在数轴上的图形是一个定点；而变量在数轴上的图形则是一个动点——这种表述方式和看世界的视角对我的理性是一种震撼。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它同贝多芬音乐、唐诗一起，催我猛醒，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渐渐走上“世界哲学”探索之路，时间是从1957年冬至1961年夏，地点在北大。对于我的成长，这是决定性的三年半。



1900~1960年美国人均寿命值的变化。在这60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和医学科学的发达（比如抗生素的发明），美国人均寿命在逐年增长。不过1918年由于流感病毒引起的大瘟疫，美国人均寿命骤然降至大约39岁。直角坐标系上的几何曲线所指出的低谷非常形象地显示了这一天灾引起的严重后果。可见，笛卡儿直角坐标是多么有用的工具！

笛卡儿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这样说，他的直角坐标系是定量的“阴阳学说”。中国古代的“阴阳说”仅仅是定性的，不免空洞。

命运

“命”是经线，那么，“运”便是纬线。一经一纬，一阴一阳，一乾一坤，才编织了我们悲欢离合的一生。

——2004年秋于巴黎一家临街咖啡屋

“命运”是张无形的网，我们每个人都是网中的小鱼虾。要把“命运”这个哲学概念说得很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意味深长的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都有“命运”这个词。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商务印书馆）是这样解释的：“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 ”

解释得不好，不到位。不过难为词典编辑先生了，的确，很难用几句话把“命运”说清楚，也许能说得一清二楚的便不是命运了。

德文的“命运”是Schicksal。一本权威性的德文词典作了这样的解说：“人所遭遇到的一切。”

自古以来，“命运”这种人生现象引起了东西方大思想家的沉思是件很自然的事，中国哲学史上的“力命之争”便是一个例子。为了把这种现象说清楚些，特分以下几个小节：

一、明天人之分

战国末年，荀子提出了“明天人之分”这个课题。

这位思想家认为：天、地、人各有各的独特功能，不能相互代替：“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

说得很到位。直到今天，这个命题也没有过时。在我看来，它是有关“命运”的最好、最贴切的解说之一。

荀子的意思是：天有四时的变化，地蕴藏着财富，人则有治理（管理）事物的本领，人与天地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他强调在遵守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大前提下，人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主观能动性便是“运”）。

汉代董仲舒的著名命题“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其实是有关“命运”的一段解说。

“天生地养”是命；“人成之”是运。

“成”这个动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力的发挥。

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有“天人之争”，也就是“力命之争”。

“力”与“命”是中国古代哲学一对重要的概念，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力”即人力，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运”。

“力命观”即“命运观”。

主命者认为：人的一生祸福、寿夭、贫富、成败都是命中注定了的，是人力无法改变的。

所谓“天命”，即“天所赋为命”。

孔子是讲究天命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之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过孔子说，人要活到50岁才知天命）

孔子强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主力者则认为：人的一生贵贱、寿夭、吉凶、祸福、成败和穷达不在命，而在自己是否努力，在运。

不过孔子并不完全否认人的主观努力。正因为这样，他才数十年奔走于列国之间，推行他的政治哲学。

我赞成用“畏天命，尽人事”这六个汉字来概括孔子的“力命观”。这也是我的“命运观”，就是说，“畏天命”是经线，“尽人事”是纬线，正是这两者巧妙地编织才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所以我双手赞成这种说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样，心也很平，不去怨天尤人。因为孔子说过：“不怨天，不尤人。”这种心态不错。

二、关于命

命是自然冥运，为天理，非人力所制。

“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那么，我们应如何用当代自然科学的眼光去看待“命”呢？

比如太阳常数。

我们用它来表示太阳的辐射量。

太阳常数的定义是：在地球大气外距离太阳一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垂直于太阳光束方向的一平方厘米面积上在一分钟内接受到的所有波长的太阳总辐射能量。

目前太阳常数为1.96卡。

请读者注意这个数字：1.96卡。

它不仅是人类的命根子，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命根子。我们对它下跪，把它看成是上帝来加以敬畏，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太阳是地球的母亲，太阳若是打个“喷嚏”，地球便会“感冒”，“发烧”。

最近美国宇航局观察到，太阳辐射量有减少趋势。

的确，对太阳常数的观测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该常数猛然增加或大大减少对我们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太阳辐射变化的后果是引起地球气候的变化。如果变化很大，后果便不堪设想——这是天理，天命，非人力所制。

我们发现，人在这类天命（比如大地震）面前是何其渺小，无助！

再就是太阳超级耀斑爆发。

1976年有科学家指出，如果爆发，臭氧层会剧烈减少，紫外线辐射强度则会猛然上升，其后果是地球生物大规模灭绝。从地质的历史中，人们可以找到耀斑爆发留下悲剧性后果的证据。

这也是中国哲学讨论的“命”：

“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在“命”的面前，人只有无可奈何，仰天而叹：

“这是天意，是命！是命该我绝！”

遇上大地震、大海啸，我们只能这样仰天长叹。

若是地磁场极性发生倒转现象呢？

1963年，有科学家提出：地球历史上生物大规模灭绝同古地磁极性倒转有因果关联。

要知道，地磁场对太阳辐射和宇宙线有屏蔽、保护作用。在地磁场极性转换（正→负，或负→正）的过程中（一般是数年至数千年），磁场作用消失或大大减弱，太阳辐射和宇宙线辐射便可长驱直入，直射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动植物，结果导致基因突变，生物大规模灭绝。

这是“命”。我国古代思想家绝不可能知道“命”的这层含义！

当然，“命”还包括政治、社会领域。

比如，1920~1926年出生的德国男孩都是“命”不好的一代。因为他们的青年时期恰好碰上了纳粹发动的战争，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炮灰或战俘。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也是他们的“命”——能逃过“命中注定”的德国青年一代，毕竟是少数。

有一回我走进一座大坟场，有上百个小小的简易十字架，都是德军士兵

的骸骨。墓碑上刻的生卒有两个特点：

第一，都是死于1944年（也许还是同月同日）；

第二，都出生在1926年或1925年和1924年。

他们一出生便命中注定将成为二战中的炮灰。

如果希特勒在18岁考上了维也纳的艺术学院，不从政，不建立纳粹党，几百万德国青年的命运会改写。

1938~1941年，曾任德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说过：

“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这是无法逃脱的。”

“无法逃脱者”，即“命”。

和希特勒同时代的欧洲人（当然包括德国人在内）是不幸的，多数人都没有逃脱悲惨的“命”。

1969年前后，我国初、高中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去插队，全国一片红，也是无法逃脱的“命”，那是失去了理性的、有病的年代。而今天18岁的青少年则在考虑留学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翻开2005年3月21日的《新民晚报》，有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七八则广告。比如：英国Lancaster大学各专业介绍和入学要求；澳洲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招收高中、本科和硕士；美国大学上海招生面试会；还有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留学的信息。

今天的青少年是幸运的一代，因为他们的“命”好，碰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时代是“命”这个大框架的主要内涵之一。

对于一个立志做学问的书生，他一出生，便是命中注定了的。因为他将要接受的思想文化遗产是一次性给定了的，唯一确定了的，不能自由选择。

比如老庄说，孔孟学说——这是基本规定。当然，你有做学问的自由，但这是基本规定框架内的自由。你有背离、反对这些传统学说的自由。即便是推翻他们的学说，你也要先熟悉、精通了它们之后，你才能做到去推翻。

这才是一个人做学问的自由，也是做学问人的“命”。

在西方，你若研究哲学，哲学史上大思想家的遗产是一些基本规定或构成的大框架——这是你的命中注定——完全无视它，回避它，绕过它，是办不到的！

比如关于柏拉图的哲学遗产，接受它或反对它，都是柏拉图之后两千多年欧洲学者的“命中注定”。

有人甚至说，自他以后欧洲哲学的发展统统都是对柏拉图的注释——这可不是命好，是命不好。因为柏拉图把哲学该说的话几乎都说完了，没有给



这是2004年9月我在慕尼黑街头拍摄到的一景。
一群青少年在演唱德国民歌。他们是幸运的，生活在今天的德国。如果他们遇上了纳粹时期，命运肯定是悲惨，当然首先是给邻国制造许多灾难，然后是自己充当炮灰，也毁灭了自己。中国人写过这样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说得很到位，也是我撰写本章的整个思路）

后人留下拓展的、进取的空间。

今天学物理的人，他们的命是先接受牛顿力学、统计物理学、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然后再去开拓或创新。

即便是推翻这些遗产，掀起一场革命，你也要首先精通它们，掌握它们——这也是“限制与自由”这个课题。爱因斯坦有一段精辟的见解：“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才是教育。”

这既是有关教育的定义，也是有关人同“命”格斗的一种绝好的说法。不过有几个人能忘掉？忘掉就是战胜命。

三、关于运

按我的理解，“运”这个汉字即“力”或“人力”，也就是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比如，1969年前后全国有近千万青少年“上山下乡”，这在当年是不可改变的“命”。大多数人在农村是混日子，得过且过；少数人则想：既然外部环境（命）无法改变，不如调整自身的内界，尽最大可能弄些书来读。读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文学、数学、英文……凡是能到手的书都不放过。当时并没有想到将来知识会有什么用。

后来，高考恢复，少数坚持读书者便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今天，这些当年不自觉地用“运”，用“人力”，用“主观战斗精神”同“命”抗争的人们在许多领域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我本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1969年7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有上百名知识分子下放到辽宁五七干校，这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命”。

东、西羊圈各有一百来头羊要人去牧。大家不愿去，因为整天同羊厮守在一起，吃、睡都在山上的羊圈，太寂寞，心理、精神上受不了。

“赵鑫珊，你去东羊圈吧！”生产队长对我说。

“行！”

我不仅满口答应，而且暗中高兴，因为当时我不但不怕独自一人太寂寞，而且希望寂寞，更渴望孤独，享受孤独。是的，我渴望孤独，远离革命群众，逃避群众的监督。

哲学思考最需要孤独。

1965年我就在渴望两种职业：看守灯塔；放羊。

放羊六年，我系统读了高等数学（从微积分到微分方程，再到概率论）和理论物理——这对今天我的哲学思考非常有益。我是因祸而得福。

当年我虽然不能改变命，却牢牢掌握了自己的运。

每个人必须把“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我的人生总结。在这种意义上，我赞成这种说法：“性格即命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迎来了另一种全新的“命”。但每个人的“命运”是很不相同的，有些人变化不大，有的人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究其原因“运”的差异造成的，尽管“命”是同一个。

旅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是典型的例子。

“文革”时期，他是浙江湖州一名锅炉工。下班洗澡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放声高歌，自得其乐。那是上帝赐给他的一副金嗓子。有人听了他的歌声，建议他去报考杭州歌舞团。从此他便坚定地走在自强不息、自我奋斗的道路上。后来他又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经名师周小燕教授的指点，如今他

在世界歌剧舞台上成了一颗明星，主演了四十多部歌剧。下面有条链着实令我感动：

锅炉工→登上世界（西方）歌剧舞台

这条链成了有关“运”的一段最好注脚。

当然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命”。

没有“命”，也就没有张建一的“运”。今天，他说不定还在锅炉房，而不是在纽约、米兰和巴黎的歌剧院舞台上夜夜风光。

如果说，命运是一枚金币，那么，命和运便是金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

也许，“命”包括恰当的时间和地点(a right Time and a right Space)。

改革开放时期是恰当时间。湖州靠近杭州，杭州又靠近上海，这是恰当地点。如果张建一生活在山西太行山一个偏僻小山村，那么，他就很难走向西方歌剧舞台。

当然，“运”是“恰当的人”(a right Man)，它包括天赋和自身的奋斗。

所以每位杰出人物都是三条轴线的交点：

以有为之人，逢有为之时，据有为之地（三者缺一不可）。

这也许是对杰出人物“命运”的一段最确切的界说。

青年歌唱家廖昌永是“命运”编织而成的另一件杰出的“作品”。

廖昌永在周小燕教授的班上足足学习了八年多。他原是四川农村的一个穷孩子，七岁时接连死了父亲和祖父，家里没有男劳力，他从小便顶半个男子汉用，帮助母亲养鸡、喂猪、干各种农活；以后一边读书，一边干农活。因为上帝给了他一副好嗓子，他被上海音乐学院招考入校。这位说一口四川话的小伙子不仅钢琴、乐理、外语基础差，而且顽固不化的乡音难改，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不厌其烦地下功夫点拨，常为他开“小灶”。刻苦用功的廖昌永总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回课，进步飞快。1993年廖昌永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教授班上的研究生，并如期取得了班上第一个硕士学位。1994年，他在巴黎参加国际声乐比赛，用法、意、德三种不同语言歌唱，竟获得了最佳法语演唱奖，这是中国第一次夺得这个奖项。

1997年6月，廖昌永又获得多明戈第三届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中国曾多次派歌唱家参加歌剧大师多明戈创办的这项国际音乐赛事，以往最好的成绩是进入半决赛，而这次廖昌永得了第一名。多明戈对他说：“你唱得非常好，你的语言发音非常准确，而且感情的掌握也恰到好处。特别是唱《唐·卡洛》一曲，给你唱绝了。”多明戈好奇地打听廖昌永是在哪儿学的，到意大利、美国学习过吗？当得知廖昌永是来自中国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土生土

长的中国歌唱家时，他吃惊地又打听：“那你的老师是谁？”“我的老师是周小燕教授，她从前是在法国留学的。”廖昌永大声回答。“啊，你有一位伟大的老师，有非常好的训练体系！”多明戈赞叹地说。决赛之后，多明戈正式邀请廖昌永在下一年和他同台演出。

大家都在同一个蓝天底下、大地之上，为什么有的人会经历如此大的变化，而许多人却依然故我，原地踏步？其中主要原因除了天赋外，便是本人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运）的缘故。

去听听阿巴多指挥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吧！

其实贝多芬的一生和作品才是“命运”的一件最伟大的创造。

18~19 两个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命”（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他的音乐天才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为之人）是“运”。

这两者是一经一纬的统一体，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如果说，欧洲的 18 世纪是父亲，那么，19 世纪便是母亲。贝多芬正是这两个世纪时代精神的伟大产儿。在他身上同时兼有“父母双亲”的禀性和天赋，同时吐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于 18 世纪古典主义盛极难继、临近“山穷水尽处”，突起波澜，成为德国浪漫派音乐一代开山祖师，势不可遏，浩浩荡荡，凌跨群雄之上——这或许就是命运最善意的安排。

不要忘了，贝多芬从波恩来到了人杰地灵的维也纳。“据有为之地”这个轴同样很重要。如果贝多芬一直生活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结果又将如何？

命运注定要让贝多芬生活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正在经历剧烈变动的时期，地点又是维也纳；恰如命运注定要叫他双耳失聪、恋爱不断和屡遭失败，以及历尽人世间的种种烦扰和苦恼。所有这些饱更事变，阅历世途，当是一位天才、有作为的作曲家所能遇上的最佳“运”气。

他的左手紧紧握住“命”这根经线；

他的右手紧紧控制“运”这条纬线。

他编织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一生。

从 15 岁起，直到晚年，贝多芬从来就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1878 年，47 岁的贝多芬在信中写道：“我经常陷入绝望之中，并想了结我这一生。”

贝多芬的大半生都在同疾病作艰苦卓绝的搏斗。进入晚年（也不过 50 岁），他经常是彻夜咳嗽：“每天夜里不到三点我是不能入睡的。”肺炎、黄疸病和肿胀的身体常使他卧床不起。

在他身上，集中了好几个严酷的战场：



少年贝多芬刻苦学音乐的情景。石印画，1845 年。请注意图1，贝多芬年仅六岁，他的父亲便给他上钢琴课。因人小，够不着琴，只好站在一条长凳子上弹奏——这是他一生同命运搏斗最生动的写照。

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的“命运”是由他自己来编织的。这就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6 岁的贝多芬，剪影。

同外部世界（天地人神四重结构）搏斗；同自身，同“心中贼”搏斗；同艺术创作的神秘规律搏斗。（他的作品，常常是几易其稿）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身体状况很糟，他无法控制，无能为力，但是他能控制、支配自己的精神和思想。

总之，他身上是他同“命运”拼刺刀的腥风血雨的大战场。他只有先把握了自己，他才能把握世界，最后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不善言辞，也不善于用德文写作。他只有通过钢琴去诉说“Das kann man nur am klavier sagen!”（这只有通过钢琴才能

说出来）——这是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也说出了他的一生“命运”。

1801年6月29日，贝多芬在信中写道：

“我只有生活在我的乐谱中……就像我现在这种样子，我是三四首曲子同时一块写。”

这才是贝多芬的“运”的最好发挥，也是他同“命运”搏斗的最高方式。

其实，不仅人人会有命运，并成为命运的一件编织物，就是整个人类这个物种以及人类文明之旅同样是“命”和“运”的编织物。

“命”是直角坐标系的纵坐标，“运”则是横坐标。两者错综复杂的交叉便是七八千年人类文明之旅的轨迹——这是我的有关人类文明之旅的第一哲学原理。

比如照明技术文明的进步。

白天和黑夜的交替，长夜悠悠漫漫，是大自然的基本安排或规定，这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命”。野生动物只好服从，逆来顺受。人则不然，人对“暗黑的长夜”说声“不”，



1824 年的贝多芬，德克尔绘画作品。

三年后，即1827年他去世。

他同命运搏斗的一生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守仁）“亡我者，我也；我不自亡，谁能亡之？”（吕坤）

于是便有了灯的发明。

人发明灯的实质是冲破黑夜的努力；是对命的不满；是人的智慧和力量的显示——这正是我的“命运学说”中的“运”这个汉字的含义。

灯是为了延长白天，延长人的活动时间；本质上也就延长了人的寿命，提高了人的生命质量。“夜总会”、“夜歌舞”、“夜生活”……这些说法便足以说明问题。不过我更喜欢这样两句诗：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诗）

李白的诗句更好：

“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

我一生用过四种照明技术：

抗日战争时期，我读小学，在豆油灯下摹写“上大人”复习功课；

1946~1949年，在煤油灯下做作业；

1950年至今用电灯照明；

下放六年，常停电，我便点燃蜡烛，把羊圈一间小土屋照明，做了上千道数学、物理习题。寒夜，偶尔有狼的嚎叫声隐隐约约由远处荒山野谷传来，我便侧耳细听。

当时我已经懂得对桌上的蜡烛心怀感激之情。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符号，表达了人对“命”的不满。

三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间牧人土屋和微弱烛光晃动的情景。那里的时空，充满了人力，那是对命的双重抗争。没有当年的抗争，便不会有我今天的写作生涯。

一部人类文明史其实是人冲决大自然时空基本限制的历史。

此处“基本限制”即“命运”中的“命”，也就是“天命”。

此处“冲决”即“命运”中的“运”，也就是人力，即人的主观战斗精神，或人类文明。

关于什么是天然（即命），什么是人为（即运），庄子有这样的解说：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这也是有关“命运学说”的一个命题。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即人力，也就是人类文明。

一部人类医学史，是人对大自然安排、设计的诸多种疾病以及夭折（或短命）的抗争史。

医学史是由一连串的“不”构成的。

医学史是人类“命运学说”的生动记录，非常悲壮，可歌可泣，直到今

天，还有明天。

“非典”刚过去不久，我们不可健忘！自然界的候鸟面对禽流感只好听天由命，人却要抗争，较量。

早期人类出生后的寿命估计只有20~30岁——这是人的普遍命，是大自然的规定和安排，是真正的叫人“匆匆来，又匆匆去”。

这么短暂的寿命，能干什么？刚到而立之年，便要回老家，不是开玩笑吗？医学的起源是人对大自然给人的寿命的规定（20~30岁）说声“不”！

现代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我手头上有1891~1970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统计数字：

二战后，日本人均寿命大大提高，主要原因是：医学卫生的长足进步，生活环境（营养水平）的改善，没有战争。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日本的百岁老人将达到100万（目前为2.3万）。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肺结核死亡率的降低，是其中两大因素。可见，人在同疾病、寿夭的悲壮搏斗中，是大有作为的，这“作为”即“运”。

1800年（即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均寿命仅33岁。1997年，法国男性人均寿命上升为74岁。1995年美国男性人均寿命为72.6岁，女性为79岁。

预计2050年美国男女人均寿命分别为77.5岁和82.9岁。

在欧洲，目前西班牙人寿命最长：人均82.31岁；意大利人排第二，79.12岁；最末是匈牙利人的平均寿命为70.65岁，因为匈牙利人自杀率很高。那么，什么是自杀呢？我的定义是：人被命运击倒，而不是人战胜命运。在人生哲学中，当推自杀现象的哲学含量最高，因为这种情况的人同命运的冲突最尖锐，最后是人败下阵来。

据说，一个英国人去世之前，平均有7.71年是在健康不佳状态中度过的。西班牙人则有11.71年是在健康不佳状态中苦挨着时日。就是说，西班牙人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要挨过11.71年之后才告别人世，回归到永恒。

这种情况的时间拖得越短越好。

看来，西班牙人虽长寿，但去世前疾病缠身的日子太长，并不好，说明生命质量不很高。11.71年被病魔捉弄，何来人的尊严？何来生命的高质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生老病死”的永恒课题或处境。谁能例外？谁能逃脱？可见，人同命运的格斗是很复杂的。人均寿命虽然延长了许多，但在最后人还不是命运的对手。

我二婶60岁不幸中风，卧床10年，过了10年人间地狱般的日子之后才去世。这样的生命，有何质量可言？

19世纪俄国杰出海洋风景油画家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年),不断创作,面对黑海和波罗的海,同那里的波涛、蓝天、乌云、暴风雨、海鸥、渔船……对话,一生艺术成就为世人瞩目,喧腾众口。

83岁的一天,他照例在画布前抒发对大海的爱和理解。突然,心脏病发作,使他倒地,告别了人世——这才是生命的高质量。

四、神秘力量的安排

在我们一生中,谁也摆脱不了力量的捉弄和安排,这力量是我们的理智

	年代	男	女
明治	24-31 (1891-1898)	42.8	44.3
	32-36 (1899-1903)	43.97	44.85
	42-大正2年(1909-1913)	44.25	44.73
大正	10-14 (1921-1925)	42.06	43.20
	15-昭和5年(1926-1930)	44.82	46.54
	昭和10-11 (1935-1936)	46.92	49.63
昭和	20 (1945)	23.9	37.5
	21 (1946)	42.6	51.1
	22 (1947)	50.06	53.96
	23 (1948)	55.6	59.4
	24 (1949)	56.2	59.8
	25-27 (1950-1952)	59.57	62.97
	26 (1951)	60.8	64.9
	27 (1952)	61.9	65.5
	28 (1953)	61.9	65.7
	29 (1954)	63.41	67.69
	30 (1955)	63.60	67.75
	31 (1956)	63.59	67.54
	32 (1957)	63.24	67.60
	33 (1958)	64.98	69.61
	34 (1959)	65.21	69.88
	35 (1960)	65.32	70.19
	36 (1961)	66.03	70.79
	37 (1962)	66.23	71.16
	38 (1963)	67.21	72.34
	39 (1964)	67.67	72.87
	40 (1965)	67.74	72.92
	41 (1966)	68.35	73.61
	42 (1967)	68.91	74.15
	43 (1968)	69.05	74.30
	44 (1969)	69.18	74.67
	45 (1970)	69.33	74.71

数据来自《Science》，1998年4月17日。

无法穿透的。在“命运学说”中，它是我们最无法理解的一种超人的、隐蔽的因素，它在人力范围之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59军有位少校军官口袋里有两块银元。为了救济一村民，他把两块银元都送给了老乡。老乡说啥也不收，最后只收下一块，将另一块塞回少校的左胸小口袋（原先放在右胸小口袋）。

数小时后，少校率部同日军交火，一颗流弹射来刚好击中他的左胸小口袋，幸好有银元挡住，少校安然无恙。

1946年，我九岁，弟弟七岁。母亲把我们从江西宁都带回南昌。我和弟弟是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玩，形影不离。

那年春天，脑炎流行。弟弟不幸罹病，一星期不到便死在医院里。我同死神则是擦肩而过——这种现象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这只能是命运的暗中安排，非常神秘兮兮，说不出其中道理。

命运有双看不见的手，它一旦作了安排，人力是无法改变的。

这里我还想举个神秘兮兮的例子：

1927年出生在波兰的芭芭拉如今已年逾古稀。在她一生中曾12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安然无恙：

其中有四次飞机失事；七次车毁人亡的车祸；12次从大楼和楼梯下摔下来……

比如她两岁那年从五楼窗口落地，幸好地面上有一堆纸板，芭芭拉才得救。

今天的波兰人，谁也解释不了她曾127次死里逃生的奇迹！

五、我们每个人都是空间三条轴的交点

关于人的一生，我又联想起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这回是空间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横轴是命，纵轴是运，竖轴是神秘兮兮的力量（比如芭芭拉）。

三者空间相交于一点（比如点M），那便是我们（你我他或她）。

在本质上竖轴也属于“命”的范畴。

人能掌握的，只有一根纵轴（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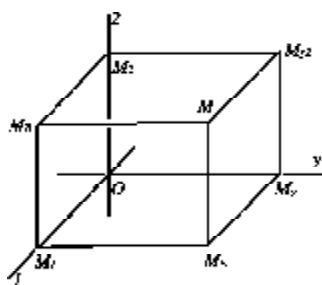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悲剧表明他是一位对“命运”进行思考的伟大诗人兼哲学家。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为“命运学说”作出生动、具体的注解，不管你是美国总统，巴西大农场主还是印度贫民，南非小学老师或关押在菲律

宾一座监狱里的犯人。

戏剧家、小说家是何许人？

他们是这样的人：用自己的笔，去编织、安排一些人物的惊心动魄的命运，当然不是随心所欲地编织、安排。这编织、安排要符合一些基本规律，这又是限制前提下的自由。



空间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我们每个人（从总统、元帅、亿万富翁到厨师、门卫和清洁工）都是纵、横、竖这三条轴在空间的一个交点。（比如点M）

不错，我们都生存在同一个蓝天底下、大地之上，但点M的轨迹和所在的位置却是截然的不同。

有关点M的轨迹及其所在的位置（高贵或低贱，穷或富），我们能有多大的发言权？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拥有决定权？

在作曲的时候，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自己说了算；但他们的寿命，却是他们自己不能支配、控制和掌握的。

最后我想说，能把“命运”说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的，就不是命运。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才叫“命运”。

这样，便为世界各地算命（看手相）测字这一古老职业留下了生存的地盘。据说点M会先写在一个人的脸上和手上，对此我总是半信半疑。困惑、茫然，是难免的。

理性和感情

在我们一生中，谁都挣脱不了由理性（经线）和感情（纬性）编织的这张大网，这个纵横垂直交叉的十字架。

这两者常常是对立的，但又必须统一。

按性质，理性是阳，感情是阴。

比如面对死亡，人很矛盾：

理性能接受死，感情却一万个拒绝。

如果人人有 500 岁的寿命，不是很腻味吗？看来，死是最后解脱。

1952 年爱因斯坦的妹夫去世，爱因斯坦在信中谈起死亡：“个人的生命，连同他的种种忧患和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了结，到底是件好事。本能使人不愿接受这种解脱，但理智却使人赞成它。”

由此可见理性同感情（本能）的冲突、矛盾。

三年后，即 1955 年，爱因斯坦逝世。

和谐、完美的人生应像个“钟摆”，来回在理性和感情这两端作不断的摆动，求得平衡。

在理性那里待得太久，人会冻僵；在感情那里待得太久，人会烧焦。

所以许多年，我一直在努力做个“钟摆”来回在理性和感情这两端之间作不断的摆动，寻找平衡。

2005 年是我懵懵懂懂踏上探索“世界哲学”之路 50 周年的日子。自 1957 年冬天到 1961 年夏天我毕业，白天弹钢琴，读数学、理论物理和哲学，晚上则去北大朗润园聆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或者，晚上欣赏巴赫和肖邦的曲子，翌日则跑到物理大楼去攻读“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

好几年，我经常独自一人溜到圆明园废墟、荒野中去闲逛。渐渐地，我才明白，圆明园是我反刍从外部世界接受到一大堆珍贵信息的好去处。

数学、物理学和地质学是理性；音乐、诗歌和绘画是感情。

我的哲学构成应当像个钟摆，来回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在文理科之间，不断地摆动，求得平衡。

哲学因为接近科学才可信；

哲学因为亲近艺术才可爱。
既可信又可爱的哲学才是我们追求的好哲学。
今天，我还走在这条路上。
哲学就是在路上。
科学、艺术也是在路上。
因为人生于斯就是在路上。
人在路上，人在旅途中。
理性和感情共同编织了人生之旅。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一个男孩（A）使劲用右脚踢开一扇门（B），小孩A对门B的作用力使门加速运动（门开）。与此同时（瞬时）门B对小孩A的等值反向的作用力使小孩的右脚减速运动。小孩脚有疼痛的感觉——这是反作用力的后果。

好几千年，无数大人和小孩都有过这种经历，但只有牛顿从中总结出了一条定律：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力。

永远是成对出现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这使我又一次想起我国宋代哲人程伊川的命题：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

毕竟这个命题相当空洞，它理应得到现代科学大量事实的有力支撑和证实。

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牛顿把力的成对出现写成牛顿第三定律：

对于每一个作用力，总是存在着一个等值但反向的反作用力；或者说，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牛顿指出了定量关系。中国哲学只有定性的关系，而且忽视了力的成对出现）

大自然的结构或构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在更深人静、西风撼窗的寒夜，牛顿一定追问过这个根本性的自然哲学问题。

想必爱因斯坦也问过。

不过追问又有什么用呢？会有水落石出的答案吗？

这是个形而上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人类，也许有三类问题：

1. 可解的问题
2. 不可解的问题
3. 介乎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问题。

形而上的问题便是属于不可解的问题，它只能被我们一代代人不断地提出来而没有最后的答案。

也许我们只能把它推到造物主那里，说：

力的成对出现只能是出自造物主创造世界的总方针、总设计和总安排。
生与死也是如此。

20 世纪美国伟大的科学家冯·诺伊曼在量子力学、数学、计算机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在母亲临终前，他对母亲说：

“上帝也许是存在的，解释许多事物，‘如果存在’要比‘如果不存在’来得容易。”^①

关键问题是：

谁是上帝？什么是上帝？

当然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上帝就是上帝。

上帝在人类的语言之外，人类的语言无法谈论它。

凡是人类语言够不着的问题都是形而上的问题。其中当推“什么是上帝”这个问题为最，为核心，为形而上的源头。

只要把心静下来，除去红尘滚滚的浮躁，我们便会发现形而上的问题有一连串：

圆周率（ π ）的值为什么是 3.14159……，而不是 4.14159……？

如果是后一个数值，我们所在的世界会是另一种样子。

为什么 π 值小数点的后面没有尽头？目前的记录已经到了 515 亿位！

π 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把它推到上帝（造物主）的尊前。

π 及其值是出自造物主的安排和设计。

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也是造物主的设计和安排。

若是地球太靠近太阳，地球会烤焦，人活不下去；若是太远，地球会冻僵，人也活不下去。

地球上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了地日恰到好处距离的缘故。

直面形而上的问题，我们只有沉默并加以深深地敬畏。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才说：“至道绝言。”

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成对出现却是件大好事。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作用力的单独出现，没有反作用力，那情况又会怎样？

首先，我们的双腿会迈不开步，走不了路。因为我们走路的力学机制是先用脚底板给大地施加作用力，与此同时，大地也给脚底板一个反向等值的

^①自《U.S. New & World Report》，1998 年 8 月号。



力（反作用力）推动我们向前运动。

再就是火箭的发射。

火箭燃料燃烧时产生的气体以很高的速度从喷嘴向后喷出，结果把火箭本身推向太空——这便是反冲原理的应用，否则“神舟六号”发射就不可能。

看来，对立统一法则是我们生存于斯的最根本、最普遍的世界状态之一。

——这才是我在本书稿中最想吐露的一句话。

黑与白

这些年，每当我欣赏黑白木刻插图，就仿佛会听到木刻艺术家的一句豪言壮语久久回荡在艺术世界的山谷，越过高峰，掠过荒原：“给我黑线条和白线条，我便能编织出一个世界！”

我偏爱这个对立统一的审美世界。它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神”和“气”：神变则气妙，神深则气静。

——2005年春日

这两种最常见，最不张扬的颜色放到一起能做什么呢？能有什么作为？

黑白好像是水火不相容，完全对立的：“颠倒黑白”这句成语便足以说明问题。但是黑白相互结合又是一个统一体，给人信赖感，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白纸黑字”这个成语即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哲学的太极图是用黑白构成的。更妙的是白中有一个黑点，黑中则有一个白点，这叫对立统一。妙！

可见黑白组合在一起可以大有作为。

其实木刻是用另一种语言写下的“白纸黑字”，它能说出许多人生世界的事件。

黑线条和白线条交叉、排列组合构成一个十字架便能包容、陈述人生世界中的许多富有细节魅力的事物。我指的是木刻（THE WOOD ENGRAVINGS）。

我尤其喜欢英国的黑白木刻，木刻艺术令我着迷，而且迷了许多年。

20世纪前半叶英国杰出木刻艺术家吉宾斯（Gibbins，生于1889年）给木刻下过一个定义：

“木刻的本质就是在黑上面放白。”^①

（Wood engraving is essentially white on black）

也可以说是把黑放在白上面。

也许更准确、全面的说法是：

木刻艺术是黑白线条语言按照一定的、自身特有的语法（法则）交叉排列组合构成一幅简洁的画面，力图去陈述人类最大量的思想感情。

艺术世界有条最高原理：用最少语言表达人类最大量的思想感情——

^① th. balston《r. 吉宾斯的木刻》，伦敦，英文版，1949年，第35页。

这便是极值原理，也可以说是节约原理。唐代诗人是节约大师，从不轻易动用 一个汉字。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王维）

我非常推崇这 12 个汉字的排列组合（或叫织体）。诗人用最少的汉字表达了天地间的孤独、萧散、简远、幽远、阔远和渺远的最高美学境界。

这正是黑白木刻这个“十字架”艺术语言符号系统所追求的。王维是善于使用汉字进行另一种“黑白木刻”艺术创作的顶级大师。在本质上，唐诗同“黑白木刻”是相通的。

艺术家把大自然的色彩斑斓简化成了黑与白的对话，又不丢掉、不丧失事物的本质——这是木刻艺术的精髓或要害。

或者说，黑与白的这两种简洁颜色构成的黄金十字架取得黄金平衡是木刻艺术感人的“眼——脑系统”的奥秘所在。

其实，任何艺术在构成学上都是一件编织物。小时候我在农村见到过农妇坐在木制织布机上织布的情景。经线、纬线垂直不间断地、有节奏地交叉、编织，最后成了一匹布，给了我难忘的印象。当然还有织毛衣的构成。

在本质上，整个人生世界的构成也是经线、纬线的编织过程，人生世界是件“编织物”。

木刻艺术作品也不例外。黑色是经线，纵坐标；白色是纬线，横坐标。语言非常简洁，但能说出许多事物，颇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况味。

我想起 19 世纪德国伟大科学家赫姆荷茨（H. Helmholtz, 1821~1894 年）的理论。

他在生理学（尤其是在视觉、色彩和听觉方面）^①、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在黑白木刻艺术领域，他提出过一条重要法则（至今也没有过时）：

“画家如果想要描述月光，只须画出那些最明亮的物体，而让其他一切东西都处在几乎无法辨认的黑暗中。”

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不仅如此，赫姆荷茨还用定量方法（数学语言）对黑白对比——这个“十字架”——进行了研究。

进一步揭示黑白木刻艺术的奥妙，必涉及当代视觉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的成就。

^①比如他的有关论著《论人的视觉》，1855 年；《生理光学手册》，1856~1867 年。

比如色觉的主观感受可以分为三个半独立的感觉：色彩、饱和度和亮度。可见，亮度是色觉的第三个特色。

亮度对比大约有 500 个等级。

科学的这一发现会让木刻或版画艺术家大吃一惊。

事实上，天地间事物的奥妙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

吉宾斯的艺术构思表达了这样一种哲学：人仅仅是大自然界的一个成员；人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不，不是！

今天，21 世纪的我们，应该，也必须对野生动物确立一种新的伦理道德。我指的是抛弃人类的沙文主义，建立环境伦理学。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人类社会沙文主义，人类和野生动物在伟大的生命、存在之链上都是两个平等的环节。野生动物和我们是兄弟——这便是吉宾斯木刻作品《松鼠》的主题。

我想起一则报道：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一只小鸟突然飞进赛场，不幸被网球击中落地身亡。那位运动员立即中止了比赛，走到小鸟跟前，当着上千名观众的面，为自己的这一不是有意的过失，扑通跪在地上，深表忏悔。

读到这段新闻报道，我的双眼潮湿了。这是大地神学或生态宗教的精髓。



《守夜人》，黑白木刻，1930 年，德国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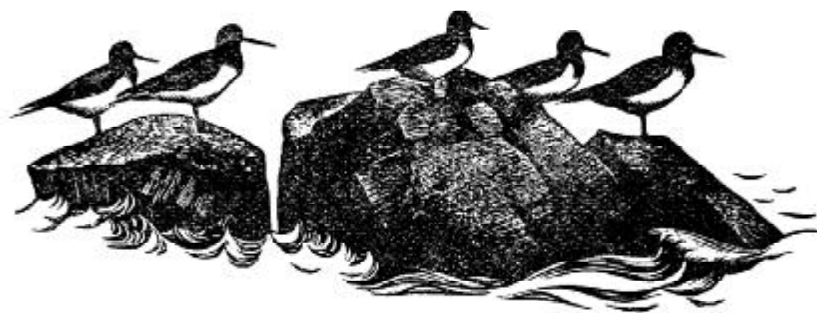
这是为木偶剧《浮士德博士》创作的一幅插图。

画家所遵循的，正是赫姆荷茨提出的黑白对比原则。



《松鼠》，木刻，1934 年，选自《野生动物与圣徒》，英国吉宾斯。

请注意，在画面上有一位圣徒在对松鼠下跪，表示对大自然的敬畏。按比例，松鼠画得很大，圣徒很小。这样的比例才是正确的。在中国山水画中，山川动植与人的比例也是如此。人总是很小。



《海鸟》，木刻，吉宾斯。



《狮子和熊》，木刻，吉宾斯。

这位热情洋溢的英国艺术家“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把天地、山川、草木、虫鱼和鸟兽为创作对象，自得其乐，并把他所见出的“天地有大美”传达给了我们。



《野鸭》，木刻，吉宾斯。

这幅小品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诗人的审美情趣：

“野鸭成群忽惊起，定知城背有船来。”（宋代，杨万里）

“家人暗识船行处，时有惊忙小鸭飞。”（宋代，范成大）



《海中鱼的一跃》，木刻，吉宾斯。

这是地球上生命的快乐：“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吉宾斯把海洋生物世界的生命力揭示了出来。他的艺术启示我们要去建立一种“生态神学”，归根到底是四个汉字：“敬天爱人”。这才是“和谐世界”的精髓和保证。

所以我仇恨挪威、日本捕鲸船。



《过河的牛》，木刻，吉宾斯。

你能想像人类文明之旅中可以没有牛吗？可以没有马、羊和驴吗？它们都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吉宾斯偏爱用“黑白编织的十字架”这套对立统一的语言符号系统去观照“日落归牛近、风微宿鸟安”的宁静。

那是天地间的神圣宁静。它比十本哲学教科书教给我们的东西还要多，还要深刻。中国古代诗人最懂得欣赏、品味大自然的宁静：

“白鸥飞处极浦，黄犊归时夕阳。”（宋代，杨万里）

“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宋代，辛弃疾）



《海湾》，木刻，1926 年，吉宾斯。

线条简洁、流畅，“白纸黑字”，很有阔远、幽远和深远的美学意境。

这是吉宾斯先有了清旷胸次，然后才有黑白编织的阔远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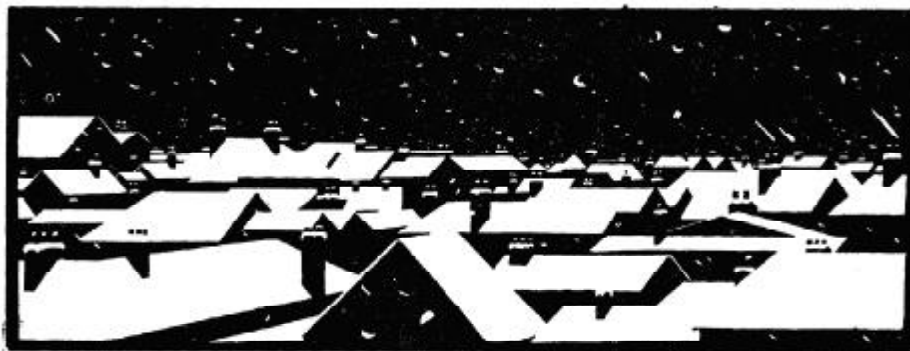


《帕比托埃海湾》，1948 年，吉宾斯。
他是用黑白两种颜色赞颂大自然的歌手。从小他就热爱风雨雷电，山川动植，所以才能与天地生生之气相融，笔下常生出奇胜之境。

《农舍》，木刻，1944 年，
吉宾斯。
颇有诗的意境，使我联想
起唐诗：“牛羊下山小，烟
火隔云深。”



《秋收》，木刻，吉宾斯。



《正在下雪的都柏林》，木刻，吉宾斯。

这幅作品也使我想起我国的古诗：

“风卷寒云暮雪晴，江烟洗尽柳条轻。檐前数片无人归，又得书窗一夜明。”

“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唐诗）



《干草垛》，木刻，1927年，吉宾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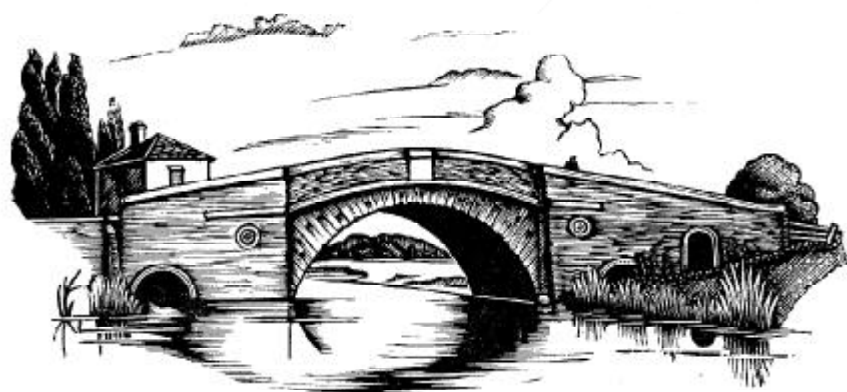
《地中海的平静》，木刻，1932年，吉宾斯。

大海有两重性格：“狂暴”（比如海啸）和“平静”。两者交叉构成了一个十字架。到处都有无形的十字架。它是人生世界普遍的结构。人自身也是一个十字架，如身和心，或肉与灵。



《马塞多尼亚的街道》，木刻，1921年，吉宾斯。

画面全然是黑白排列组合构成的一个织体。音乐语言的构成也是织体。



《哈夫品尼桥》，木刻，吉宾斯。

桥是第二自然风。你能想像一个没有桥的世界吗？桥是一个诗意很浓的符号：

“蝉声驿路秋山里，草色河桥落照中。”（唐诗）

这便是唐代诗人眼中的桥这个符号的诗情画意。

如果吉宾斯能直接用汉语读唐诗，他准会赞叹：

“中国古人是先得我心了！”

又如果唐代诗人看了吉宾斯的木刻，他们一定会惊讶：

“洋人用黑白两色居然可以营造出桥的这种疏淡的美学境界，妙哉！”



吉宾斯善于用“白纸黑字”醒目的木刻艺术语言符号系统描述、揭示大小船只在“测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见其广”的大海上航行呈现出的千姿百态。黑白两色看似貌不惊人，其实有非凡的表现力。这使我想起黑白照片的独特语言，当然还有黑白电影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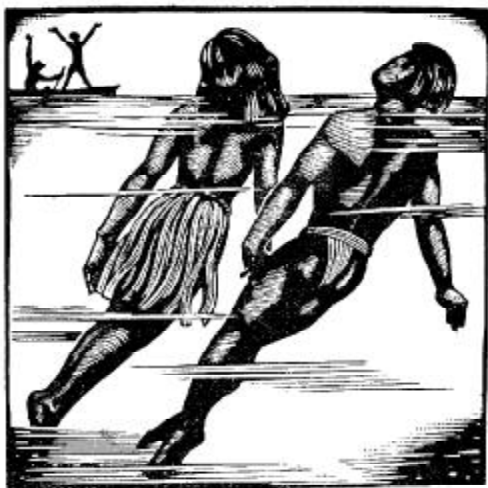
《沙姆逊和德丽娜》，木刻，1925 年，吉宾斯。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在蓝天底下，大地之上，只要有健壮、剽悍的男人和丰满，性感的女人，便会有性爱 and 情爱，便会有阴阳的结合，便会有生育，繁衍后代——这是人类生存于斯的第一原理。
画家用黑白线条的编织，表达了这条永恒的原理。



《意大利的正午》，木刻，1932 年，吉宾斯。
可见黑白这个简洁的十字架构成语言在吉宾斯手中能派上多大用处！它具有多么伟大的囊括万事万物的表现力！



《清水中的裸女》，木刻，吉宾斯。
上帝（造物主）造女人用了很复杂的 RNA、DNA 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吉宾斯进行第二次创造的时候，只用到黑线和白线的排列组合，平衡对比的手法。
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家要胜过大自然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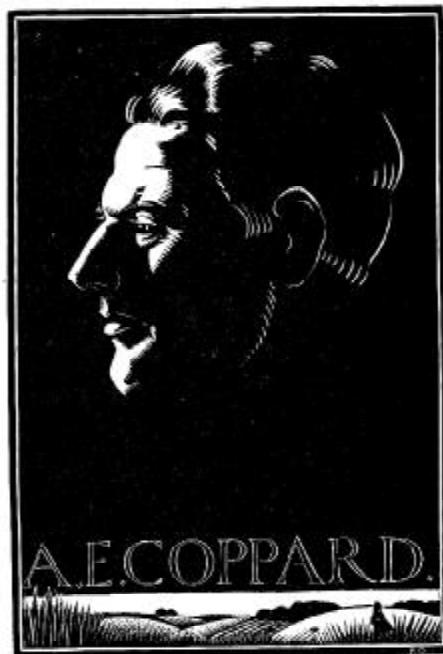


《塘嘉的一个真实爱情故事》，
木刻，1935 年，吉宾斯。
爱情和死亡永远是艺术创作的
两大主题。



《奥赛罗》，木刻，
1940 年，吉宾斯。
他曾为文学作品
创作过许多精美
插图。

《头像》，木刻，1928 年，吉宾斯。
据说上帝造了人。吉宾斯则把黑色
放在白上面进行了第二次创造。在
这种意义上，他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玩扑克牌的女人》，木刻，1928 年，吉宾斯。
人是温饱之后爱游戏的动物。游戏是为了驱散寂
寞和无聊，但赶不走孤独，孤独属于哲学性质。
穷人的大敌是饥饿，富人的大敌是无聊和寂寞。



《卖水果的女人》，木刻，吉宾斯。
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构成的。
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受到女人的欢迎》，木刻，1930年，选自文学作品《第七个男人》，吉宾斯。人的悲欢离合同样是吉宾斯的“白纸黑字”语言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主题。



《他们的孙儿告诉我》，木刻，1930年，选自《第七个男人》，吉宾斯。



《赶集去》，木刻，1932年，吉宾斯。



《玛丽亚、约瑟夫和婴儿时的耶稣》，木刻，贝汉姆，1521 年。

随着造纸和印刷术从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便迎来了版画艺术时代。这种黑白木刻艺术语言首先被用到宗教感情和信仰领域是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只有宗教才能从人们的心底里激起巨大的创作灵感和奋不顾身的热情。这在音乐、建筑和诗歌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

宗教歌词便是一例。在基督教的早期，旋律要服从歌词感情的需要，只有这样才是好的、理想的旋律。中世纪伟大的宗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我没有被旋律感动，而是被所唱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一流歌词一旦同一流旋律相结合，那会是何等震撼人心的效果呢！



三幅16世纪初有关宗教题材的木刻。在西方文学艺术史上，西方人的宗教感情和信仰起到推动作用。比如宗教、建筑、音乐、诗歌和绘画的最初创作动力正是来自对上帝的赞美。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是大大有功的。



《书斋里的学者》，德国伟大画家丢勒的木刻作品，1511年，在这里，透视结构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今天北欧人的祖先叫维京人。中世纪他们驾驶“维京船”去占领、掠夺。历史上，人们称维京人为海盗。公元885年11月24日，三万名维京人围困了巴黎。他们勇敢，船的结构和性能很先进，但行为却是不正义的——这正是这幅作品要表达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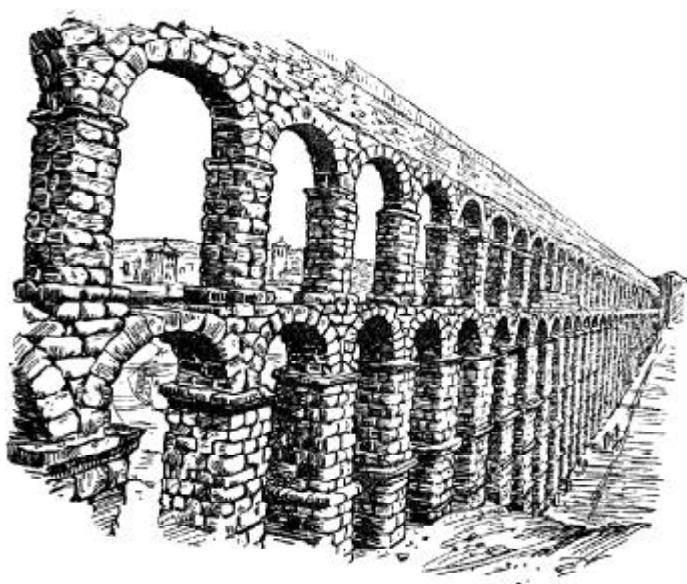


16世纪德国的一幅木刻，水平相当高。



《葬礼》，木刻，1530年，德国韦蒂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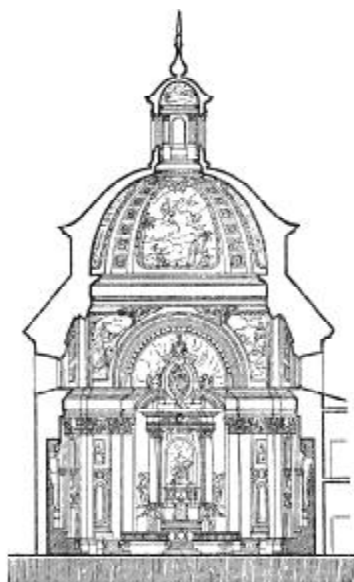
16世纪(约1515年)欧洲的一幅木刻。当时这种艺术水平已经相当高了。这是黑白编织构成语言的表现能力。



古罗马时代的水渠（在西班牙境内）。工程师用石头砌成水渠，画家则用黑白线条构成。各有各的绝活。在这种意义上画家也是建筑师。他用黑白两色构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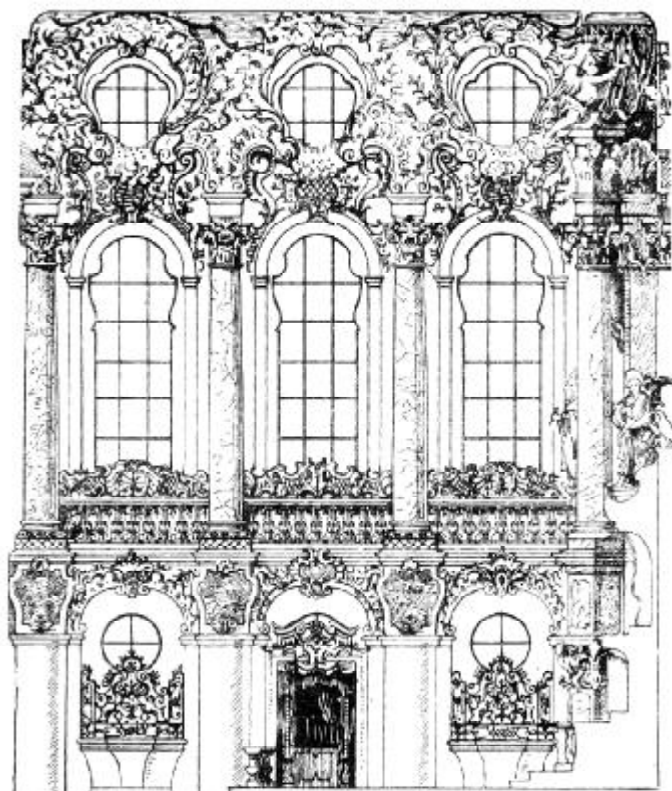
《富达大教堂》，为狄桑霍夫设计，哥特风格，
1704~17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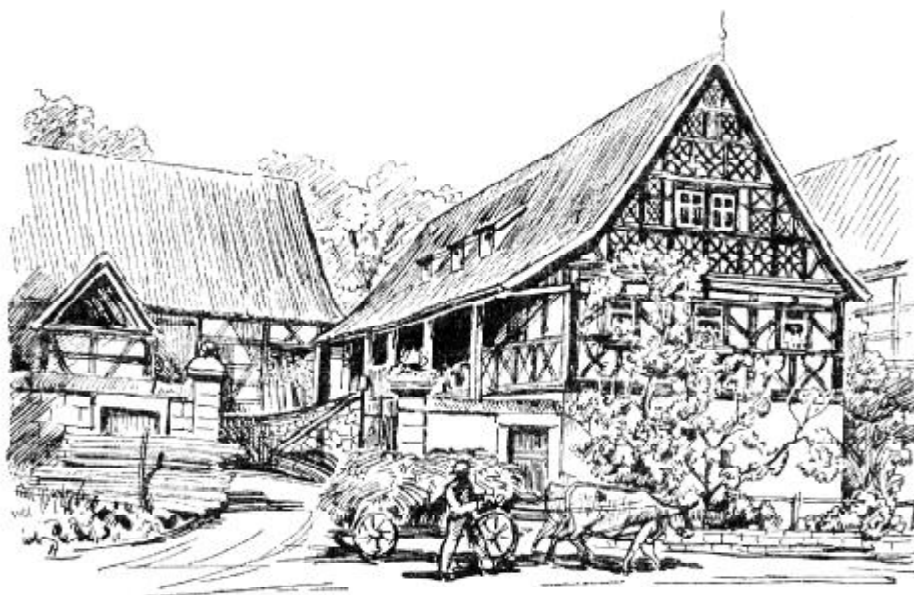
《马德里圣玛尔可斯教堂》，巴洛克风格，建于
1749~1753 年。这幅建筑画仅用了黑白两种线条
的对比便简洁地勾勒出了这座著名建筑的风采，
而且富有一种音乐的律动和韵味。



18 世纪德国南部古城奥格斯堡耶可布街和耶可布塔。
今天塔还在，街道两旁的屋还在。我有幸于 2004 年去这座古色古香的小城造访过。
相比之下，我们古城的保护就不如欧洲。这是令我最伤心的一件事。



莫扎特时代德国一座教堂，建筑师是齐墨曼。



德国南部一农庄。
由此可见，黑白可以构成整个世界。



19 世纪德国杰出油画家和版画家门采尔的作品。
他会用许多种颜色说话，但在这里，他只用到黑白两种。



《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皇宫》，木刻，1841 年，门采尔。



《商店门前排队的女人们》，雕刻，根据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油画而制作，只用到黑与白、光与暗的对比或编织，企图再现莫奈油画的况味。

当然这也是一种尝试。用多种方法表述同一景象毕竟是件好事，这恰如高中生用两种方法解答同一道几何习题比只用一种方法更可贵，更珍贵。



黑白对立统一语言在西方神话、童话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插图领域，均有大显身手的表现，给读者许多美的享受，大大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



表现大自然的美，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是17世纪荷兰黑白木刻艺术的主题之一。艺术家只有观察细、读书多，才能胸次浩大，高大，寥廓，见得雨洒半云，风飘片雪的山川灵奇，以及古今事变的悲壮。



《冬》，英国黑白木刻，拉夫莱。

这幅作品营构了万树枯林冻折、兔径迷、人踪灭、千山鸟飞绝的意境。由此可见“白纸黑字”木刻艺术语言符号系统的表现力，它所营造的“气象”有一种独特的况味。这也是我多年热爱木刻的主要原因。



雪地里的决斗。

在自然界里，两头公狼为争夺一只母狼而格斗的情景是自然规律所使然。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正是在决斗中丧命的。

今天的男人们会为了一个女人拔出手枪，约定一个地方，找几个公证人去决斗吗？不会，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是男性荷尔蒙进攻力度的弱化现象吗？



19 世纪德国斯图加特一家出版社的一本书的封面。书名是《智慧和美丛书》。



有一回我在柏林同一位女作家交谈，她说：“在知识型的女子看来，男人的智慧是很性感的。”

我说：“不过男人看女人，更注重女人的肉体美。这是男女之间的区别。”

男女构成的十字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永远也不会谈得厌倦，更不会谈完，只要世界上还继续有智慧、健壮男人和聪明、丰满的女人。



《敌机轰炸后》，木刻，1943 年前，陈更新。

世界最古老的版画是 9 世纪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它是在我国敦煌石窟被发现的。但在近代，欧洲版画艺术却超过了我们。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黑白木刻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尤其喜欢抗日题材的一些作品，因为我在骨子里是抗日分子。



《劫后》，木刻，1946年，杨纳雄。

日本这个民族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民族。在历史上，它从中国古代文明，吮吸了多少乳汁！

在近百年，日本民族曾三次（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二战时期的侵华日军）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

1946年，我九岁，母亲带我去过江西南昌向塘外婆家，一片废墟给了我难忘印象。

可恨的是，今天右翼势力并没有负罪感！

我忘不了民族的深仇大恨！用黑白木刻艺术唤醒中国人的这种历史意识并永远记住它，是艺术家的神圣使命。

——谨以这段话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这是表现欧洲历史上战争场面的两幅木刻作品。艺术家以悲壮索画、笔意纵横的手法，取得了传神效果。这就是在咫尺之间表达气壮山河的形势。

不过，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有战争？而且是战火不断，直到今天的伊拉克。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专著《战争与男性荷尔蒙》，我觉得话没有说完，我还想动手写本续编：《战争背后的男性荷尔蒙——战争的生物学基础》。

人类的基因决定人类有攻击性吗？“战争与和平”这个十字架有其生物学根源吗？人类必然要被钉在上面吗？今年5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对人类战争的本质和根源作进一步的探索。

钢筋和混凝土

在现代建筑学中，它们是成对出现的。

没有钢筋，混凝土失去了依靠，无法凝集；没有混凝土，钢筋是空架子，很干瘪，而且失去了保护。所以只有钢筋和混凝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互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才能大显身手，发挥作用。

我把钢筋（具有刚毅和坚强的意志）看成是阳，是男人；混凝土（看起来很柔弱，随意，可塑性大，颇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个性）则是阴，是女人。

所以钢筋混凝土在一起是男人同女人的完美结合。两者是相互的需要，是有钢有柔之体，是阴阳合德，相得益彰。

或者说，钢筋（刚）和混凝土（柔）作为对立的两种建材（物质力量）共同构筑了现代建筑世界。

单独的钢筋或单独的混凝土都将一事无成。只有两者携手合作，才会大有作为。事实上，世界建筑自从出现了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发生了一场革命。今天，我们都在分享这场革命带来的硕果。

其实早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就已经在房屋建筑学中应用了刚柔对立统一原理。小时候我在农村观察到，人们砌筑土屋（竹篱茅舍）是先扎好竹篱笆，然后将泥抹上，这便是最简易的墙。这里的竹篱笆便起到了钢筋的作用，泥浆则相当于混凝土的角色。这是互利，互惠，也是双赢。

我还注意到，建土屋的村民还把许多约四五厘米长的稻草均匀地拌在泥浆里，为的是加固，增强泥浆的凝集力，起到辅佐篱笆的作用。

关于钢筋混凝土，我想列举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为例：

在施工现场架设模板、绑扎钢筋和浇灌混凝土，经养护达到一定强度后拆除模板而成楼板。

钢筋混凝土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有以下优点：强度高，刚度好，耐久，防火性能好，遂被广泛采用。

我们社会的干部和群众也应是钢筋混凝土的整体、和谐关系。

伟大的政治家和亿万群众的相互关系更是如此。

合理、和谐社会应具有“钢筋混凝土”的构成或结构。

其实我们各行各业都可以从房屋建筑学中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基本原理——这也是我常常在建筑工地上看施工热闹场面的动机。

我是努力学习,看出其中的门道,而不是看热闹。

如果我是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的老师,我一定会带领学生到建筑工地来参观,尤其要让学生明白地基、基础和荷载的关系,因为房屋的全部荷载是通过基础传给地基的。

地基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基础应有足够强度。

回到课堂,我再对学生讲:

社会、国家以及人类文明大厦的地基和基础是什么?

许多年,我经常从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那里吸取思路、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创作灵感。

我撰写这部书稿的不少灵感便是来自上述领域。

骨骼和肌肉

这也是对立统一现象。

骨骼是阳，肌肉是阴。

骨骼是刚，肌肉是柔。

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交易、结合而成的有刚有柔的统一体，阴阳作为物质实体而普遍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阴阳（刚柔）不但互相结合，而且又互相排斥、互相推动，一切变化即由此产生。

我的问题或提问是：

宇宙万事万物为什么是按这种“对立统一”法则构成的？

谁也不能回答。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些绝顶聪明的人类大脑也只好在这里戛然而止，沉默，内心生出一团深深的敬畏感。

歌德说过，研究者的最高幸福是：把能够研究的事物都加以研究了；对不能研究的现象，只有默默地去敬而畏之。

注意：是敬畏，不是畏惧，不是恐惧，千万不要混淆了，不要在这两者之间画等号！（尽管在敬畏和恐惧后面都有惊叹号，但性质很不相同）

正常人体学告诉我们，人体有 206 块骨，其分布与数目如下：

一、躯干骨（其中椎骨 26 块，肋骨和胸骨 25 块）。

二、颅骨（其中脑颅骨 8 块，面颅骨和听小骨 21 块）。

三、四肢骨（其中上肢骨 64 块，下肢骨 62 块）。

我的提问是：为什么是 206 块骨，而不是 106 块或 406 块？

如果是 106 块或 406 块，今天的人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

造物主事先想好了要把人打造成什么样子，所以才备好了设计所必需的 206 块骨。

造物主是位节约大师，他不浪费每一块骨。他像个建筑师，为了造栋屋，事先计算好了需要 2006 根钢筋（长短、粗细都有规定）。

哦，206 块骨，而不是 106 块或 406 块！

这究竟为什么？

这是个形而上的、不可解的追问。

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有追问一些形而上问题的倾向。

追问 206 块人骨，恰如追问光速为什么是每秒将近 30 万公里，而不是 35 万公里；引力常数和普朗克常数是今天这两个值，而不是别的值？ π 的值为什么是 3.1459……而不是整数呢？

都是形而上的、不会有任何最后答案的提问。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刚提到的三个基本物理常数是另外的值，那么，宇宙、世界便会是另一种样子，恰如拥有 406 块骨的人绝不是今天的人。

206 块骨造就了我们人，使人成其为人。

我们都是 206 块骨的产物。206 这个数只能是上帝大自然的设计和安排。

骨是坚硬的器官，恰如建筑学中的钢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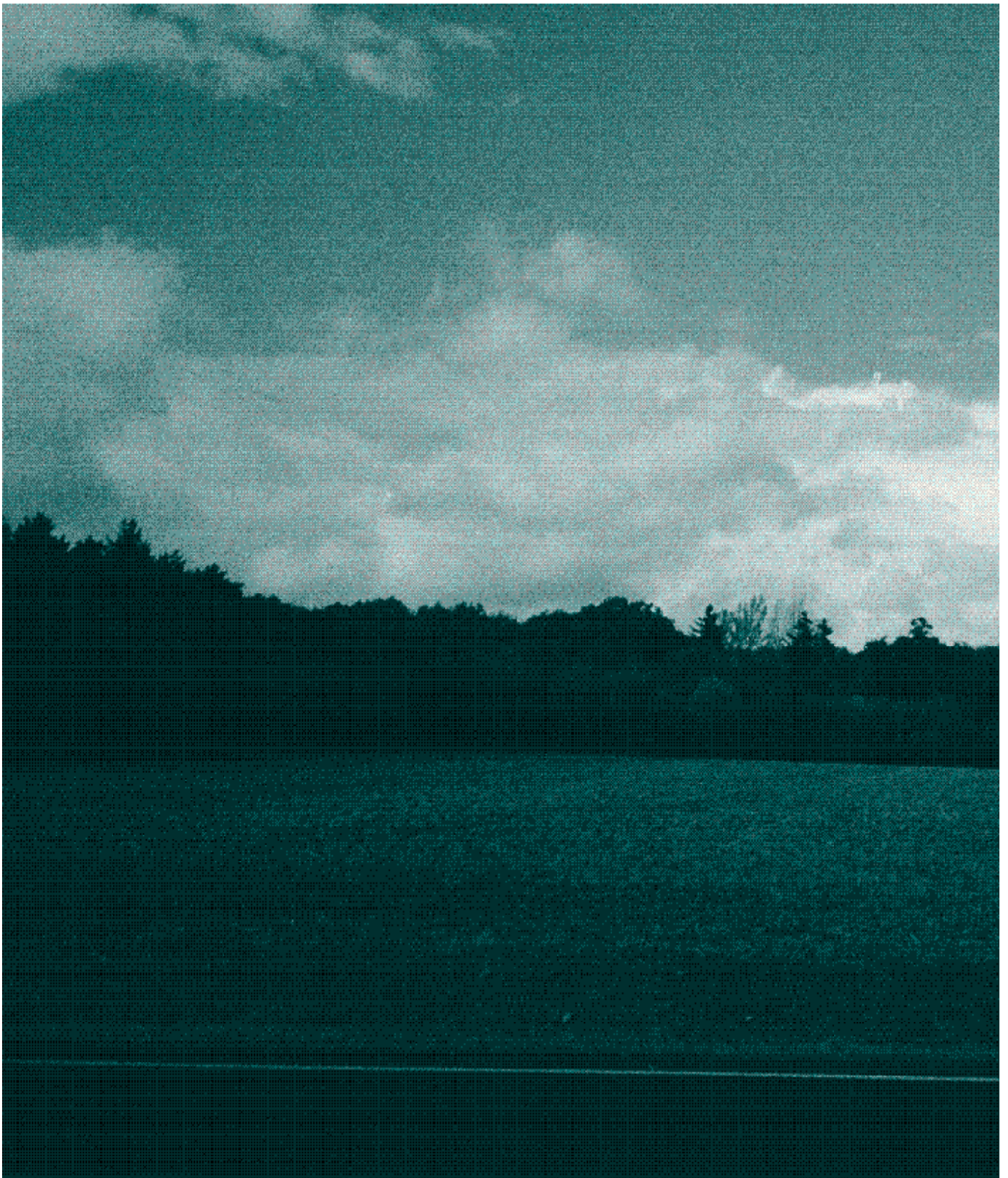
人的运动系统是由骨、关节和肌肉组成的。肌肉的功能有点像混凝土，不过是活动、有伸缩性的混凝土。不过最近国外有建材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有弹性的混凝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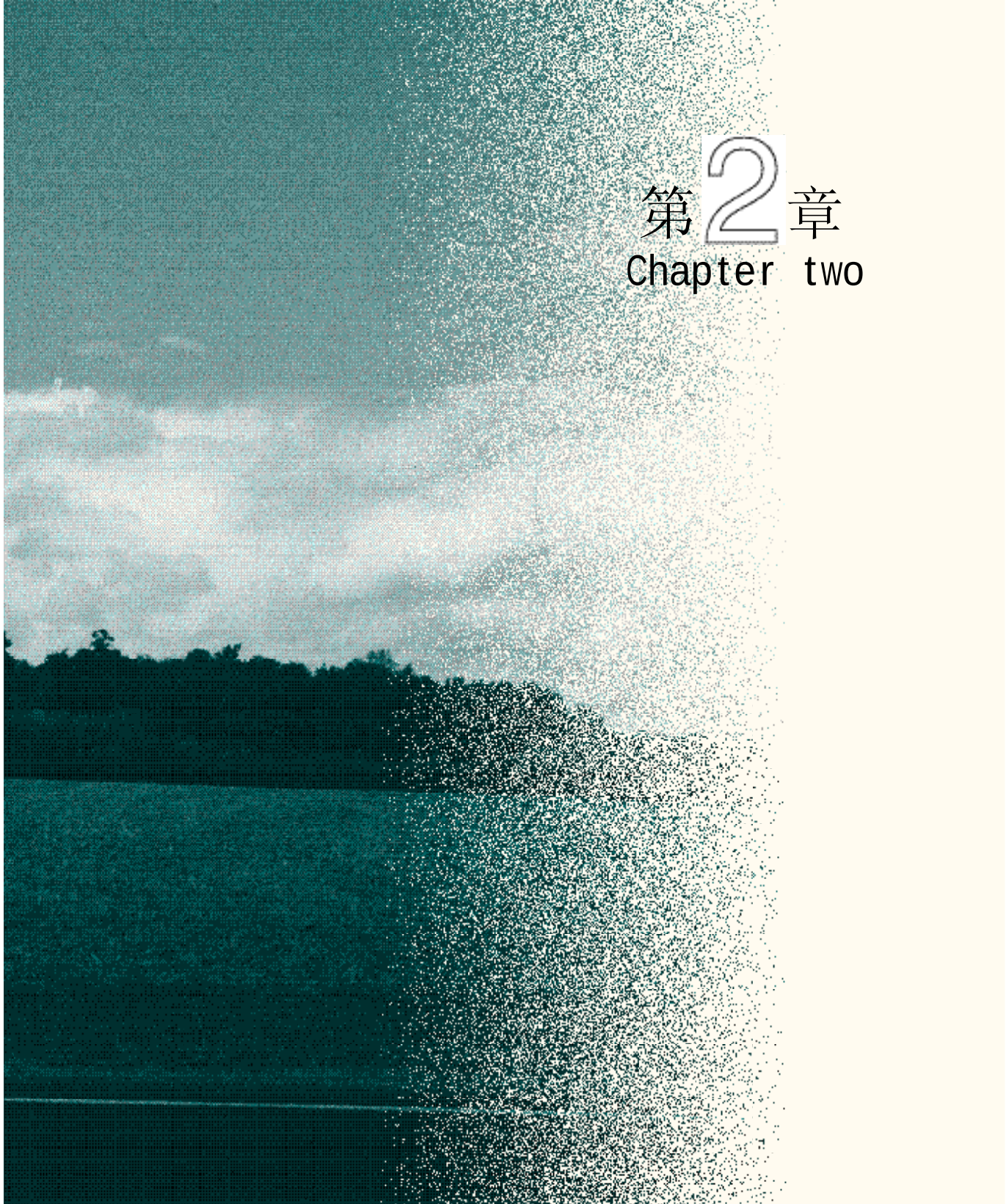
看来，人体是一栋活动的（或叫运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造物主用“钢筋混凝土原理”造了人。

当然人体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远比我们在街道、居民区见到的楼房要复杂、精巧得多。

骨和关节构成的支架组成了人体建筑的基本轮廓，肌肉在神经支配下主动收缩，产生运动。

关节是由两块或两块以上的骨相连而成，其间有空隙，便于灵活地运动——正是运动造就了我们人，骨、关节和肌肉是“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一个生动例子。





第2章

Chapter two

钢琴和乐队

在西方古典音乐中，钢琴和乐队是对立统一的有机体。两者既有争论和对抗，又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协奏关系——这常常是西方古典音乐的魅力所在。

——2004年初秋于卢森堡

一、钢琴和乐队对话构筑的十字架

在器乐协奏曲中，作曲家总是安排独奏和整个乐队处在竞争、对抗的戏剧性关系，当然这种戏剧性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对话，是协调，最后达到和解。

如果钢琴是经线，乐队便是纬线，整个钢琴协奏曲就是这样编织而成的一件抽象的十字架编织物，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人类思想感情。

这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中有卓越的表现。

比如在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钢琴从独奏的动人心弦的朗诵调开始，它同整个乐队那个悲剧性的动机发生了戏剧性的冲突，并在发展部中达到了高潮。

第二乐章同样是由钢琴独奏同整个乐队的对比、冲突营造出了形象。进一步，莫扎特还把管乐器同钢琴、弦乐器置于“竞奏”的原则下或对比的状态中。

在钢琴协奏曲这一体裁中，贝多芬为了凸出体现雄伟、豪迈的形象，雄浑、宏伟的激情，以及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他让独奏乐器同乐队之间进行对话，使独奏与全奏保持既对立又统一的相辅相成和交织的关系。

这是贝多芬的艺术成就，也是他的绝招。

在《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贝多芬的对话原则便有光辉应用。这里出现了两个对比、冲突的形象：一个是由弦乐器组齐奏的严厉的断音主题；另一个则是由钢琴独奏出的万古太息的答句，听起来非常典雅、温存：

“死别已各声，生别常恻恻。”（杜甫）

贝多芬在原稿中注明了整个乐章的钢琴乐句都要使用弱音踏板，为的是让钢琴乐句富有温柔、多愁善感的性质。

贝多芬让钢琴代表正义、善的一方；让弦乐器组代表非正义、恶的一方。

这里是两种对立的黑白力量的冲突，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十字架，是人生世界结构的回响。贝多芬音乐的深刻性和哲学性正在于此。

在音乐的对答中，钢琴那万古太息般的音型越来越沉雄、有力、壮怀激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种种矛盾的冲突支配了贝多芬的一生；没有人生的大矛盾和大苦闷横梗于胸中，贝多芬就不成其为贝多芬，也绝不会酿造出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交响曲。

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事物在极度敏感的贝多芬看来都是不顺眼的、荒唐和无法容忍的。贝多芬甚至抱怨：

“我真不明白，何以一个烟囱如此可恶，如此有毒害，而政府居然宽容它存在！”

他对朝北的屋子也极度反感，所以他一生像只蚂蚁，总共搬过三十多回家。

在所有的矛盾、冲突和苦闷中，最让他束手无策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本烦恼”。在本质上，这是佛教哲学所说的“烦”，也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烦”：

人生就是烦，所有的人都被烦支配着。“此岸”或“在世”都打上了“烦”的印记，这是人生的根本规定，歌德把它叫做“对世界的太息”(Die Weltklage)，也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它构成了贝多芬精神危机的总根源。

他的音乐艺术世界的本质就是他的灵魂从诸多种矛盾和冲突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和解和统一的状态。他企图把诸多种冲突和矛盾放到音乐中去化解——这结构也规定了他的协奏曲的十字架构成。

关于矛盾，黑格尔说过：

“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加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黑格尔认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在于它本身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和克服矛盾……建立矛盾又解决矛盾，这就形成了继续不断的生命，而生命只是过程。

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也是这种性质的过程，指出这点非常重要。

黑格尔的上述论述对我们理解贝多芬的协奏曲和交响曲是有帮助的。

在贝多芬音乐和黑格尔哲学中，“和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年写下的《遗嘱》中，贝多芬说：“在我死后，世界能尽可能地同我和解。”

的确，死亡才是我们每个人同人生世界取得最后、绝对和解的唯一方法或途径。

贝多芬的一切重要作品都受矛盾的驱使，并以矛盾的解决作为终曲。在贝多芬那里，终曲即各种矛盾、冲突和对抗的解决——暂时“和解”。

没有矛盾的冲突、对抗和暂时取得“和解”，便不会有贝多芬那雄浑、悲壮和崇高的音乐。贝多芬之魂，即各种矛盾的对抗和暂时得以在音乐中取得“和解”之魂。（连战、宋楚瑜的大陆之旅也是和解之旅。今天的世界需要和解）

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是矛盾、冲突在音乐中和解的又一部杰作。第一乐章的发展部以乐队和钢琴声部的冲突和对抗为核心，然后演变为黑中有个白点和白中有个黑点的相互对话，钢琴声部在沉重的八度进行，整个乐队以压低、克制力量同钢琴声部相抗衡，非常具有戏剧性。

尤其在最后乐章，贝多芬凸显出了钢琴这一独奏乐器的全部光辉、雄伟和广阔的特性，使钢琴声部同整个乐队完美地会合、和解起来，恰给我海上生风暴之后天边出现耶稣光的感觉印象：

夕阳衔山，一片血色般的晚霞，光芒万道，照得远近红一块，紫一块，绿一块……

这是雷电交加，暴风雨过后天地之间的和解，非常壮丽。

柴可夫斯基在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中，也把两个对手、竞争者——钢琴和乐队——安排在一对一的“格斗”中。

这首曲子以庄严的前奏开始，形式为奏鸣曲。它的音乐色彩可谓光辉灿烂、富丽堂皇，而且变化多端。乐章从一长段引子开始，全乐队的四小节的弦奏（尤其是法国号的音响非常凸出）给人深刻印象，然后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奏出基本主题，钢琴则用大量宏亮、有力、如钟声般的和弦伴随着，衬托着，并覆盖了整个乐队。

在这里，钢琴虽然只是处在陪衬主题的地位，但它充分发挥了一种独奏乐器的主导作用。即便在整个乐队的全奏中，它的音响依然十分嘹亮、雄浑有力，为整个协奏曲的宽广性、歌唱性和灿烂辉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可以说，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用钢琴和乐队演奏的一部交响曲，它体现了对立统一十字架原则。

二、小提琴和乐队的对话

首先我想列举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为例：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这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门德尔松断断续续花了五年时间（1838～1844年）才完成它。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他对这首曲子还没有把握，需要继续修改——直到最终才达到了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程度。

正如20世纪伟大的小提琴家朱克曼（P. Zukerman）所说：“这部作品写得很有特色，有美妙的旋律和惊人的配器。即使由木管、铜管齐全的大型乐队伴奏，小提琴从来也没有被‘盖住’。真可以说这是一首精湛绝伦的作品。”

勃拉姆斯在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中，也善于应用对立法则：独奏声部同乐队的发展既有竞争、冲突，又有协调和统一。

尤其在尾声，独奏小提琴还是超越了整个乐队的力量，全曲以富于匈牙利特色的三个有力的和弦作为结语——在我听来，这便是个“豹尾”了。

勃拉姆斯用独奏小提琴和整个乐队的对立统一关系共同结构了这首“带有独奏声部的交响曲”的风头、猪肚和豹尾——这是作曲家的成就。

* * * * *

最后我想说，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协奏曲中，独奏声部和整个乐队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两者总是互相包含、相互结合，组成一个统一体而存在着。或者说，这两者作为对立的双方在整个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推动、相互激励和相互磨合的。

用中国哲学来看独奏声部和整个乐队的关系，颇有点乾和坤、阴和阳的况味：

整个宇宙就是由乾坤（即阴阳）构成的。乾和坤即阴阳二气充满了宇宙，是无处无所不在的。

其实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也是刚柔相济、变在其中的一些非常优美的例子。尤其是他的《春天奏鸣曲》慢板乐章钢琴同小提琴的对答，真是妙不可言！

在我听来，钢琴演奏是阳，是刚，是芭蕾舞中托起“天鹅”的王子；小提琴是阴，是柔。

小提琴奏鸣曲是一个有刚有柔的非常优美的十字架或统一体。在这种意义上，作曲家创造的音乐胜过了大自然，因为自然界只有单调的风声、雨声、树叶沙沙声以及暮鸦和南来雁的鸣叫声。



由钢琴伴奏的大提琴曲同样是一个优美、浑厚的十字架，因为大提琴这种乐器很男性，声音低沉。我特别热爱柴可夫斯基的《夜曲》和圣桑的《天鹅》，在我听来，那是两个天下独绝的“十字架”，尤其是更深人静之时，曲子如泣如诉，从远处一栋乡村别墅的窗口飘来，传到我的耳朵……

势能和动能

这两者绝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成对的。它们既对立，互不相容，又统一，两者的和保持恒定不变，称之为运动恒量。

为了说明问题，我想列举两个例子：

一、游乐场常有升降滑道

轨道上有一个最高点作为出发点，在小车运动的全过程中，它绝不能再达到出发点的原先高度。

比如出发点离地面为 25 米，小车永远也达不到 25 米那样高了，因为摩擦和空气阻力消耗了一部分能量。

小车在最高点处的势能最大，动能最小（没有动能）。

小车在最低点处的动能最大，势能最小（没有势能）。

但势能和动能这两个物理量的和是恒定不变的。

就是说，在小车升降运动的过程中，是摩擦力使车子不能重新达到像出发点那样的高度，但势能和动能之间总是不断地转换，其总和不变。

看来，势能和动能这两者是互相排斥又相互推动的，于是一切变化即由此产生——这便是《系辞下》提出的这个哲学命题：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势能和动能是交互作用的。

至于我们把势能称之为刚，还是把动能称之为刚，则是随意的。

二、我手头上有个比鸡蛋小些的橡皮球，它的弹性极好

我以离地面 5 米处让小球落地，它能跳到 4 米来高的高度。但永远跳不到原先的、由之出发的高度 5 米。因为：

第一，不可能把橡皮球做成绝对的弹性；第二，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地）消除小球同空气、同地面的摩擦力。

再有，小球从地面弹回空中，其高度永远也不能超过 5 米，恰如在第一个例子中，在升降滑道上的小车永远也不可能超过 25 米高——因为大自然

永远不会破坏、违背能量守恒原理！

或者说，上帝大自然或大自然上帝永远不会违背、破坏它自己制定的能量守恒法则！

在上述橡皮球的例子中，同样有势能和动能的不断转换，两者的关系是相互排斥又互相推动，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就是说，系统动能（K）的任何变化都是由系统势能（U）的相等但相反的变化来补偿的，反之亦然。

上帝大自然或大自然上帝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安排和设计，是为了使系统的动能和势能之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保持不变，即：

$K+U=$ 恒量。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势能和动能这两者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总是相互包含，相互结合，组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或十字架而存在着？这是为什么？！

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中，违背能量守恒法则的例子是没有过的！过去没有发生，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这是为什么？！

追问到此，我们在冥冥中好像感觉到了一种至高无上力量的存在——这便是老子心目中的“常道”，也是西方泛神论者所敬畏的“上帝大自然”（God-Nature）或“大自然上帝”（Nature-God）。

它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上帝大自然就是大自然上帝，它和老子的“常道”很相近，它静悄悄地伫立在能量守恒原理的背后，暗中指使一切，支配一切，统摄一切，操纵一切，主宰一切。

爱因斯坦一生不止一次追问过这类形而上的根本问题，比如质量、力和牛顿三大定律的起源如何？是谁安排、制定的？爱因斯坦显得很尴尬、困惑、无助，也很无可奈何，他只好把这一切统统推到上帝的面前，说：

“开始时（假如有这样的开始）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以及必需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从适当的数学方法中发展出来。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偏微分方程的应用，19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引起所有具有敏锐理解力的人的赞叹。”

同样，以下几种感情（或灵魂状态）将自始至终贯穿我这部书稿：

惊叹、赞美、无可奈何、沉默、敬而畏之。

以上五种基本感情可以说是科学、艺术和哲学这三大领域共同的最高境界。

红灯和绿灯

这又是对立的统一。它们相互排斥，不相容，但又是统一的。在城市的十字路口，都能见到这个代表城市生活秩序的符号，这个十字架。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其中。它是城市居民生存的普遍状态之一。

没有红绿灯的对立统一，便没有大城市的交通秩序。

意味深长的是，红绿灯都出现在十字路口，构成了一个十字架。

正是这一红一绿编织了井然的交通秩序，否则便是一团混乱。

在红灯面前，你只要耐心地等上两分钟，便可以获得属于你自己的那份自由，这一点是关键。

有一回我骑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因为红绿灯坏了，结果大小汽车、自行车都堵塞在那里，谁也走不了！

突然我悟出了红绿灯的重要性。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没有红绿灯便是没有秩序。

红绿灯这相互排斥（有你就没有我）的一对，它的最大功绩是编织了城市交通的井然秩序。

或者说，正是这对矛盾的统一构筑了大城市生活的交通秩序。

用中国哲学观点去看红绿灯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范畴。

如果我们把红灯看成是阳，那么绿灯便是阴；绿灯如果是乾，红灯便是坤。朱熹提出过一个命题：

“无一物不有阴阳乾坤。”

我这部书稿正是这一命题详尽的深入展开。

正因为我对红绿灯作“世界哲学”的理解，我在红灯面前总是很心平气和，耐心等待，从不抱怨，更不去闯。

我知道，我只要耐心地等一会儿，即可获得属于我的那份自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是有前提的，充分尊重前提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

这也是社会秩序、社会正义和公平以及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

可见，红绿灯于我是一本打开的大书，哲学书。完全读懂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限制和自由

人算不如天算。

——2004年10月于柏林洪堡大学

人性向往、追求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这只是幻想。绝对自由是没有的！

自由是有前提的，各种各样的前提便是限制。哪里有自由，哪里必有限制。

前面提到的红绿灯便涉及这个哲学问题。

我们只有充分遵守了红绿灯的法则，才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遍地的自由。

如果城市居民每个人都无视红绿灯的交通法规，都去追求所谓的随心所欲、绝对的自由，那么，大家都会堵在、卡在十字路口，谁也走不了，动弹不得——这时候，哪有自由可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丧失了！

一旦我们明白了自由是一定前提下的自由，我们这一生便会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潇洒，生命的高质量才会有保障。

是的，我们只有先老老实实承认一些根本性的限制，我们才有可能争到人生最大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可见，限制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结构，它成了一根无形的金项链，日夜挂在我的胸前，成了我所理解的“自由”的一个符号。

有一回我在德国用早餐，随手翻开一张地方小报，其中有一版是专门刊登讣告的。有首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翻译如下：

来和去是我们的命中注定，

始和终都掌握在上帝手中。

只有这中间一段

才由我说了算！

可见，人的自由是在生死大前提下的一点点自由。

当年，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的意愿，事先并没有征求

我们的意见；日后当死神来敲我们的门，我们又不欢迎。

只是中间一小段，不过七八十年的光景，才是我们力争的自由时间和空间。

毕竟诗中把我们的自由度夸大了。

实际情况远不是“由我说了算”。

人生在世受到大小局限真是太多太多！限制是经线，自由是纬线，两者相互编织，才构成了我们短暂的一生。

这件编织物分五大板块，下面我将它们分别论述如下：

一、大自然板块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基本限制

这是人类受到的最大限制或根本性的局限。

首先是宇宙时间和空间对我们构成的限制——这是天下第一限制。我们都生活在该限制内，而不在它之外。

再就是气候。

地球上的气候对人类也是一个基本限制。

可以说，我们人类及其文明之旅归根到底都是地球气候的产物。

比如，让我来假设一下：

如果从今年开始，连续10年，地球平均气温比正常年份要高出10摄氏度或低10摄氏度，那么人类的命运会怎样呢？其他生命的前途又会怎样呢？

肯定是个大悲剧！

恐龙的灭绝是一个例子，是前车之鉴。

在地球的历史上，有好几个时期，地球上的许多生命都灭绝了。比如在6500年前便发生过一次大灾变，后果是许多动植物（包括恐龙在内）都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巨大的灾变呢？

学术界提出过好几种假设。其中一种是1979年由阿尔瓦雷斯提出的：

太空有个相当大的天体同地球发生过碰撞，其能量相当于美苏两国核武器威力之和的一万倍，释放出来的大量尘埃把阳光遮住了好几个月，地面温度骤然下降，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结果恐龙被活活饿死、冻死！

由此可见，地球气候这个基本限制对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自由是什么？

人类的自由是“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球气候”这个大前提的自由，是在这个大框架内的自由。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

限制和自由交织成了一个“十字架”——这才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普遍世界状态之一。

有人提出：每隔2600万年至3000万年地球便会遭受较大天体的一次碰撞而经历一次重创，后果是一些优秀的物种被毁。重创之后，新的生态平衡才渐渐建立起来，原先某些被压制的物种获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也许多亏了那次6500万年前的大灾变（宇宙交通事故），哺乳动物（最后是人）才得以从恐龙手里夺取了地球霸主的地位。

是的，人类及其文明之旅全然是地球特定气候（不太热也不太冷）的产物。

人的生命比起野生动物的生命要脆弱得多。

人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上是那样的无助，弱不禁风！若是遇上天寒地冻的日子，母亲要为婴儿准备御寒的全套服装。

而野生动物的生命力却比人强大得多！

一部纪录片告诉我，黄河源头地区的野驴一出生，便带着一身的御寒长毛来到这个世界，10分钟后即能自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己去吃母乳。而人却不能，人是一丝不挂赤条条地来到世上，大约一年后，才会摇摇晃晃地走路。

发展经济是人类的自由。

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先进。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种种需要，为了满足人类膨胀的物欲，大量消耗煤炭、石油、钢铁、水泥和化肥……是人的自由，但这自由有个限制或界限：

不能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否则就等于人类自杀。

不久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强调，世界各国务必要把“气候改变”作为严重威胁全人类的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来看待，千万不可等闲视之，听之任之！

如果不采取措施，气候改变将在今后短短的20年达到危险程度。从2026年到2060年，地球温度将会比前工业化时代高出2摄氏度。

专家发出警告：“各国都必须认识到，气温升高超过2摄氏度的界限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全球变暖，正在导致喜马拉雅冰川迅速后退，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要知道，该地区的冰川是除南极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的冰源，今天它正在以平均每年10米到15米的速度后退。

其恶果是“大自然的秩序因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发生了变化，以喜马拉雅

雅冰川为水源的长江、黄河、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和澜沧江等七条亚洲最大河流的水量将下降,生存在这些流域的数以亿计的人口将面临缺水的威胁!!!”

事实上,我国西北部,青藏高原的湿地已经出现了湖泊水位下降、湖面缩小、河水和溪水断流等可怕现象。

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缺水是件很可怕的事。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每年3月22日是“世界节水日”,这个日子提醒我们:清洁饮用水是有限的!

一个欧洲人每天用水约135升,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平均每天只有10升水可供使用。苏丹人平均每年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远处弄水,一家人在同一个盆里洗手,由最年长的男性先洗,等轮到最小的孩子时,洗过的手比洗前还脏,而孩子就用这双脏手吃饭。在过去10年,死于腹泻的儿童超过了二战后所有武装冲突中死难者的总数!

看来,人类的自由是在有限清洁饮用水这个大前提下的自由。

“限制和自由”这个哲学课题并不是腾云驾雾、虚无缥缈的玄想,它同当今的现实世界是紧密联系的,它理应指导我们的大小行动,从不闯十字路口的红灯到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所以说,我们地球人的行为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它必须受到限制。目前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其实我们每个人从日常生活做起,也能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比如减少能源消费是防止气候变暖的最有效的方式。

合理使用空调是其中一项。夏天,最好把空调设定为28摄氏度,当然你可以把它定到20度,说:

“这样的室温我才舒服!电费我出,我爱定到多少度就定到多少度,这是我的自由!”

但这种自由是自私的,不道德的,应当受到谴责。

在这个世界上有大道德和小道德之分。无视地球环境被破坏是最大的不道德,不讲道德的自由就是犯罪。

从环保角度看,我国汽车市场的迅猛发展是灾难。

车子越多,消耗燃料和沥青也越多,道路占用农田的数量也越多。在对汽车迷恋的背后,我更多看到的是潜伏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可取。

膨胀的世界人口乘以横流的物欲是大自然生态环境承受不了,也是它不



喜马拉雅冰川是亚洲七条大河的水源。它支撑着数亿人的基本生存。

允许的！

当然大自然给人类设置的根本限制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

一些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当是更为严厉、不可逾越的根本限制，比如热力学三大定律：

“自然规律是这样的：它们使（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的制造成为不可能。”（爱因斯坦语）

“绝对零度不可能达到。”

大自然偏爱用“否定句”来表明自己的基本态度和最高意志。

这三个“不可能”正是大自然设置和规定的基本限制，人类只有在严格遵守、绝对服从它们的前提下才有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

在前面“势能和动能”一文中，我已经谈到过在轨道上运动的小车无论如何也休想超过 25 米高；橡皮小球也不可能弹跳到高于地面 5 米的地方。

人类一部科技史告诉我们，科技活动只做一件事：

在各个领域努力揭示、发现大自然设置的基本限制，然后在限制的大框架内力争人类的最大自由度。

医学科学为糖尿病患者指出了一个大基本限制：

以一个中等体力劳动者为例，按体重 60~65 公斤计算，全天摄入的总热量约为 1950 千卡，不得超过，超过了，病情会加重。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是大自然给人类及万物设置的另一个最大的基本限制。我想起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三段论学说：

凡是人都会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谁能冲破这个大基本限制？

秦始皇？汉武帝？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还是斯大林？

都不能！因为他们都是人。

这个限制是大自然设置、制定的，亚里士多德仅仅是用自己的哲学智慧发现了它，把它写成三段论。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自由度仅仅是在这个大基本限制的大框架内力争活得最潇洒、最幸福。

二、政治秩序板块以及个人同国家的关系

人的自由度是在好的政治秩序和善的国家这个大前提下实现的，或者说，善的国家和好的政治秩序是个大框架。

每个公民的自由度只能是在这个大基本的大框架内的自由度。

在这种意义上，我赞成黑格尔提出的命题：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国家是自由的实现，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因为有了国家然后才有的。在地球上，国家是神圣的观念，只有服从法律，个人的意志才有自由。（《历史哲学与讲演录》）

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估计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影响。这位古希

希腊哲人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政治性的动物。”国家是最高的社团，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国家是人类生活必需的东西。

所以我赞成这种说法：只有在最高正义和最大良善的国家框架内，个人意志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

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1825～1864年）有个绝好的命题说：

国家的最高使命是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空间发展。国家作为一切人的机关用自己有效的双手去安排一切人的生活，把一个个单个人统一为一个道德的整体。该整体会使得加入其中的一切个人的力量增长千万倍，帮助个人实现他单枪匹马时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达到个人永远也达不到的那种生存水平——国家正是为此而存在的。（说得很到位！）

无独有偶。我国儒家学说早就把个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同国家联系起来，并构成了这样一条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个人意志的自由只能在这条链上，而不能在链外，如果国家是好的、善的、公平的国家。

三、经济秩序与个人自由

各个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在一些基本限制下的意志自由，无视基本限制的经济发展一定会走进一条死胡同。

人口、资源和环境处在尖锐矛盾中，这是全球面临的困境，我国的形势尤为严峻，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以严重破坏生态和环境为沉重代价了。

四、社会秩序与个人的自由

“人”这个汉字很形象地表明了人的本质：人和人相互依靠，互助。

绝对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与人只有互相协作，人才能成其为人——这又是一个基本限制或大前提。

个人的自由是这个限制内的自由。

陶渊明隐居躬耕，从尘网中冲决了出来，好像与社会其他成员无关联，其实不然，他不可能完全超脱人与人互助、协作这张社会关系的大网。

他说，“结庐在人境”，可见他生存的环境毕竟还是在“人境”中，而不在“人境”之外。

建屋时用到的木材、砖瓦和石头等建材估计是诗人请村民帮工弄来的，

毕竟他的“草屋”有八九间。不依靠他人的帮助，诗人独自一人岂能完成？

他辛勤劳动，种豆除草，常常是“带月荷锄归”。不过铁锄绝不是诗人自己打造出来的，一定是进行商品交换得来的。因为陶渊明无法做到一个人去开铁矿，掘煤，冶炼铁，打造锄头和镰刀。当然，为了写诗，他还必须一个人独自去造纸，制作毛笔。

就算这一切的一切他都能独自一人做到，这时候，他已是精疲力尽了，哪来剩余精力再去“登高赋新诗”？再去“清吹与鸣弹”？再去读《山海经》？不要忘了，这18卷记述古代神话传说的书是前人精神劳动的产品。

所以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组织（网络）中的存在，个人意志的自由是该组织内的自由。

它的自由度是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基本限制规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怀双重的感恩之情：

感谢大自然年年月月日日赐给了我许多（比如风调雨顺，春有和风，冬有瑞雪）；感谢社会其他成员为我付出的辛勤劳动（包括粮食、煤气、电和自来水），我的生存才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懂得双重感恩的人一定是好人，有充分、真正自由感的人。2005年11月上旬，法国许多城市发生社会骚乱，闹事和暴乱者都是年轻人。社会秩序遭破坏，是法国人的不幸。

五、个人内心世界的限制和自由

不错，我们拥有丰富的想像力，拥有五花八门、变化多端和神通广大的幻想以及编织一个个白日梦（Day-Dream）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有意志的自由或自由的意志，甚至可以夸下海口，说：

“My Mind to Me is Kingdom is.”

（吾心于我即一王国）

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这样说，这样宣称。

我国古代哲人非常强调内心的潇洒和自由。上个世纪20多年（1957～1978年）的极“左”政治时期，外部环境严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只好退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自由。所以便同古人发生了共鸣。

陆象山（1139～1192年）有个命题对我是个鼓舞：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宇宙。”

在那种非常压抑的年代，这样的自由度霍地凸现在我面前，使我耳目一新，仿佛从一个很深的峡谷走出来，突然看到一大片广阔的地平线，我是手

舞之，足蹈之。

韩贞（1509～1582年）也说：

“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原本少些事，何须向外寻？”

当年的我，视“心神奔驰于内，欣然自得”这种说法为一个救生圈。

陆象山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命题进一步扩大了我内心世界的自由度：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在外界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的时期，这样的命题无疑大大加强了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在我的青年时代，“自由及其本质”成了我最紧迫、生死攸关的思考课题之一。当然，不仅是思考，更重要的是实践，在实践中去实现我的自由观。

我把自由看成一种对外界依赖程度减低到最小的行为。

这也是我看重数学王国的理由。数学王国就是自由王国，数学里的自由度非常广大，比如几何学中的圆。

圆的定义是：与一给定的点成一给定的距离的一切点所组成的集合便是一个圆。

从该定义出发，几何学家即可推导出许许多多非常精美绝妙、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定理，从而砌筑成一座有关圆的宏伟的、自给自足的几何学大厦——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所追求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心灵上的超脱。

“自由”这个课题非常广泛、幽远，有许多侧面。

自由是认识必然之后的自由。

比如，我家住在六楼。为了去买菜，我每天花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走下一级级楼梯。不可心急，用三秒钟的时间从六楼直接跳下去，其后果必然是摔死或摔成重伤。

基于这种认识，我每天走下楼去每回都是安全的，可见这里有条逻辑链。

必然王国 → 自由王国

在人间无数世务方向，这条法则仍旧成立。

二战末期，德国许多城市被毁，这是报应。因为战争是纳粹德国发动的，挑起的。希特勒认为：必须用武力去建立欧洲新秩序——这是他的自由观，也是他意志的自由。

希特勒的一生是他的邪恶意志自由表达的一生，结果是欧洲千百万人头落地，千万栋房屋被毁，德国的城市也成了一堆堆废墟。

这是必然结果。因为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违反了人间的道德律，它是反人类的。

自然律加上道德律才是自由的最大限制。

不错，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是自由的，但必须是在不违反自然律和道德律的大前提下它才能实现。

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今天我才明白，不惑和知天命的主要含义之一是对这两个大前提的敬畏或肃然起敬，绝对服从。

没有为所欲为的绝对自由。

限制是太多太多。

爱因斯坦是这样谈到这个人生哲学课题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去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对我便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自《我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在好几处都引用了叔本华的这句箴言。

这句话很深，很哲学味，不然，何以能打动爱因斯坦？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按我的理解，是叔本华指出了人的自由的根本局限性。

比如“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成语便道出了这限制。

这里的“心”其实是“脑”。古人认为是心支配、指挥人的一切行为。

人的欲望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大，而满足欲望的手段又很有限。这个差距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人脑结构决定了的，这对人的一生是一个根本性的限制。

叔本华深受佛教哲学影响。

佛教哲学的主要课题正是针对人的无止境的欲望链，企图从中获得解脱——自由即解脱。

佛教主张应当遏制过度膨胀的人欲：“新月有圆夜，人心无满时。”（《五灯会元，卷十六》）

在另一处，爱因斯坦继续追随叔本华：

“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

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自《探索的动机》一文）

在今天，佛教主张遏制的物欲横流具有现实意义。这主张是哲学，是智慧，不是迷信。尤其是当物欲无节制地膨胀会造成生态环境灾难的时候，遏制它是人类的自我拯救，人的物欲不应是无限度的。

当代环保主义和经济思想应从佛教哲学的宝库中吸收一些有益的思想，为“改造人心工程”服务，这才是治本，不是治标。

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传统的儒释道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故纸堆。把它们“推陈出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紧迫课题。节约型社会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人口众多，用这个基数去乘以 膨胀人欲即等于对环境的总压力。据统计，我国主要污染指标（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 8~9 倍！这便是我的最大痛苦和忧虑，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连个科长、副处长都不是。

深更半夜，我经常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

最后我想说：人有一串大大小小的欲望，人是欲望构成的，而每个欲望的满足都要依赖外界（包括物和他人）。比如：

食欲的满足要依赖猪、牛、羊肉，还有奶油、糖和酒等。

情欲、爱欲和性欲的满足要依赖另一半（她或他）的通力配合或合作。这依靠便是前提或限制。

当然，“手淫”不依靠什么，全靠自己的手。男女都有这种行为。

不过汉语“手淫”这个叫法没有自力更生的意思。

德文的“手淫”是 *Selbstbefriedigung*，即“自我满足”——这个术语很富哲学味。

如果人的大小欲望都能“自我满足”，对外界（包括能源和他人）的依赖程度压得最低最低，那么，我们的人生世界便会轻松得多，好得多，和谐得多，自由的地盘也会广大得多。但事实并不如此。

人只有清晰地意识到一些基本限制并加以承认的时候，他才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

相反，那些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拥有无限自由（可以无视自然律和道德律）的人，他到头来必然会丧失掉起码的自由。

原因和结果

万事万物都被牢牢地钉在“因果”十字架上。
从太阳系到人，再到细菌和病毒，再到分子和原子，都挣脱不掉“因果”编织的链和网。人的思维水平一旦倒退到因果律之下，人便会成为低等动物。所以说，人是握有因果法则的高等动物。正是依靠因果思维方式，人才占有统治地位。

——2005年4月3日于上海衡山路凯文咖啡屋

这才是宇宙间最重要、最广泛的一对范畴。

没有原因的结果是没有的。同样，没有结果的原因也是没有的。它们各自不独立，两者一前一后，成对出现。

万事万物都在“原因→结果”之链及其网络中。

谁也挣脱不了这链，这网络。

世界就是这链，这网络。

夜深人静，或独自一人在秋夜下散步，每想起这链，这网络，从我的内心便会生出一个大大的、重重的惊叹号！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构成的？这是为什么？

我不信寺庙里的神，也不信教堂里的上帝。但我笃信“原因→结果”之链及其网络。

上帝是该网络的编织者和总导演。在该网络的后面，站着的正是我心目中的上帝。

上帝是原因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一切原因的原因，是最初第一个原因。宇宙间的一切大小原因都是这个第一原因派生出来的。

在最初第一个原因的后头，再也没有什么原因。

人生和世界都是“因果”的编织物。

先有因，后有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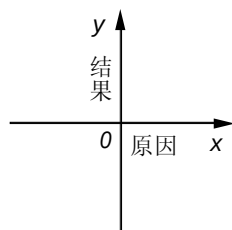
而不是先有果，后有因——这逻辑前后顺序不可颠倒。

比如有一顽童用皮弹弓击中我的书房玻璃窗，这个事件的逻辑链是：

石子从弹弓射出来→窗子的玻璃被击碎

不可说：因为先有玻璃窗被击碎，后才发生石子从弹弓射出来。（这部电影不可倒放！）

许多年，我一直敬畏“原因→结果”这个“十字架”，在我眼里，这个



这是“因果律”构成的十字架（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统统（无一例外）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每当我想起这一点，内心便会冒出三个惊叹号来！！！

世界人生为什么是这样构成的？为什么具有这同一个结构？世界人生永远是“因果”的世界人生。这是不可改变的命。

所有的结果都有其原因。有些原因我们查找不出来，只因为我们暂时没有能力。但它存在着，待我们去发现。（比如艾滋病的病因）

十字架才具有一种最高的神性。我只对它下跪，但拒绝在寺庙和教堂里双膝跪下。

它才是我的宗教信仰的象征，如果这也叫宗教信仰的话。

这是“宇宙宗教”。(The Cosmic Religion)

许多年这个“十字架”一直在拔高我的胸襟，也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方法之一。

一、宇宙第一个原因

假设有一天，我的窗户玻璃突然咔嚓一下破碎了。我一定会追究破碎的原因，不外以下五种：

1. 窗外有某个顽童用一块石子击中了我的窗
2. 发生了地震
3. 附近发生了爆炸
4. 由于温度骤变，玻璃破裂了；
5. 目前找不出的某种原因。

总之，窗户玻璃突然破碎这一结果，肯定有个什么原因，不可能没有原因。

如果是出自顽童的原因，我便可以追问：

顽童用手抛射出石子，要消耗能量，他的能量来自哪里？

答：因为他吃了饭，一碗燕麦粥，两片面包，两个鸡蛋，一块炸猪排。

问：燕麦是怎样生长的？猪又是怎样生长的？它们的能量从何而来？

答：多亏了光合作用。

问：阳光又是从哪里来的？

答：太阳内部每秒钟有大约400万吨以上的氢氧与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以光和热的形式到达地球。

问：这些能量又来自哪里？

答：来自大约150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之后宇宙在它的水平上继续演化。

问：那么，大爆炸的能量又从何而来？

答：来自造物主（上帝）也就是第一个原因。

问：上帝又来自哪里？

答：不能再往下追问，所有的追问都必须在这里打住，往下再也没有原因。

上面一串追问是从结果一步步追溯，一直追溯到上帝尊前这个第一原因，最初的原因，太原因，原（元）原因。

记得1958年的一天，我在北大靠西校门的大图书馆读书，偶尔从一本英文词典读到“The First Cause”（第一个原因），解释为“上帝”，当时我的理智受到的震动是难以言表的！！（是的，三个重重的惊叹号）

这是形成我的“上帝观”的第一步；也是我在北大读书六年最主要的收获之一。我忘不了三个字母都大写：T,F,C。

自那天至今，47年一晃而过。这差不多已是我一生。

其间，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The First Cause”只是个空筐，我要用自然科学领域的令人信服的最普通的基本事实去充实它，填满它——这也是我同自然科学一层最主要的关系。我心目中的自然科学一直是走近“上帝”的自然科学，这点对我很重要。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大方向。

在我看来，自然科学的最高目的是走在追寻“第一个原因”(The First Cause)的路上。

这也是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喊出的一句纲领性口号：

“Hin zu Gott！”（朝上帝走去）

这里的上帝同教堂里的上帝是两回事，尽管用的是同一个词。普朗克、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上帝同“The First Cause”才是一码事。

在上面，我从玻璃被击破这一事件，仅用了八九个有限步骤便追溯、推理到了“上帝”尊前。可见人的推理能力能达到的范围有多远，多大！

老子也是从结果追溯到原因。

他一定惊讶天地万物从何而来？

不过他的表述却是从“第一原因”一步步推理出一串结果：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无疑是“第一个原因”，在“道”的前面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原因。

下面两条“原因→结果”链在逻辑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原因→……→窗户玻璃被击破

道→……→万物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从结果去追溯原因。

常常，一个结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比如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希特勒为什么能取得政权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再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政权会失败？“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都涉及对“因果”关联的分析，可以写出四本厚厚的专著。

二、怎么也挣脱不掉“因果”这个最伟大的“十字架”

到处都是“因果”垂直交叉而成的“十字架”，谁也挣脱不掉它，从身边的小事到世界性的大事。小事件对应小因果，大事件对应大因果。

万事万物都在“因果”编织的网络中，因果律才是天下第一个对立统一法则，总编导只能是造物主。对此，我们只有惊讶。我便是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惊讶中渐渐走向成熟的。

有一天我骑车，突然前轮瘪了，我只好推着它走。不远处有个修自行车的摊位，老师傅把前胎浸在一盘水里，作了360度的旋转检查，突然有气泡往上冒，师傅断言：

这里必有一个小洞，估计是被玻璃或铁钉刺破的。

所以修自行车这种摊位的业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吃“因果律”这碗饭：

因为轮胎被刺破，所以要补胎。

从语言构造或哲学结构来看，因果律的句型是：

“因为……所以……”

“因为冬天到了，所以白杨树的叶子全落光了。”

那么，为什么冬天一到，有些树的叶子会落光呢？为什么有的树（比如松树）不落叶呢？再去追踪原因。

我们每个人从呱呱落地这一刻起，便掉进了无数“因为……所以……”这种性质的大小链中。

“因果律”养活了许多人，为千百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我家附近有个修钟表的摊位。摊主的老婆不工作，靠他养，有个孩子，八岁。

“因为发条断了，所以钟不走。”

他就是靠“因为……所以……”这条因果律来养活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他是手赚口吃。

从这种意义去看，他和天文学家的职业是相同的。区别仅在于：国家给天文学家发工资。钟表不走是小事件，天文现象是大事件，但大小事件都是由“因果律”支配的。

天体物理学家在追问：

在一万年的太阳光照中，太阳的亮度起了变化吗？

太阳亮度是否有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得太阳保持不变的亮度？

有种假设说：太阳体积虽然正在收缩，但它的能量因为引力作用而释放出来。因为有了这种补偿，所以太阳的亮度才能保持不变。

最近几年，我一直注意房屋的裂缝问题。

这种现象不仅普遍，而且相当严重，我家的墙便有一条长长的裂缝。我国工程结构裂缝控制专家王铁梦是我的朋友，有一回我们互赠新作，他送给我的书是：《工程结构裂缝控制》（610页）。在488页，铁梦写道：

“裂缝的原因也很复杂，如不均匀沉降、温度变化、收缩、冻融、冻胀、湿胀以及荷载的作用等。不过，裂缝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变形变化和荷载变化。”

前年，我同铁梦先生经常在顾问委员会上碰面。有一回在酒席上他说：“建筑结构的裂缝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有害程度可以控制。把它控制在无害范围之内是结构工程师的艺术。”

在本质上，家庭、社会、国家、国际关系（国际社会）也是广义的“建筑结构”。裂缝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当它变得严重时，便要研究产生裂缝的原因（有时是多个原因），然后加以控制在无害范围之内，比如当今中日关系的裂缝。2005年11月法国社会骚乱也是社会结构出现严重裂缝造成的后果。

家庭破裂、解体是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钉在大大小小的“因果”十字架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牢牢地钉在那里，动弹不得，这才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命。

比如，某人之所以在1980年×月×日出生，只因为1979年×月×日其父母正在热恋，一时冲动，跑到幽静的山谷里去欢爱，播下了“某人”这颗“良种”。

2070年×月×日某人去世。因为那天大地震，某人死于那次天灾。而地震之所以发生，是有其原因的。

“因为……所以……”这个十字架伴随了我们一生从头到尾。

如果在我的胸前挂了一个十字架项链，请莫误会我是个基督徒，不。

“因果律”及其制定者才是我心目中的上帝，它同教堂、寺庙无关。

三、人为什么会犯罪？动物为什么不会犯罪？

近年来，我老是在思考这个课题。一旦时机成熟，我便动手写本专著，为的是满足我追寻原因的快感。

我们得承认，人生有许多种快感。追寻事物的原因，也有一种快感，小事件的小原因对应小快感，大事件的大原因对应大快感。

在宇宙茫茫的时空，太阳为什么会诞生？为什么会出现地球？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生物的多样性？人类为什么会诞生——都是些大事件。

2004年12月底，印度洋海底大地震引发的大海啸也是大事件。

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也是个大事件。

我们经常读到有关这类案件的报道。

在某城郊的水沟处发现一具已高度腐烂的女尸，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在追问死者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若是他杀，那么，凶手是谁？作案动机是什么？

这种具体的案件当然是个小事件，是刑警大队探索的对象。他们吃的也是“因果关联”（或因果律）这碗饭。

“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一追问是大小案件（包括人类一部战争史）的集合或总体，带有普遍世界的性质，所探讨的是人类犯罪行为的哲学基础。比起上面提到的女尸，它无疑是个大事件。

大原因产生大结果（大事件）。追溯它，探明它，必带来大兴奋、大刺激、大快感。

犯罪的原因有时是多重的，好几个原因联结在一起是常有的事。

出于报复、复仇心理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犯罪原因。

比如25岁的某男同某女有三年恋爱史。有一天，某女突然宣布同某男中断恋爱关系，某男便将某女的左乳房割掉，然后潜逃到云南。这时某男的报复心理变态了：

只要看到乳房大的女性，某男便冲上前去，用小刀将乳房刺伤。因为某女有一对丰乳，所以某男对所有的美乳发起攻击。

对“谋财害命”这类因果关联，我不感兴趣。

我特别关心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原因，这才会给我三个惊叹号！！！

比如血管收缩素水平。行为神经生物学家通过实验注意到：通过药物，提高大鼠血管收缩素水平，结果是大鼠的攻击（暴力）行为减少。

医生在九岁女孩蕾切尔身上用了血管收缩素，结果她安静了，六周后她出院了。原先，她经常有突发性的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不分青红皂白，无缘无故地殴打周围的人^①。

儿童暴力行为归根到底是受“因果律”的支配。

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儿童攻击行为的60%由遗传决定，40%由环境决定。

事实上，每个人的行为都是遗传和环境共同纠结、编织、混杂在一起的结果。

行为是许多分力在一起（合力）的总结果。

比如我们理应这样去分析，才能把握希特勒此人及其第三帝国的种种行为。18岁前后，希特勒在维也纳街头所过的流浪生活和遭遇到的种种挫折是他日后行为的总根源。

是的，我特别热衷于“犯罪原因论”这门学科。

如果没有因果关联，因果律不是普遍的成立，那么，人类犯罪现象和行为便是一团原始的混乱，无法梳理、理解。

我推崇20世纪德国犯罪学家冯·亨梯希(Hans von Hentig, 1887~1974年)，他活了87岁。

1934年他任波恩大学法学院院长，讲授犯罪学。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次年流亡美国，并在那里的多所大学任教。战争结束，1952年他返回德国，任波恩大学犯罪学讲座教授。

2004年秋天，我又一次造访波恩，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故居，因触景生

^①《The Science》，1996年3~4月号，F.Ferris论文。

情，自然想起他的一些论著，比如《犯罪：原因和条件》(Crime: Causes and Conditions), 1947年，英文版；《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的社会生物学研究》(The Criminal and His Victim: Studies in the Sociobiology of Crime), 1948年，英文版。

我欣赏“社会生物学”这个术语。

它是个合力，等于社会的力量加上罪犯体内生物学的力量。

亨梯希认为，犯罪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的力量(Social Forces)包括失业、物价暴涨、家庭不和、私生子、继子女、孤儿院的经历和结交的伙伴等。

亨梯希确信，犯罪行为 and 生物学有因果关联。比如：

1. 统计数字表明，身体残疾人容易成为犯罪人。比如，在圣昆丁监狱的犯人中便有12%的残疾人。

2. 遗传与犯罪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3. 身体过分强壮与犯罪也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因为这些人思想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心理自我控制力又较差。这样，精力(能量)过剩，便容易出现反社会的行为。

4. 在西方，左撇子被看成是不好的象征。有犯罪学者发现，在谋杀犯中，左撇子占12.5%；在强奸犯中，占7.8%；在盗窃犯中，占17.3%。在累犯中，占23%。

在地球物理因素与犯罪行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联。可见，因果律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宇宙时空中的大小事件都发生在该网中，而不在网外，网外无事无物。这规定和安排全然出自造物主的双手，造物主偏爱因果律，通过它去管理、统治宇宙，使万事万物秩序井然。

比如亨梯希发现：

1. 气候因素对人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2. 季节和犯罪也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比如谋杀多发生在6~10月；盗窃犯罪大多发生在10~12月份。

3. 昼夜变化和犯罪也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少年犯罪的高峰时间有两段：下午4~5点；18~19点。

抢劫犯罪的时间有两个高峰：上午10~12点；夜间20~22点。

4. 在一周内的不同时间和犯罪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暴力犯罪和恶性案件集中在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

男性自杀大多发生在星期一，女性自杀大多发生在星期日。

自杀好像是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其实自杀行为同样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因为精神太痛苦,所以只好用自杀来求得最后解脱。

我手头上有研究自杀现象的日本著名学者若一光司的两本专著:《自杀者的时代: 20世纪的144人》,1999年;《自杀者: 118位现代日本人》,1999年。

在头一本书里,作者分析了王国维、江青和顾城的自杀。

不用说,自杀行为归根到底受因果律的支配。

在世界上,日本人喜欢自杀是相当闻名的。2000年我在东京等地铁,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车子开来,据说是有人跳进了轨道自杀。近年来,日本自杀总人数连续突破三万大关。

日本居然还有一本《自杀手册》卖得相当火爆。

为了遏制自杀风,东京地铁站已采取措施。比如沿着站台设置一些镜子,让那些想自杀的人得着最后一次机会看到镜子中的“自我”,对自杀的理由、原因三思而行。

美国14岁的神童布雷默饮弹自杀是另一个例子,时间发生在2005年3月15日。

布雷默在只有一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四岁参加钢琴比赛,11岁开始学大学课程。他能在10天内完成别人一个学期的功课,他酷爱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子,也热爱游泳、滑冰、钓鱼和看卡通片。

他创作过一首现代风格的钢琴协奏曲《水》,并灌了唱片。那天他在家开枪自杀,没有留下遗言。

他的自杀是一个谜。推测有以下两个原因(自杀是结果,没有原因的结果是没有的——这是宇宙间最普遍、最高的原理,比能量守恒还要高出一个层次,因为能量守恒原理不能包容它,它却能包容能量守恒原理。因果律是大圆圈,能量守恒原理则是个较小的圆圈):

1. 世俗的物质世界对他来说已经单调、枯燥,再也构不成挑战,失去了魅力,不再眷恋,所以该走了。

2. 生前他常说,如果他死去,希望有人从中受益。他母亲猜测,也许他是为了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别人才决定自杀。事实上在他死后,肾脏捐给了两个人,肝脏给了一个22个月大的大婴儿——这个自杀的理由相当奇特,但对布雷默却是一件很自然、符合逻辑的事。

他的非常独特的死依旧在“因果律”的统辖范围之内,这对我来说,毕竟是一个安慰,叫我不至于失眠。

至于人为什么会犯罪，动物则没有犯罪一说，理由是复杂的。

要害问题是：人类社会有伦理道德和法律，人欲一旦同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犯罪便成立。动物世界既无道德律也无法律——至于道德的起源，这是个哲学问题，康德追问过。

电视《动物世界》是我最爱收看的栏目，“野牛和狮子”令我沉思。每年美洲野牛（好几百头）都要大迁徙，七八只狮子伺机发起攻击。一头老弱病残的牛掉了队，便成了狮子的一顿美餐——其实这是自然淘汰法则的体现，是大自然上帝的精心安排。一头老弱病残牛的贡献不仅让狮子饱餐了一顿，使它们能够生存下去，也让一些秃鹫能分到一些残羹剩饭——很难说，狮子围攻、吃掉一头可怜、无助的野牛是犯罪行为，自然界没有善恶，自然界只有因果关联，只有由一连串因果关联织成的网。

分清善恶纯粹是人类的事。

四、贯穿人类医学史的因果律

如果因果律不存在或失灵，整个医学史和当代医学科学大厦便会在顷刻之间轰隆一下坍塌！

因果律是医学大厦唯一一块基石，也是一条最高法则。

医学起源于人的痛苦、不安和惊讶，起源于追问“为什么”。

人类文明之旅紧紧同一部医学史捆绑在一起，难分难解，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医学史包括医学思想或观念史（它的灵魂不是别的，正是因果律），医学状况史和医学人物史（他们是应用因果律的典范）。

其中有两门学科最能鼓励我用因果律去梳理一堆纷然杂陈的事实：“历史病理学”，“历史地理病理学”。

没有观念或理论，一堆事实便是散乱的，盲目的，没有秩序；没有事实，理论或观念则是空洞的。

而因果律则是最高观念，是理论的理论，是第一理论，是统摄所有理论的理论，是大理论，原（元）理论。

大自然无非就是一串无限的因果序列。

设想一万年前的祖先有人突然上吐下泻，腹部剧烈疼痛，且伴有高烧。三天后，病人死了！

接着，又有几个人以同样的症状和方式病倒了，死了！剩下大约 90% 的人只好搬出山洞，到别处去狩猎，采摘野果。当时他们还不懂得把尸体埋

葬掉。

死者的亲人会哭吗？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估计会，因为人是会笑会哭的动物。

在死亡面前，人们心中充满了不安、痛苦和恐惧——这是基本事实。

在三万个人中间，总有一两个善于思考，刨根问底的人会十分好奇和惊讶，并在心中暗暗地追问：

“病”和“死”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或许他会把“病”和“死”同前些天的雷电交加、风雨大作现象联系起来，用相当原始、模糊的语言说：

“因为上天发怒，惩罚人，所以人才生病，死亡。”

读者，请注意这个句型：

“因为……所以……”

这便是因果关联，是因果律的核心或灵魂。

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表达问题，语言和思维是一回事。

估计一个孩子会说“因为……所以……”这种句型是两三岁左右的事。

“因为我刚喝了一大杯水，所以我不渴了。”

当一个两岁的孩子能说这个句型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水平便迈进了一个新台阶。

在进化史上，人类说出这个因果关联的句型，估计用了好几千年、上万年的漫长时间。三万年前人类的智力估计不会比今天两三岁的孩子高出许多。会不会说因果关联的句子是衡量孩子思维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原始人把疾病的原因归结为至高至大或威力无比的自然神的时候，医学便宣告开始了！

尽管这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医学，而是巫术的、宗教的医学。

我之所以如此看重它，说它是医学的开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因果关联的句型，这就为日后科学医学的真正到来埋下了伏笔，因为谬论常常是真理的先导。

医学的源头同宗教的源头是捆绑在一起的，两者的目的和起源颇为相似：为了防范邪恶的灾祸，求得吉祥平安。

人们企图用装神扮鬼，不断念咒语的“以毒攻毒”的办法来驱赶病魔和邪气缠身。

这里的要害是出现了因果关联的逻辑思考方式：

“因为中了邪或魔鬼缠身，所以人才生病。”

而人类把这个“邪”字替换下来，最后（渐渐地）用各种致病的细菌和病毒（真正的原因）去填补空缺，花费了好几千年再加上许多个日日夜夜，走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中显微镜的发明是件大事。

在人类医学史上，寻找产生疾病（如艾滋病、糖尿病）的真正原因永远是头等大事。

出奇制胜的重大突破常常不是来自医学本身，而是来自别的领域，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

人类为了寻找病因真是绞尽了脑汁。

澳大利亚土著认为女人来月经是因为虫咬所致。

当然这也是因果律的一种解释。

母猩猩、母牛、母马……也会来月经，但这些野生动物的大脑发展水平绝没有达到去追问为什么会有月经的程度，更不会使用“因为……所以……”这个因果关联的句型去作出解释。

马来人认为某些疾病是一种叫“班图”的鬼所致。

南非原始部落则把引起湿疹和麻风病的病因归结为是一种魔鬼。

事实上，人是这样一种高等动物：

他要为万事万物的发生找出理由（一个或众多个原因），即便是自圆其说。找到了，便是一次决定性突破。2005年秋冬之季禽流感的阴影笼罩了全球，人类找出了致病的病毒。不仅如此，瑞典科技摄影师尼尔松还拍摄到了这种病毒的真面目，即把它放大了一百万倍的图像。

也可以说，人是善于应用因果律的动物。正是这一点，才把人同野生动物区别开来。

巫术医学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中都存在过，而且时间延续了好几千年。小时候我在江西农村生活过一段日子，1948年我10岁，记得当时有人生病，卧床不起，便请来远近闻名的巫婆来赶鬼，驱鬼。那巫婆约莫60岁，穿戴自然很怪异，为的是表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她手拿一摇铃，口中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懂，也许连她自己也不懂），围绕着病人，一会儿跳，一会儿唱。当然，香火和爆竹声是少不了的。

按性质，这是一种宗教仪式医学。

它也在找病因，但不对头，驴唇不对马嘴。

自那以后，57年过去了，那情景，今天我还记得。

不久，我也小病了一次，发烧，说梦话。母亲请富有人生阅历的大伯母来商量，下判断。

“前天，鑫儿和一群野孩子到老福山坟场去玩，第二天就发烧。”母亲对大伯母说。

“受了吓，丢了魂。断黑黄昏要叫魂，收魂，三天后必好。”

大伯母把我生病的因果关联交待得一清二楚。对此，我母亲是确信不疑。

“鑫仔呀，跟娘归来哟，回家来……”当时在我听来，母亲为我招魂的声音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虔诚、祷求的成分，也有少许恐惧的元素，因为时间是黄昏薄暮，建筑场又是清代末年的一栋破旧古屋，母亲的喊声是颤抖的。

三个黄昏母亲为我连续招了三次魂，喊声悠长，凄清，在远近空间回荡。第四天，我便全好了。这是大伯母的判断胜利吗？下面这个涉及因果关联的句子成立吗？

“因为我丢了魂，所以我生病。”

“因为我的魂被母亲招回了，所以我康复了。”

按语法，这样的句子很好，小学语文老师会打100分，但医学科学家说：

“一派胡言乱语，胡说八道！”

这是些假句子，伪句子，尽管语法完全OK。

2005年3月28日我牙痛，29日印尼发生了9级大地震，我是否可以写下这个句子呢：

“因为我牙痛，所以印尼发生了大地震。”

这两个事件，在时间顺序上一前一后，真的有因果关联吗？

好像有。但这是假象，根本不存在。

我的牙痛和印尼地震没有任何逻辑关联。

因为它是不可重复的，不是恒定有规则地发生。

因果关联的句子结构是：

“如果……那么……就一定发生。”

比如：

“如果我牙痛，那么，在第二天地球上的某处就一定发生强烈地震。”

千百次，万次，十万次，这个句子均成立。

这才是可重复，这才是恒定有规则地发生。

在人类历史上，当人把原始森林中的第一棵大树砍倒在地，人类文明便宣告开始了！

当人第一次有意识，自觉地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并期待月圆过好几回

约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
(浮雕)

当时人们把肺癆、瘟疫、肿瘤……疾病都看成是由某种特定的魔鬼引起的。比如公元前18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便有这方面的记述。

“因为……所以……”这个因果关联句子的说出，标志着人类因果思维方式在医学领域的开端，尽管那是巫术（宗教仪式性质）的医学。毕竟这是关键性的一步。



之后可以收获，人类文明便宣告开始了！

与此相仿佛，当人第一次把疾病归结为某个原因（即便是上天的惩罚或邪气进入体内、魔鬼附身）的时候，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支——医学——便宣告开始了！

从人类进化历史来看，因果关联句子的出现表明人类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形成。正是因果关联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才造就了人，否则，人是不存在的，也不会有今天的现代人及其成就。

人类医学史首先是人寻找疾病的原因（主要是病原体）的历史。

人类寻找它，是为了同它摆开阵地，同它决战；因为只有先找到了，才能对症下药。

找到是第一步，对症下药是第二步，有效预防（比如免疫）是第三步。

自有医学以来，直到今天这七八千年，人类一直就在走这三步。其中因果律“因为……所以……”作为一条最高行动准则自始至终贯穿着全过程，指导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包括今天全球动员防治家禽流感大爆发。

在医学上，找到病原体（包括摸清传染途径）不仅标志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人类整个文明总体实力或水平（比如工业水平）的反应。

过去找不到，或者费时太长，今天则较快。

艾滋病发现20多年，最近才基本弄清了这种病毒是怎样从猩猩和猴子

身上传染给人的，不过至今还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尽管今天的人类手中握有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还会制造灵巧的机器人，发射了火星金星探测器，但在同艾滋病病毒斗智的时候，还无法克敌制胜，击溃对手，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有意识、有意志和有智慧的。（是这样吗？我想是的。）

当然，站在人类利益的立场，说它“大大地狡猾”也可以。

它会伪装、欺骗人体免疫系统，病毒也精通“兵不厌诈”，因为自然界奥妙无穷，原因和结果互相交织成一个极复杂的网络。达尔文曾幽默地说过：

“大自然一有机会就要说谎。”

因说谎，便大大增加了人们追寻真正原因的难度。用“摸着石子过河”来形容西方医学的进步是适合的，恰当的，准确的，而且很形象。这个比喻的实质无非是从结果去追踪原因，或者借用陶渊明的文学描述更接近人类医学文明之旅的历史真实轨迹：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桃花源记》）

将近七八千年的人类医学史，从巫术（宗教仪式）的医学到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医学，不正是这样一条历程吗？

如果把人类医学文明之旅看成是一条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帆船，那么，“因为……所以……”这条因果律便是一座耸立在迷雾中的灯塔。

关于西方医学的起源或源头，我自然想起古希腊医学特别是伟大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及其医学学派。

他出生在科斯岛。早年，他研究过哲学，所以他后来的医学思想（思路、观念和胸襟）具有很深、很浓的哲学味。（我偏爱这种味，因为它大气，触及到了根本和最高法则）

希波克拉底经常出外远航，足迹遍及远近许多地方，为他日后在医学上的集大成者和继往开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哲学只有同一些最基本的、颠扑不破的事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大作为，照亮世界。

关于这位“西方医学之父”，我想指出以下四点：

1. 他的基本理论是

人体是由四种体液组成的：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

他之所以提出这种理论，显然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水、火、土、气四元素是世界万物的根本原因——这是古希腊米利都哲学学派的重要主张。

所以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种体液同四元素（总根源）是对应的。前者是

子系统，后者是母系统。前者是从后者派生出来的。

他的医学思路是：

因为这四种元素比例恰当，和谐，所以人的身体健康。

若是比例、配合不当，失调，人便会生病。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因果律句型。

人脑具有这种思维方式或推理能力，是上百万年进化的结果。

当然，野生动物在因果关联方面也有一定的能力：

“因为有异样的声音传来，另外还有狼的气味飘来，所以有狼群发起袭击的危险”——野山羊或藏羚羊作这样本能的逻辑推理。这是生存本能的表现，也是上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不过野山羊的“因果关联”毕竟是初级的，人类的“因果关联”思维则是最高级的、复杂的，并上升到了精密科学的阶段——物理学的思路便足以表明这一点。

2. 古希腊哲学强调世界、宇宙的和谐，于是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路便是：

因为人体物质的相互关系处在完全和谐的状态，所以人才健康。

疾病只不过是和谐结构遭到破坏的反应，而治疗就是通过药物使人体的混乱状态回到和谐、井然有序。或者说，疾病是一种自然过程，症状（包括发烧）是身体对疾病的反应。医生的作用是帮助体内的自然力量重新回

在科斯（C os）岛，曾发掘出公元前4世纪的大理石半身雕像。人们猜测，这便是“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了。

在我眼里，他是把因果律成功地引进到了医学领域的一位大师。这才是“医学之父”的主要含义。

后来西医的节节胜利，归根到底都是西方人因果思维方式的胜利。其特点是进行定量分析。

同是因果思维方式，但在东方人和西方人那里是不尽相同的。前者是定性，后者是定量（即实验手段加上数学语言）。在物理、化学领域，西方人的定量分析思维表现得尤其典型，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医学的进步，使其走在科学医学的大道上，一直走到今天。传统的中医只是定性，不定量。



到和谐。

这些以“因果律”为最高指导原则的医学观念即便是从今天的水平去看也很深刻。

19 世纪德国伟大化学思想家李比希有句名言说：

化学应占 99%，哲学占 1%。

因果律思维在科学和哲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你能想像不进行因果律思维的一位科学家吗？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才造就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没有 1% 的哲学，化学只是一大堆零乱的、没有最高秩序做统领的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若是没有那 99%，哲学是空洞无物的大话，空话，是一张永远也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许多年，我一直记住李比希的这一“黄金比例”或“黄金分割”。

自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学派到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层面的医学，这个比例不仅照样管用，而且特别重要。尤其是 1% 的哲学。没有它，现代医学会迷失大方向。这里包括医学伦理学，如克隆人和安乐死。

3. 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对西方医学的基本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 17 世纪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接替它的占统治地位的，是细菌学说——有关致病的真正原因的学说。

4.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还不是科学的医学，而是属于“前科学的医学”。

真正的科学医学诞生在 17 世纪，恰如近代物理学诞生在伽利略的手脑并用。

哦，两千多年的曲折和迷茫！

只要人在追寻，在寻找真理，迷茫便是无法避免的。

细菌和病毒一定躲在暗处嘲笑人类的迟钝，就像逃脱了警察追捕的杀人凶手嘲笑刑警大队的每次扑空和判断失误。

不过，归根到底人类手中握有的“因果律”思维方式永远是克敌制胜的最有效的武器。

“因为……所以……”这一思路是铸造一切武器的武器，恰如人的双手（正确地说是手脑并用）是制造一切工具的工具，是工具中的工具。

中西医的差别却丰富了因果律。西医是先要在显微镜下看到了病原体（比如细菌或病毒），然后才同敌人交手。比如今天看清了禽流感病毒的相貌。

中医则不。

中医的因果思维是：因为人体内有一种自我康复的能力，所以用药只是

帮助人体恢复到原先和谐、平衡的状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自身能力，以消解、化解邪气的围攻。

希波克拉底也强调：“自然力是治疗疾病的医生。”

医生同大自然合作，结成联盟，可以使病人康复。

后来中西医在 17 世纪分道扬镳了。

西医走上了“实验加数学（定量）”的道路。

什么是定量分析呢？

比如今天的西方科学弄清了人的头发化学组成是：

45%的碳；28%的氧；15%的氮；7%的氢；5%的硫。

贝多芬的死因（又是原因！）一直是个谜，直到 2000 年科学家分析了他的八根头发才真相大白：

因为在这些头发中铅的含量是正常水平的 100 倍，所以才导致了贝多芬的死亡。

中医则不能胜任这种定量分析，这是中医的弱项。真的是弱项吗？

两三千年，中医一直在“哲学（定性）医学”的古道上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

在没有看见细菌和病毒的情况下（中医根本就不去假定有这种原因），中医照样能驱散、消解和化解一些传染病（包括一些癌），着实令我惊讶！

自从 17 世纪西方物理学和化学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科学大道以来，特别是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的发明，西方医学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因为人们亲眼看见了致病的原因——各种细菌和病毒的形状、大小。

最近半个世纪，医学科学更有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没有偏离“因为……所以……”这座永远有效“灯塔”的指引，若是偏离了，违反了，取得这些成就便是一句空话。比如：

1. 以往肺癌占癌症死亡率的 33.1%，现在已攀升到 50%，专家发现肺癌同环境因素有因果关联：

因为长期吸烟，或被动吸烟，所以患上了肺癌。

又因为长期接触三氧化二砷、石棉、放射性物质以及空气严重污染，所以患上了肺癌。

2. 医学科学家发现：因为大量摄食了高脂肪、低纤维素的家禽肉类食品，所以患上了结肠癌。

又因为有家族性遗传病史，所以患上了结肠癌。

3. 关于胰腺癌的致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不清楚不等于没有原因，因为目前这方面的科学还不够发达，所以查不出发病的准确原因。

不过科学家还是找出了隐隐约约的因果关系，比如：喜食高脂肪食品。吸烟者比不吸烟者的患病比例要高出一倍。

大多数病例表明，患者年龄都在 65~79 岁之间。

4. 脑癌

致病原因至今不明。不过下面三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一些家族遗传性疾病诱发了脑癌；做了脑X射线高能照射诊断和治疗，以及经常接触某些化学药品；脑外伤也有可能诱发脑癌。

5. 当代医学科学表明，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多的免疫天赋，或者说，妇女的免疫系统优于男子。

在自然界，这种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雌性比雄性具有更强的免疫力。

比如用一滴蜜蜂的毒液注射到一只雄蟑螂体内，它会死亡；若是雌蟑螂，则会康复——如何解释这类现象呢？只有用上因果关联的句子或因果思维方式：

因为女人要怀孕，要孕育后代，延续种族，所以要有较强大的免疫系统。

若是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便只好推到造物主（上帝）的尊前：

这是造物主的设计和安排，去问万能的上帝吧！把球踢到上帝那里是最省事的。

6. 人为什么会衰老？

比如头发脱落，变白；皮肤失去弹性；皱纹增加；视力衰退；骨头变脆，易得骨质疏松症；脑神经细胞减少；动脉硬化……

这是为什么？上述是衰老现象，是结果，那么原因呢？

有两种学说：程序说，非程序说。

前者认为：“因为在生物体原本就预先规定好了、设置好了老化和死亡，所以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会老，会死。”

7. 怎样才能延长人的寿命？

2005年3月底，一则外电报道，英国科学家正在老鼠身上做实验，将甲状腺素融于水中，供老鼠饮用，以便提高老鼠的新陈代谢率，然后观察实验鼠的寿命是否有所延长？

之后再进行人体实验，估计人的寿命可增加 30 岁。

在这里，科学家应用了因果律：

因为增加了新陈代谢率，有害自由基从体内清除掉了，所以延长了人的

寿命。

世界是什么？

世界就是大大小小的“因为……所以……”加在一起的总和。

你若听不懂上帝规定、制定和设置的这个基本句型，且不用说你去学医，对医学科学作出贡献，就是在地球上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以至于寸步难行。

你的语言的界限即你的世界的界限。

除掉了“因为……所以……”这个句型，你的世界还剩多少？还剩多大？还有多大的地盘？

一个不会说“因为……所以……”句型的人，他还是人吗？

“因为”和“所以”是成对出现的；

“原因”和“结果”是成对出现的。

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反应。我会说“因为……所以……”，故我并不很穷，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发现：我的最大财富是掌握了汉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句型便是：

“因为……所以……”

最后我想说，我们人类一直在为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起早贪黑忙乎着，困惑着，争论着。

比如关于艾滋病的起源。

目前国际科学界认可的观点是：

艾滋病病毒是从猴传给人的。

不过最近有人说：“对艾滋病病毒来自猴子，我表示怀疑。因为自远古以来我们人就和猴子生活在一起。”

作这样的逻辑推理也是站得住脚的。

而一切逻辑推理的灵魂不是别的，而是因果关联的思路。

再就是高压输电线磁场是不是患白血病的原因？

专家的意见分两派：

一派认为有危险，在10万伏以上高压线的300米以内居住的居民，患白血病的比率高于其他地区约三倍多。

另一派认为无害——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启动对高压线低频电磁场的10年国际研究得出的结论。

核辐射是否绝对有害也是有争论的。

广岛、长崎遭原子弹攻击之后，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寿命远远比其他地

方的居民还要长些，其子孙并没有出现任何基因变异。再有，美国建造核动力船的船坞工人患癌症的死亡率却低于美国该病死亡率的平均水平。

到处是不明原因的结果。

人只能见到结果，却找不出原因。

万事万物，我们知道其原因的只是极小部分，绝大部分事物的原因是个未知数，有些未知数恐怕是永远不能真相大白的。

我们的命中注定就是带着“为什么”这个元（原）疑问句踏上归程。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出于什么原因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清楚为什么又要匆匆离去。

去哪里？

去年有记者来采访我：

“赵先生，你最惊叹什么？”

“惊叹人类所创造的语言和一些绝妙的符号，其中最伟大的便是问号。”

正是这个问号使我们人成其为人，也营造了人的幸福和痛苦，也许更多的是困惑、惆怅和茫然……

入世和出世

估计在人的基因里头便有这一对矛盾的力：

入世是向心力，出世是离心力。

入世和出世是一个十字架，支配人的一生。只是在多数人身上，入世的向心力很强大，出世的离心力很弱。但在有些人身上，出世的力很强大，入世的力很弱小。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里一直有这个十字架，而且很凸显。

不了解这个十字架，便无法把握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如果说，出世是经线，那么入世便是纬线。一经一纬，编织了中国的文艺史和哲学思想史。

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是绝对不能合流的。

儒家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代范仲淹的名言是入世的精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过，读他的诗词，我们又会隐隐约约感受到他的出世思绪。尤其是他在抒写乡思旅愁的时候，经常会流露出淡淡的、黯然的销魂语。

其实他体验到了天地时空对人是座大牢狱的围墙，他企图冲决出去，但又不可能。他写诗词的根本心理动机就是冲决 时空限制，即出世。

当然，他笔下的时空不是用数学、物理的定量语言，而是用文学语言表述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苏幕遮》）

在苏轼的人格精神构成里，积极入世和追求超脱世俗是非常典型的。

当然，儒家圣人之道，经世之志，是苏轼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但对佛教的热衷又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和禅的关系可以单独构成一个课题，比如他在杭州便结交了许多僧人。

他的入世表现在以周、孔之道治天下；

他的出世则表现在以佛、老之道治性养心。

两者对称、交叉，成了一个十字架构造。

他追求身心洞清静，洗心参佛祖，企图达到出世的境界：“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今古”；“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出世，即隐。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这是政治、社会学层面的“隐”。

更深一层的“隐”是哲学层面的出世。

这才是根深蒂固的出世。苏轼的出世同时包括了这两个层面：政治、社会学层面；哲学层面。

元代著名山水画家吴镇是另一个例子，在他身上，既有入世也有出世的力。当然，出世的离心力占了绝对优势，他读儒家经典，又精通道、佛学说。

中国古代的高僧、道人和居士都是与世采取超然于物外、与深山野水为友的人。

吴镇正是这样的卧青山、望白云的出世者。

他的多卷《渔父图》便是他的“一叶随风万里身”的隐逸之志的反应。许多年，我一直推崇他的作品，包括《水村图》，因为在我的内心还有个“出世情结”。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根本动机不是入世，而是出世。

一些著名的“数学猜想”是为了应用，为了入世吗？不，那一个个美丽的数学梦。

日常现实世界太单调、无聊、枯燥，所以有些杰出人物便跑到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去追寻梦，追寻梦样的色彩斑斓，多彩多姿和变幻……这才是出世的含义。

有年夏夜，我在街灯下看到一位白发老翁一个人在下棋，他同时扮演斗智的双方。

人是饱暖之后迫切需要游戏的动物。在本质上，游戏即是出世，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正是游戏。当然下象棋是一种大众的游戏。

站在老翁身边，我足足观摩了一刻钟，感触良多。

我觉得有种悲壮（不是悲哀）氛围弥漫在棋局周遭，令我肃然起敬！因为他是一个人玩儿，独自游戏，所以悲壮。

如果是两个人在下棋，我不会驻脚停留，因为没有悲壮氛围把我深深吸引住。

至于我，我既生活在此世此岸，又漫游在彼世彼岸。

这是双重人格吗？

这是个十字架。

早年，我读白居易，有这样一段，给了我难忘印象：“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自我年过六十，才倍觉这段自白的无比深刻。因为里面有个很深刻的人生十字架，身心的矛盾。

慢节奏和快节奏

不久前，意外接到江苏《泰州日报》的长途，说泰州马上要通火车，是历史上的头一回，是件大事，要我为他们写篇有关火车的文章。

我想了又想，答应写，题目叫：“火车：力和速度的象征”。

我的构思是把火车放到人类文明之旅的大框架中来观照，其中“节奏”是个关键词。它不是个交通运输术语，而是个哲学观念。我想着重分析“节奏”这个文明哲学观念。

在七八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的历史上，火车的出现是件大事。

在东西方文明之旅中，有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发生。正是这些事件塑造了我们的生存格局和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前途和命运，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当人类自觉、有意识地往翻过的土地上播下第一粒种子的时候，农业文明便宣告开始了！

当人类驯服了第一头野牛，将牛鞅套在牛的脖子上，叫它拉车的时候，交通运输文明便宣告开始了！

当1830年第一辆火车以平均22公里的时速从英国的利物浦驶往曼彻斯特的時候，近代交通运输文明即宣告开始！

我宁愿把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的出现看成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而不把英国棉纺织工业在1830年实现了机械化视为这场革命的起点。因为火车更有资格体现工业文明的灵魂和精神：强大的马力和高速运转。

火车这种新生事物之所以出现在英国，有如下四个先决前提：

第一，有了相当水平的钢铁工业，因为火车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是钢铁。

第二，先有铁轨，后有蒸汽机车（即火车头）。起初只有铁轨，一个妇女或一个男孩即能拉走一辆载重约八九百公斤的货车，因为摩擦力很小。在铁轨上，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公路上所干的活——这还不够，还欠缺另一位主角。

关键是采矿工程师斯蒂文森把一台蒸汽机车安装在货车上，把数节煤车从矿井拉到河边。



德国哈尔茨山区还保留了一段由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车头吐出黑烟和白烟，嘟嘟地驶过，不快不慢，时速仅90公里，把人类带回到七八十年前的时代。

在人的内心深处恒有个“忆旧情绪”：

“旧游都似梦，到处即为家。”（宋诗）

忆旧的节奏永远是慢板。坐在咖啡屋，右桌上有蜡烛点燃，烛光半明半暗，火焰缓缓悠悠在晃动，营造了思往事，泪暗滴的心理氛围。其实更为普遍的人生世界结构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样，蒸汽机车（火车头）跟铁轨便构成了一个十字架，这是火车的两大构件，两个主角，缺一不可！

自火车诞生以来125年过去了，但火车的基本构成（车头和铁轨）没有变。

第三，一开始，火车是为了运煤，后来才有客运。

煤在拉开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中是位主角。其实煤的问题是能源问题。今天，在世界文明的运转中，能源依然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文明是耗能文明。石油涨价，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第四，农业文明时代人的物欲少，耗能也少；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物欲多，耗能也大。凡是有人欲的地方，必有物流；凡有物流的地方，必要耗能。

人口的增加和物欲横流刺激了火车的诞生和铁路总长的延伸——这才是火车崛起的第一推动力。与其说是斯蒂文森发明了火车头，还不如说是当年

英国社会（人欲）的迫切需要促成了火车的崛起。

即使没有斯蒂文森，也会有个“卡洛文森”站出来设计一台蒸汽机车。

火车的实质是有力打破时空对人的限制，以便人的各种欲望（物质的精神的）能够尽量多、尽量好地及时得到满足。

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才是推动人类文明之旅不断进步的火车头，它才是火车头的火车头，是制造火车头的源头。

2004年9月我住在德国离科隆约30公里的乡下，我买了一张大剧院的票子。戏票包括了免费乘坐当天去科隆的火车票（往返），这是火车方便满足精神欲望的一个例子。将来远近三四十公里的泰州农民可以搭乘火车到泰州市大剧场来看戏（戏票里已经包括了火车票）。

等着吧，总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火车的好处，所以人们想方设法追求力和速度。

这便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至今175年西方人一直在忙乎的一件事。今天，这一追求的思潮或文明哲学也传播、席卷了中华大地。

大约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英国铁路总长已达七八千公里，这意味着拥有了很大的力和高速度。1840年我们的牛车和马车面对的正是这力和速度，牛车和马车被火车打败是必然的。

这是农业文明同工业文明在力和速度方面的格斗和较量。

前者是全线溃退，败下阵来。

比如油灯让位于电灯，帆船让位于轮船，弓箭让位于机枪……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机枪的出现也体现了力和速度的霸道和战无不胜，每分钟能发射上百发子弹，这也是速度。

当然，这种高速度是邪恶的，不人道的，因为它残酷。孩子从娘胎里出来，长大到十八、二十岁，多么不容易，但在机枪阵地面前顷刻之间倒下去的是成百上千的青年，尸体成片！

一战时期，欧洲大陆铁路网已是密布、纵横交错，这样军队调动也十分便捷。战争走向工业化是人类的堕落，不是进步。

哲学家在质疑力和速度。

这两者合在一起，不讲究人间道德方向，是可怕的。

不经过文明哲学审视和分析的“力与速度”是危险的。

英国人培根说：“知识即力量。”

今天来看，这句格言有失偏颇，要当心。

力是有方向的，我指的是善与恶的方向。只有同道德（正义和善）结



介于波恩和科隆之间的德国田野静悄悄，我常在这一带散步。时速200公里的火车驶过，划破了这里的宁静，不久又重归“一笛晚风生碧树，始知林里有人家”。

合在一起的力量才能为千百万老百姓谋福利，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邪恶的力，加害人类的恶势力。

今天的世界军备竞赛是什么？赛什么？

说到底还是赛力和速度，比杀伤、破坏的力和速度：甲方战斗机的时速是800公里，乙方战斗机的时速便要想方设法提高到900公里。甲方设计的氢弹小，杀伤力大，乙方设计的氢弹则更小，杀伤力更大，而且导弹的射程更远。

当今世界有病，重病在身。我们总以为精神病院围墙外的人是健康的、正常的；只有墙内的患者才是有病的，精神分裂的，紊乱的。其实不然，墙外比墙内更疯狂。

世界许多国家在提高军费，把许多钱用在邪恶的力和速度上，其中有的是为了自卫，有的则是用来进攻。

对力和速度的盲目追求和崇拜已成了当代世界的一种临床表现，而且非常普遍，正在领导世界新潮流。

在日本，我经常见到一些年轻人骑着雅玛哈摩托轰的一声呼啸而过，时速至少有200公里，而且噪音特大，如同波音客机起飞一样。他们故意把消

声器卸掉了，巨大的噪音更凸显出了力和速度的破纪录。骑车人以此为满足和自豪，这也是剩余能量的发泄。

这些年轻人活着就是时时处处追求新的最大刺激和快感。力和速度本身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他们从不去问一问这样的力和速度是不是健康？符合理性？

2004 年秋，我重访德国，住的地方是世界名车手舒马赫的故乡，离他的家仅 10 公里，我的房东以这点为自豪。舒马赫成了全世界千百万人崇拜的偶像，他是代表力和速度的一个符号。人们对他的狂热，说明在人性中有一种追求“力和速度的情结”，它体现了快节奏。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玩儿得心跳。

不过在人的内心深处同时还有一个追求安宁、心安和舒缓的“慢节奏情结”。这一快一慢，慢节奏和快节奏，集于一身，又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很形象地刻画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或灵魂状态。

人是从慢节奏走来的，进化来的。

人类进化史的节奏是缓慢的，一万年为一个单位。

别的不说，我们祖先在农业文明时期便缓缓悠悠地度过了七八千年。我们习惯牛车、马车、风车和磨坊；习惯小毛驴的温顺和平稳节奏；习惯小桥流水人家和暮鸦噪晚夕阳斜……

我近距离观察过舒马赫故乡的一切，其实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解剖过德国的城乡以及德国人的精神构造：快和慢交叉的十字架。

他们既爱快，又喜欢慢。在快节奏和慢节奏之间，他们追寻平衡，求得和谐。

在舒马赫的故乡，我时常目送一列在科隆和巴黎之间来回往返的火车，时速一般在 200 多公里，过后，德国的田野又恢复了原先的宁静，尤其是当远处教堂钟声一下下悠悠缓缓响起的时候……

这种情景给了我难忘的印象。现代化的火车，体现了力和速度，是追求快节奏的象征；暮色苍茫时分，教堂平和的钟声则是人性眷恋、追求农业文明时期慢节奏的符号。

这一快一慢的交织是一首有关人类文明之旅节奏的哲理诗。

德国人在骨子里眷恋农业文明的悠悠节奏，除了教堂钟声外，还有马车和水井。我经常看到一户农庄把百年前的马车轮子钉在院落的墙上，作为回忆农业文明的一个生动符号，一种象征。

再就是在自家门前做了一个水井模型，作为一种装饰，它还是一种减速



德国爱森纳赫巴赫故居庭院内的一口古井。博物馆把它保存得很好是出自以下原因：

1. 巴赫是喝这口井水长大的，这点很重要。
2. 巴赫的音乐是平和的、悠缓的，安宁的，因为它是井水、牛车和马车时代的产物，不是自来水和核电站的旋律。

强大的马力和高速度运转产生不了巴赫、莫扎特和舒伯特的音乐。

或者说，巴赫音乐是木材能源时代的产物，所以性情温柔平和，而摇滚是核能时代的音响，故性猛，暴烈。

音乐同能源类型的确有一层内在关系。

的提示：生活节奏不要过快，要慢慢品味人生世界。

科技进步得很快，日新月异；但人性进化得很慢，人不愿让高速度发展的科技牵着自己的鼻子拼命往前赶。力和速度本身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不是！

样样都在提速，这一定好吗？

夜深人静，风声雨声停了。我醒来，听到从远处传来从巴黎开到科隆的火车声音……

我羡慕西欧的文明水平：他们既把工业文明的力和速度带来的好处拿到了手，同时又保留了农业文明的优点——我指的是田野的安宁、平和。在小河、小溪，我常看见野鸭戏水或群鸭拍翅掠过水面的田园景色，便是明证。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广大城乡既把工业文明的快节奏好处拿到手，又不失农业文明慢节奏传统的宁静和诗意：

“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孟浩然）

快和慢既对立又统一，需要我们提高国民素质（从干部到群众），在快慢之间求得和谐统一，这统一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祝贺泰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通火车！



第3章
Chapter three

两重人格：我和俺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轻或重、或隐或现，都有两重人格。

它是一个十字架，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2005年4月3日下午于衡山路凯文咖啡屋

一、精神病院中的“我”和“俺”

在精神病现象中，两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和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三个惊叹号!!! 惊叹号的性质是“世界哲学”的，世界哲学性质的惊叹号非常之养人，即便是半个惊叹号也抵得上整本四平八稳教科书的效果。

有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女，20岁。她在同人谈话时一会儿自称是“我”，过一会儿又称自己为“俺”。问其理由，病人回答：^①

“我在说话的时候是真正的我在说话，而俺则是另外一个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是同我相对立的。”

这便是典型的精神病学中的两重（双重）人格。

“我”和“俺”是对立的，但又集于一身，统一于一身。

病人在同一时间内表现为两种人格：一方面以甲的身份、思想、言语和行为出现；另一方面又以乙出现。

还有的病人会出现两种以上的人格，称为多重人格。

这种症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但也见于一些杰出人物，比如苏俄大作家高尔基，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是个多面人，让人捉摸不透，即便是托尔斯泰也看不透高尔基，说他总是在窥视他人；他不知是从何方来到这片不属于他的土地，观察一切，审视一切，然后将他看到的一切报告给他的上帝。

总的来说，精神病现象是人脑现象，是人脑病理或病态现象，就是说，有其脑根源。高尔基现象也有其脑根源。

^① 北京医学院主编《精神病学》，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第147页。再参看笠原嘉《精神病》，1998年，岩波新书，日文版。

病人被钉在两重人格——我和俺——构成的十字架上。

或者说，病人像个钟摆，来回在“我”和“俺”这两个端点之间摆动：一会儿是“我”，另一会儿又是“俺”。

还有一位姓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男，27岁，说：

“我的身体分成为几部分了，右半身是我王某自己，左半身是一条小白龙，而后头部分是古代人关羽。”

这就是典型的“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这使我想起神话和艺术创作中的“人和兽”的组合，如“人面狮身”、“美人鱼”。所以说，艺术创作同精神病学有关联。

美国精神病学会主编的《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手册》第四版(DSM-IV)有10种附录，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术界也非常关注这个课题，研究水平在世界前列，远远走在我国水平的前头。

2000年我在日本期间便买了好几本这方面的论著，给了我深刻印象。

我关注这个课题，远远超出了“精神病学”专业范围，而是从“世界哲学”的着眼点去考察、引申和推广，或者说，我是力图做到“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闲”，力争进入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的“世界哲学”境界。

说白了，我是借“精神病学”专业的光，去探明、照亮“世界哲学”的大道。

朝日新闻社编的《何谓多重人格？》(1997年)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书(共278页)，该书收集了日本第一线上的九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角度不同，回答自然各个殊异。

两重或多重人格(性格)不仅是精神病理现象，它在日常生活、文学作品、文艺理论、伟人传记、犯罪学、历史演变和政治历史……许多领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精神病院围墙内的现象，也是围墙外的事——我指的是当代世界。我想借精神病学的光，去把握、理解当今世界许多看不懂的人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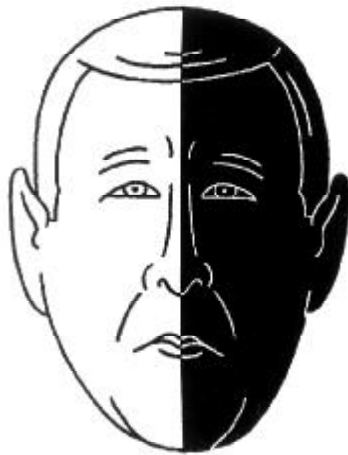
二、精神病院围墙外的两重人格

不错，每座精神病院都有一圈围墙，不仅坚实，而且高大，把墙内外分得很清，好像是不可逾越似的。

其实不然，墙内墙外的界线常常是模糊的，不分明的。有些人虽然没有

两面脸的人，即两重人格者，白与黑是对立的，但又集于一身，同为一个人，白（我）不是他，黑（俺）也不是他，只有黑白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他。

在观察生活中，这样的人是常见的，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典型的刻画。只有这样，人物的性格才算丰满，有血有肉，感染观众。



住进精神病院，但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院墙内，另一只则在墙外。

就是说，在健康人身上，也常有精神病的元素或成分。两重人格在健康人身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有时候墙外人比墙内人更疯，墙外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疯狂世界。恐怖主义不是疯狂是什么？！拥有核武器不是疯狂是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心理）构造都是呈十字架状，都是由两重人格所构成。当然有人不很鲜明，对立、冲突不十分尖锐；有些人则很尖锐，“我”和“俺”简直是判若两人，互不认识！高尔基就不认得自己。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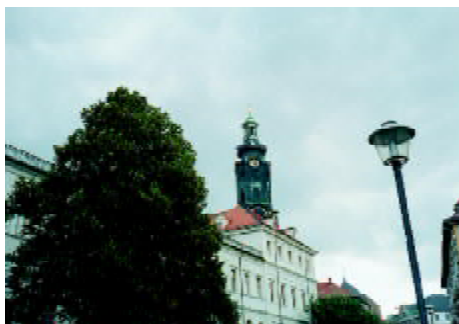
比如有的省长、将军和元帅很威风，说一不二，富有坚强的意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回到家里则是个怕老婆的百依百顺的小男人，“妻管严”——两重人格的反差之大，着实叫人吃惊。

我认识的汪子剑先生也是个典型双重人格者。

他在日本打工，求学10年；非常爱读书，阅读范围很广，在人文科学领域的悟性是相当高的。他一有钱就逛书店，买下的日文书计有两三千册，折合人民币二三十万元。

坐在北京西直门的书斋同他谈学问，他是容光焕发，知书达理，是位饱学之士。

不过他只能读书，自己不会创造，可谓两手空空，一事无成。他既没有发财，也没有成为学者，教授；2000年他终于从东京回到了北京。有一天他当着我的面，为自己的平庸竟嚎啕大哭！



这是2004年初秋我在魏玛小城拍摄到的街景：平和、宁静、安宁，这是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的“我”，和六七十年前纳粹德国的“俺”是截然不同的！

“我”和“俺”反差太大，简直互不认识！如果歌德和席勒知道在魏玛附近有座残暴的杀人工场，他们肯定会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在魏玛附近。

当他看到发了财，当了董事长或成了专家、教授的中学老同学，他的脸上便布满了病态的嫉妒，突然间好像成了另一个人。

据我近距离的观察，汪子剑先生当然不是精神病患者，但他身上的两重人格表现却是很典型的！

在同我谈学问的时候，他的右脸闪烁着智慧，离我很近很近；当他心起嫉妒之心，怨天尤人的时候，他的左脸布满了恶毒、仇恨的乌云。

我不知道，究竟哪半张脸是他？

回答只有一个：左右脸合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汪子剑先生。

有一回，我指着他的丰富、珍贵的藏书说：

“你现在是单身一个，估计将来也不会成家。在你临终的日子，打算怎样处理你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吗？让子孙后代受益。”

“全部烧掉！”

汪先生不假思索地、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由此可见他怨天尤人之深！他认为是整个社会欠了他，负了他，他从不从自身去检讨一事无成的原因。

阴暗心理，狭窄胸襟，嫉贤妒能，是他一生失败的重要原因。不久，我便同他分了手，结束了我们三年的交往。从他身上，我进一步认识了人的两重人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00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德国。早上，我翻开刚送来的德文《世界报》，有篇关于梅毒的文章，说近来欧洲梅毒有卷土重来的态势。在历史上，文学艺术家患这种性病的人不在少数，比如：

19 世纪德国大诗人海涅、大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伟大的作曲家舒伯特以及杰出作家霍夫曼等。再就是德国大画家丢勒（1471~1528 年）以及法国大画家高更和作家莫泊桑——当然名单上远不止这些。

这是两重人格吗？难说。

我想是的。

他们在写诗、作画进行创作的时候，是“我”；在嫖娼的时候，则是“俺”的行为——是同一个脸的两张半脸。两张半脸是对立的，对立面的尖锐冲突曾使他们痛苦不堪。

伟大的歌德曾呐喊过：

“两个灵魂，哦，同住在我的心胸！”

两个灵魂即两重人格。它们之间的格斗常常撕裂着诗人的生命，使他不得安宁，所以他时时通过诗句喊出自己内心的渴望：

“甜美的平和，快来到我的心胸！”

有一回贝多芬写信给贝蒂娜，述说他和歌德在一起遇到的一件事：

“昨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皇室一家子，我们老远就看到他们走来，歌德从我身旁走开，站在一边恭候，我本想叫他退回到原处的，但没有说出口；我戴上了帽子，扣好了上衣，叉着双臂，大摇大摆地穿过那堆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人群，爵爷和侍从们肃立在路旁，鲁道夫公爵脱下帽子，王后首先向我致意——这些显贵们是认得我的。看到人群从歌德身边走过，我都觉得好笑，他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帽子，深深地鞠躬。然后我就斥责他。我可没有错，我把他的种种过失都历数了出来。”

贝多芬之所以在权贵们面前不自卑自谦，就因为他认为人受到尊敬，不应当是由于他的出身和地位，“国王和爵爷们可以造出教授来，但是却造不出伟人；伟人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总是鹤立鸡群，超出平庸之辈，国王和诸侯们只能充当这种流辈。像我和歌德走在一起，王公贵族们就该对我们表示敬意才对。”

在贝多芬看来，歌德太热衷于宫廷气氛了，这种庸俗的人格同一位伟大诗人，一位民族精神的导师是不相称的。这不相称即两重人格的尖锐冲突。

在现代科学史上，爱因斯坦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关心战争与和平，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一有机会，他就勇敢地挺身而出，作为人道主义、世界正义和公正的代言人。但是在许多地方他却是多重人格者，比如他自己就解剖过自己：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地对别人和社会直接

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了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的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这种感觉正与年俱增。”（自《我的世界观》，1930年）

是的，这反差、对照和冲突是够古怪的了！

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爱因斯坦的“我”，哪一个是“俺”呢？如果让他自己说，估计也说不太清。

在两性、婚姻和家庭方面，他的多重人格也有突出表现，他无疑是个爱拈花惹草的男人。许多年前，我从国外报刊杂志便知道他的一生充满了风流艳遇，是个典型的情种。

比如从德国来美国后，爱因斯坦便和纽约一位舞女偷情生过一个私生女，但他对孩子却不管不问。在同女人的关系中，他只把对方看成是发泄情欲和性欲的对象。在他的生命中，不能缺少这种对象。权威传记作者推测，在他成名之前可能感染过梅毒，这种传染病折磨了他一生。

对穷人、弱势群体，爱因斯坦抱有同情心；但对自己的子女、亲骨肉，他的冷漠却是不近情理！

那么，究竟哪个是“我”，哪个是“俺”？

也许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爱因斯坦。

哦，人啊人！谁能把人说清楚，道明白？

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动物？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一位非常有独创性的哲学家。

但在他的人格中却有一个很大的阴暗面，他是个同性恋者，他无法抵抗同性恋的诱惑。不过同性恋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吗？

在伦敦和维也纳，他定期同男妓幽会，他发现，他更喜欢那些男性荷尔蒙十足的壮汉。他为恶魔所迷惑，几乎难以自拔，他本人也十分厌恶自己的这种变态性欲，经常陷入极大的冲突、矛盾和痛苦中，好几次，他都走到了自杀的边缘。

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和大哲学家有同性恋倾向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他们的伟大创造性与性欲取向是对立矛盾的吗？

是两重人格的表现吗？

很难作出判断。

在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中，两重人格精神构造（我与俺）的冲突是随处可见，比如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在士大夫的灵魂深处是互相纠结



这是一首很著名的德国古老民歌《冬天已过去》。

曲子很美，充满了对林中小鸟、夜莺和花草的爱。

德国友人当场送给我一本民歌全集。几乎每首歌都有一幅精美插图。我特别喜欢附在《冬天已过去》这首民歌乐谱上的黑白木刻插图，它勾起了我在辽宁“牧童短笛”六年（1969~1975年）的记忆。

对山坡草地和五月欢快跳跃的小羊羔，我非常熟悉。对德国的山谷、山坡、羊群和森林，我也不陌生。六七十年前，在德国这块美丽、祥和的土地上，竟然会兴起罪恶的纳粹运动，这不是很奇怪吗？

Im grünen Wald, da wo die Drossel singt

(M und F: Volksges.)



1. Im grü-uen Wald, da wo die Dros-sel singt, Dros-sel
singt, das mun-tre Reh-leit durch die Bü-sche springt, Bü-sche springt,
wo Tann' und Föh-n' stehen am Wal-des-saum, er-lebt' ich
mei-ner Ju-gend-schön-sten Traum.

2. Das Rehlein trank wohl aus dem klaren Bach, klaren Bach,
Derweil im Wald der muntere Kuckuck lacht, Kuckuck lacht,
Der Jäger zieht schon hinter einem Baum,
Das war des Rehleins letzter Lebensraum.
3. Getroffen war's, und sterbend lag es da, lag es da,
Das man vorher noch munter hüpfen sah, hüpfen sah,
Da trat der Jäger aus des Waldes Saum
Und sprach: Das Leben ist ja nur ein Traum.
4. Schier achtzehn Jahre sind verflossen schon, flossen schon,
Die er verbracht' als junger Waldmannssohn, Waldmannssohn,
Er nahm die Büchse, schlug sie an ein' Baum
Und sprach: Das Leben ist ja nur ein Traum.

另一首歌唱森林、可爱的小鹿和林中布谷鸟的民歌。

当然，歌词中还唱到了猎人。也许在人类进化史上，几万年前原始人的狩猎基因系统到了后来便渐渐成了攻击本能遗传性获得，加强了男性荷尔蒙攻击力的残暴，成了战争的生物学基础部分。

我说过，日耳曼民族的性格是森林性格，里面有猎人嗜血、射杀成性的基因，世界大战、侵略军杀人是狩猎的继续。



我在魏玛伊尔梅瑙歌德。

写作屋前低着头，双手紧握于胸前，表示我对德国科学、艺术和哲学人道主义伟大传统的深深敬意！我懂得把德意志民族的“我”同“俺”分开来。彻底、完全铲除“俺”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把它压制到最小最小。今天的德国便是这个样子：“我”占绝对优势，“俺”很弱小，我指的是新纳粹主义。



魏玛歌德故居所在的胡同，有种特别祥和、安宁的氛围弥漫。这也是德国小城市的普遍特质。

谁能想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曾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一反差使陪同我的德国朋友非常尴尬。如果集中营离魏玛有200公里，那或许要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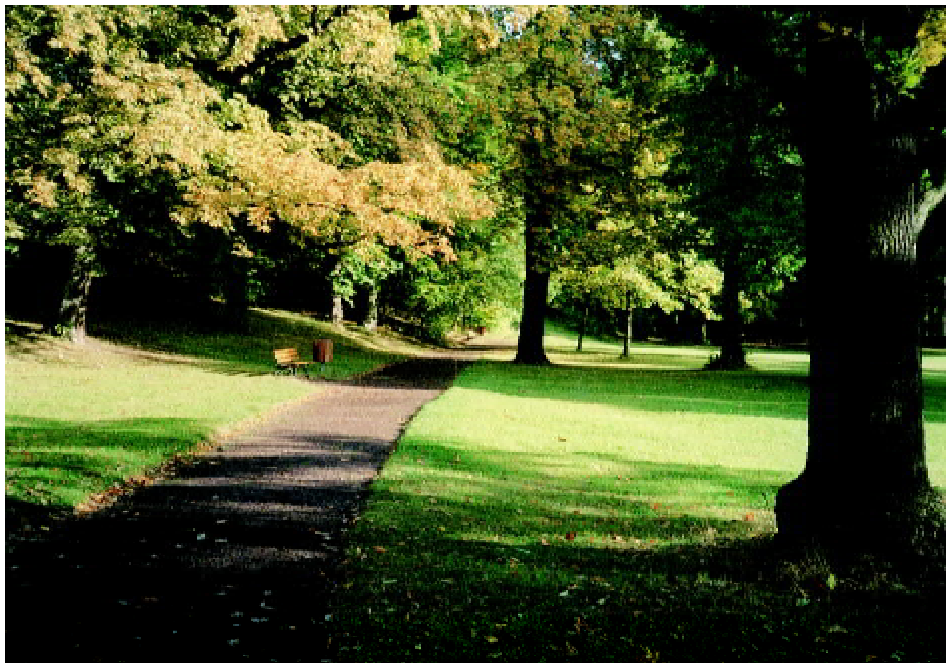
这是德国一座中世纪的小城，非常安宁、平和。

谁能想像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国土长出过纳粹运动一群“毒蘑菇”？谁能相信“我”和“俺”的对立到了如此不相容的程度？



1944年7月20日，一群有理智、正义和良心的高级军官企图铲除希特勒，推翻纳粹罪恶统治。但不幸失败，被希魔下令处决，其中有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道芬堡等人。他们的名字已经写进了德国的历史。

2004年7月20日是这次正义行动失败的60周年。柏林人在这些民族英雄就义处敬献了花圈。在我眼里，他们是德意志民族“我”的代表人物，至少他们是一些对德国负责的觉醒者，尽管觉醒晚了些。



魏玛歌德写作屋所在的大花园，阳光灿烂，惠风和畅，给了我难忘印象。
当年的歌德肯定在这里漫步过，而且是常常灵感附身：“甘美的平和，来吧，来到我的心胸！”
这才是我敬重、热爱的日耳曼民族，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



1944年至1945年年初，德国绝大部分大中城市均遭盟军飞机轰炸。
古老教堂也不能幸免。这是被毁后的一座教堂残骸，至今（2004年）也没有重建。归根到底这是德意志民族两重性格中的“俺”造成的恶果。



在德国各地，我经常见到正在重建的教堂，这是其中一座。由此可见战争对城市破坏的严重程度。怪谁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德国人尝到了战争的苦果！



德国乡村人造的鸟巢，为的是让在大雪纷飞的日子，可怜的小鸟躲进来避风寒，并饱餐一顿。德国人告诉我，这种风俗从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

这是德意志民族人道主义传统的扩大，它同康德、歌德、贝多芬和普朗克的精神是一致的。自由进出的敞开鸟巢是个符号，纳粹党党徽也是个符号。两个符号是水火不相容的。今天，鸟巢占了绝对上风，这是德国，也是全欧洲的幸福。德、法两大民族的和解是件大事。中、日两大民族为什么不能和解？责任在日本右翼势力。



这是我在德国东部一座中等城市拍摄到的一景：

正在重建一座被炸毁的教堂。两德统一后，政府花了一大笔钱用来重建东部地区的教堂。看来，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是他，把德国推到了苦难和毁灭性的深渊，侵略战争是害人也害己。

缠绕的，许多人都被牢牢地钉在“两重人格”的十字架上。

以孔孟之道治天下，而以佛老之道治性养心，这两者集于一身，既矛盾又统一，给了我深刻印象。

这个十字架也可以表述为：儒者以有为者治世，正其生；佛者以无为者治心，正其心。儒治外，佛治内——这个十字架像条红线贯穿了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如王维、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同禅的关系便是两重人格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或变奏——恰恰是这种两重人格精神构造加深了他们对人生世界的把握，使他们的创作更上了一个新台阶，才有了惊人之句，刮骨之言。

看来，两重人格精神冲突或构造又是一件好事。

白居易的两重人格给了我深刻印象，比如劳与思、静与喧、身与心的矛盾对立和统一：

“在劳则念息，处静已思喧。如是用身心，无乃自伤残。”

白居易的身与心的矛盾还是两重人格冲突的表现，他说他是“身不出家心出家”：

“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早服云母散》）

“身不出家心出家”这个人生哲学命题即便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典型的既入世又出世。

这个命题既对立又统一，它是健康的、平衡的、和谐的，双脚都落在精神病院围墙外，而不在墙内。其实白居易还用另外两句来表述这个命题：

“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

这便是身与心的矛盾。这是人的普遍世界 存在的方式，身成了心的监狱，或者说，肉体是精神的束缚，精神总是企图冲决肉体的牢笼。其实人的身心矛盾往往是双重人格的基础。

看来，两重人格精神构造是一种既普遍又复杂的人类心理现象。野生动物只有“我”没有“俺”，这是人同动物的重大区别之一。

说它普遍，是因为它几乎或轻或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比如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扮演了一个社会角色，戴了一副假面具。回到家里，把皮鞋脱了，换上拖鞋，同时也把假面具拿掉。“俺”退去了，露出了“我”。

有些人，在人前是一个样，在人后又是一个样——这是两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

饭店招待员毕恭毕敬，站在宴会桌旁侍候客人，她们在心里也许正在咒骂这些狗男女吃喝玩乐的疯狂。

坐着的、频频举杯的人们能看见站着的招待员的假面具吗？

再就是墨索里尼。

尽管他有着强硬的外表，并以残忍成性而闻名，但他还有懦弱的一面：他请人画过大量的肖像画，过一段时间便要从墙上撤换下来，然后再欣赏新的画像或自己的照片。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而且他还需要借助于肖像画、领袖照片来支撑起自己一个虚弱的内心世界。

当然他还会拉小提琴。在他身上，“我”和“俺”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难分难解。

三、日本民族的两重人格

我曾三次造访过日本，那里的文明程度：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以及平和、讲礼貌，给了我深刻印象。

在公交车车站，只要有三个人，便会自动排队，先下后上。

在拥挤的东京银座，分明是我碰了她一下，被我碰的她，还要向我道歉，言外之意是：

“是我妨碍了你的行动，真是对不起呀！”

如果有人有急事，要从你身边走过，超越你，也会低下头，轻轻说句抱歉之类的话。

在地铁，少女的手机响了，她的声音总是压得很低，尽量做到不去干扰他人。（上海地铁的情景则不然，通话声音是那样响，几乎整节车厢都能听到）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有个准则：

千万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

这是日本民族的“我”。

也就是这个民族，在二战期间给亚洲邻国（尤其是我们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凶残、兽性，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另一面。

这是日本民族的“俺”。

一个人会有两重个性或人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会有两重性格。当然，在有的民族性格构造里，互不相容的光暗两个面比较缓和；有的民族则很尖锐，简直叫人认不出来。

1944年战争进入后期，德、日败局已定。

美国迫切需要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对日本民族，美国不太了解。有鉴于此，1944年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去研究日本，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便写了一本著作《菊与刀》（1946年出版）。

这本专著广受好评，连日本人自己都认为作者对日本民族的精神构造有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剖析。

本尼迪克特用“菊”（爱美，尚礼）和“刀”（好斗、尚武）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菊和刀交叉成了一个十字架，深藏在日本民族的精神构造里。

二战结束，几百万日本军人放下武器，回到了家。昨天还在举起屠刀向被占领的平民砍去，今天则成了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爸爸——这样矛盾的性格集于一身的确让我们困惑不解。

为了了解“菊”这个光明、平和的面，我们务必要了解禅的修行和茶道。从日本，我带回了好几本这方面的著作，如：

- 1.《什么是禅?》，古田绍钦，NHK 出版，1996 年；
- 2.《日本的禅》，竹内道雄，春秋社，1976 年；
- 3.《禅和日本文化》，柳田圣山，讲谈社，1985 年；
- 4.《所谓禅是什么?》水上勉，新潮社，1988 年；
- 5.《禅和精神医学》，平井富雄，讲谈社，1990 年；
- 6.铃木大拙有关禅的系列论著，如《禅堂的思想》，1990 年；《禅的修行和生活·禅的世界》，1991 年；《禅百题》，1991 年；《所谓禅是什么?》，1991 年；
- 7.《禅的世界》，读卖新闻社，1983 年；
- 8.《禅的世界》，理想社，1981 年。

关于禅的起源，日本学者交待得很清楚。

禅起源于中国，包括禅宗的成立，唐代的禅和宋代的禅。后来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 18 世纪前后 500 年间，中国的禅便传到了日本。重要的是日本人把它消化、改造成了“日本的禅”，影响了日本民族的方方面面，包括茶道和建筑，当然还有诗歌、音乐和绘画。

关于禅，不管是中国唐、宋禅，还是传到日本的禅，它的本质都是主张“有求比告，无求乃乐”。

坐禅者要逐渐进入“内外空净”、“心地明净”的境界。

或者用这样四个汉字来描述禅的境界：“入道安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要求四心：修心，住心，看心和敛心。

所以说，禅智为出世之妙术。

日本人的茶道、花道、诗歌、建筑和绘画……无不浸透了禅智。（其实莫扎特音乐慢板乐章的最高境界也是“入道安心”的禅智境界）

日本人的“菊”这一面愈是禅智，他同“刀”这一杀气腾腾的阴暗面的冲突便愈尖锐——这是“我”和“俺”的矛盾。

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种种罪恶是日本民族“俺”的所作所为，它比精神病院围墙内的表现还要疯狂，还要病态，还要精神分裂。

那么，究竟哪个是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呢：

“我”，还是“俺”？

2005 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追问有它的现实意义。

最近几年，日本教科书风波使日本远离了亚洲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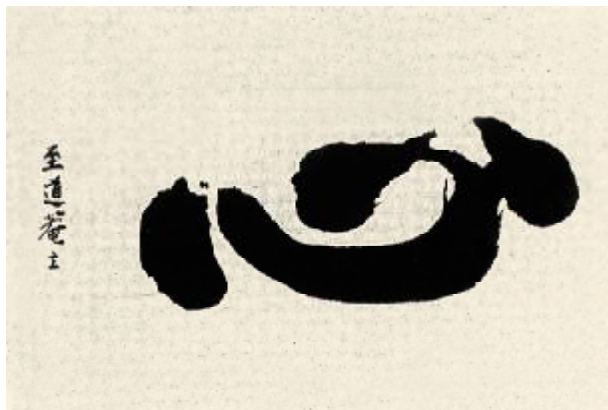
2005 年 4 月 5 日，日本歪曲历史的新版教科书的出笼又是一个例子。



日本永平寺坐禅堂的情景。

这使我想起我国唐代的寒山诗：“岩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这是日本民族“菊”的核心部分，同“刀”简直是判若两人，互不认识，互不相容！

“菊与刀”这个十字架中的“刀”曾给亚洲许多国家造下了多大的灾难！



至道无难墨迹，日本京都，金刚院。

心即佛。唐代寒山子有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秋皎洁。”日本人非常推崇寒山诗，通过诗作，进一步沟通了中国禅与日本禅的境界。

日本禅追求的心同军国主义的刀是多么矛盾、冲突！

它们是怎样在日本民族的内心精神结构中并存的呢？

归根到底，“菊与刀”的冲突和并存是日本人的脑现象。

一切“两重人格”现象（从个人、民族、国家到世界），统统都植根于人脑构造。

教科书是由日本民族主义学者撰写的，所以在许多地方（包括“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大是大非问题）都美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教科书为什么如此重要？

因为它涉及如何向孩子讲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涉及把历史真相告诉孩子。因为日本青少年从背离客观公正原则的教科书中无法正确认识历史，他们只能从“皇国史观”中吸取强盗逻辑，养成好战的习性，在内心深处炼成军国主义的“刀”，一有适当的气候和土壤便有可能让“俺”重蹈罪恶的覆辙。

马克思有句名言：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教科书是说出真相的最重要的场合。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民族是最懂得赔礼道歉的民族，但在侵略战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是一个最蛮横、死不忏悔的民族！

这就是日本民族精神构造的两重性：既文雅又蛮横，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

在千百年的历史，日本文明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对日本民族来说犹如母亲的乳汁一般，但在近百年的历史，它却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学生用刀向恩师杀来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最近日本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过像日本这样一个两重人格如此尖锐冲突和矛盾的民族、国家能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吗？

一个拒绝反省过去，死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民族能得到受害民族和国家的信任吗？

2005年4月8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进一步批评日本未能对自己的过去罪行进行忏悔：“同一个急切希望粉饰其侵略和残暴历史的国家相处，对全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这位总统又说：“根本问题是，日本人正在寻求歪曲和粉饰他们过去的侵略史。他们只是偶尔道歉，而他们最近的所作所为又推翻了这些道歉。”

“日本的态度是同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背道而驰的。”

我双手赞成这些批评和谴责。看来，日本民族的两重人格是非常病态的。在日本，我经常看到右翼势力的高音喇叭宣传车气势汹汹地走过，它和日本的禅文化是何其对立，不相容！那么，哪一个是日本民族的“我”，哪一个是“俺”呢？

四、德意志民族的两重人格

2004年6月至10月，我作为柏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评委，又一次造访了德国，再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伟大民族。

几个世纪以来，日耳曼民族在科学、艺术和哲学三大领域的伟大传统是“我”的创造性表现；

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则是“俺”的所作所为。

“我”和“俺”构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十字架，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日耳曼（德意志）民族的真实面貌吗？

这个民族命中注定要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吗？

在英、法两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构造里，不是也有个十字架吗？不是也有“我”和“俺”的对立统一吗？

火烧圆明园的罪恶正是英、法联军干的，这比纳粹不会好多少，当然还有八国联军的罪行。

如果说，莎士比亚、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达尔文、狄更斯、透纳、哈代、肖伯纳、伏尔泰、笛卡儿、雨果和巴尔扎克……是英、法两大民族“我”的代言人，那么，火烧圆明园的强盗则是“俺”的罪行。

看来，“我”和“俺”这个十字架是人类精神构造中的一种普遍世界现象。当然，只是在有些民族那里表现得更尖锐些，更血腥些。

2004年9月的一个晚上，德国友人施密特先生庆祝60岁生日，我被邀请参加他的生日晚会。我们一边喝葡萄酒，一边唱德国传统的民歌，总共大约合唱了25首之多，其中有一大半我会跟着哼唱。突然我觉得我真正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善的德国，置身于这个民族之间。

我再次听到了德意志（日耳曼）民族的心声——“我”的声音，其中包括这样几首民歌：

- 1.《月亮升起来了》，克劳蒂乌斯的诗，1778年。
- 2.《五月来了》
- 3.《奥登森林中有株树》
- 4.《冬天已过去》

在这之前，我从一张美国制作的有关德国纳粹运动的DVD中听到了三首当年纳粹的军歌和进行曲，颇有杀气腾腾的味道——我知道，那是德意志民族“俺”发出的残暴、邪恶的“狼嚎”，里面有复仇心理的涌动。

这个民族曾被希特勒引上了迷途。

在德文中，“元首”有导师、领路人的意思。

我国南朝，宋，朱昭之有言：“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

当年千百万德国人同希特勒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关系，看来导师领路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导师与亿万群众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十字架。在整个人类文明之旅中，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具有现实意义——这个课题的实质是“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也许，德意志民族的两重人格可以用魏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交叉来表示，因为它成了一种善和恶纠缠在一起的象征：

魏玛是“我”；

布痕瓦尔德是“俺”。

魏玛是德国中部一座非常典雅和美丽的小城市。1988年和2004年，我曾先后两次造访过这座歌德的城市、席勒的城市。当然德国其他许多文化伟人也在生活过、思索过和创作过——为人类文明这棵大树的艰难成长作出重要贡献，比如巴赫、叔本华和尼采，当然还有包豪斯建筑学派的一些造型艺术家们。正是从这里，包豪斯的语言思潮走向了世界。

好几个世纪，魏玛一直是德国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日耳曼精神的发源地。在使用日耳曼精神即德意志精神(Der Deutsche Geist)这个术语的时候要当心，因为当年纳粹党人也盗用过它，说纳粹运动正体现了“德意志精神”。但我认为，纳粹德国的一切所作所为代表的是“德意志精神”的“俺”，而开普勒、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席勒、高斯、黎曼和贝多芬所代表的则是“我”。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在魏玛附近，仅有几公里。

它是1937年纳粹党人为镇压不同政见者和为准备发动战争而建立的。从1937年至1945年4月，这里囚禁了大约25万人，其中五六万人被杀害。

1945年4月11日，集中营被美军解放，最先进入的美军士兵被没有来得及焚烧的到处堆积的尸体惊呆了！

集中营的罪恶被揭露出来，魏玛市民开始不信，因为从集中营走出来度周末的党卫军军官个个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爱好艺术，至少看起来也懂艺术，因为他们在魏玛剧院欣赏席勒话剧和贝多芬音乐的时候，常常被感动得落泪！

魏玛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是“我”；

近在咫尺的布痕瓦尔德却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是这个

伟大民族的耻辱，是“俺”。

光荣和耻辱就这样非常矛盾、非常冲突、水火不相容地交织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

1933~1945年的德意志民族是不是患了集体精神分裂症呢？或者原先就有，只是这12年才明显发病，有了临床表现。

魏玛是真正的“我”的所为；而布痕瓦尔德则是同“我”完全对立的“俺”的所为，是另外一个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也许我们只有借用精神病学的思路才能理解这段历史中的德国人。

在这里，我想提出这个课题：

德国纳粹运动和感应精神病。

2005年5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内外发表了成百成千篇文章，但深入分析德国纳粹运动的文字并不很多，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作点尝试：

好几年前，有位西方学者说，二战后期，希特勒龟缩在东线“狼穴大本营”指挥几百万纳粹军队，再也没有机会在十几万人的群众集会上露面，发表非常有煽动性的激情演说，是希特勒失去活力、判断力的原因之一。

这种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谈。

这就像一棵树被挖了出来，同养育它的土地、气候等生态环境分开，树就会落叶、枯死。因为希魔是靠演说起家的，他曾租用过一架飞机，从德国的东边飞到西边，一天在两三座城市的广场上发表激昂慷慨的竞选演说，许诺在未来的第三帝国，工人有工做（当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的农产品可以卖到好价钱；工商业者的生意一定兴隆，财源滚滚；攻击性十足的军国主义者有望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一展昔日帝国的雄风四起……

希魔用他天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力，巧妙地利用了一战失败后德意志民族强烈要求摆脱战胜国套在德国身上的一大堆枷锁以及要求迅速站起来的高昂爱国情绪和复仇心理。所以德国人投了他一票，他当上了总理。

希魔谙熟并看透了这个民族的心理，也善于利用民众这种心理来实现他的政治妄想——类似于精神病院墙内患者的妄想，包括领土妄想，施虐狂，雅利安纯种统治世界的妄想。其核心则是最高权力欲和独裁妄想。

《我的奋斗》是从病态的思维（思路）出发，从头到尾贯穿了各种各样妄想的一部书。

精神病院墙内的夸大妄想仅仅停留在一个人的想和说上面，而希特勒则通过建立纳粹党、党卫军、强大的军队和无孔不入的盖世太保组织把他的



汉斯·绍尔(哥,24岁)



莎菲·绍尔(妹,21岁)



普罗卜斯特

反抗希特勒纳粹政权的“白玫瑰”地下组织的三位成员。(慕尼黑大学学生)

在传单上,他们写道:“只有推翻希特勒,才有和平和面包!”

“希特勒口头上讲和平,而干的是战争勾当!”

“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民引向深渊。这是数学上的千真万确!”

妄想企图变成现实。(这是墙内、墙外的重大区别)

精神病学中的“感应性妄想”有不少特征,其中三个我想在这里提出来,因为借用它们我们能够较合理地刻画、分析和理解纳粹运动中“元首”同千百万德国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邪教、恐怖主义组织总头目跟成千上万死心塌地追随者之间相互感应的心理基础。以下是三个特征:

1. 感应者即精神病患者,可能是一个有威望的人物
2. 与患者特别接近的人,在受到妄想观念的影响后,也对妄想内容确信不疑,好像双方有种互感作用,或者说,好像患者把妄想传递给了他们。在妄想传递过程中,相互感应或暗示起了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被感应者多系文化程度较低、判断力较弱的易受暗示的人——在精神病学中,这叫“Shared Delusions”(感应性妄想)。Share有分享的意思。

所以纳粹运动的实质就是千百万德国人分享希特勒的种种妄想的一场群众运动,双方是互感、互动;

3. 如果将双方分开,那么,被感应的妄想会自行消失。

可以说,纳粹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应性精神病(Induced Psychosis)的集体大发作,非常狂热。1934年李芬斯达尔(女)拍摄的纪录片《意志

的胜利》(为庆祝纳粹党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为了研究,我仔细看了十多遍)

十几万人的集会,台上台下,几乎接近疯狂。

台上是“元首”,通过各种手势,用咆哮、嘶哑的声音表达了他脑海中的妄想;台下则是十几万如痴如醉、像中了邪的被感应者,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精英。

瓦格纳音乐,上万面大小旗帜(上面有纳粹党的符号),加上一连串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无疑助长了、加强了感应性精神病的集体大发作。

这互感心理使八千万德国人回到了中世纪德国神话境界。

纳粹万人集会伴有深沉、浑厚和远播的钟声,这个音响符号的性质居然变成了纳粹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强了互感心理,后来的纳粹建筑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德国犹太伟大物理学家玻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哥丁根大学物理学的泰斗。1928~1929年的冬天,他在康斯坦茨湖畔疗养。后来,他在回忆中说:“茨尔疗养院里的病人大多数是中年人,有商人、律师、还有官吏……这些人全是亲纳粹的。我就不理解,这些普通的德国公民是怎样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排犹主义拉过去的。他们相信希特勒散布的一切谎言……”

这些“被拉过去的”,正是“被感应的精神病患者”,当然,没有“被拉过去的”清醒者、健全者也有。1943年慕尼黑的“白玫瑰”组织便是。女大学生莎菲和哥哥汉斯暗中反抗希特勒,结果被处死。今天已把这段真人真事拍成电影《希望与反抗》,荣获2005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希特勒的人格是严重分裂的。

一方面,他有创造本能,比如对古典音乐(尤其是瓦格纳歌剧)、绘画和建筑的热爱——这是希特勒的“俺”或“我”。(我相信他懂艺术)

另一方面,他又有破坏本能,比如他观看德军轰炸华沙的新闻纪录片,看到建筑物起火,坍塌,便兴奋到了极点:

“就是这个样子!这正是我们要毁灭他们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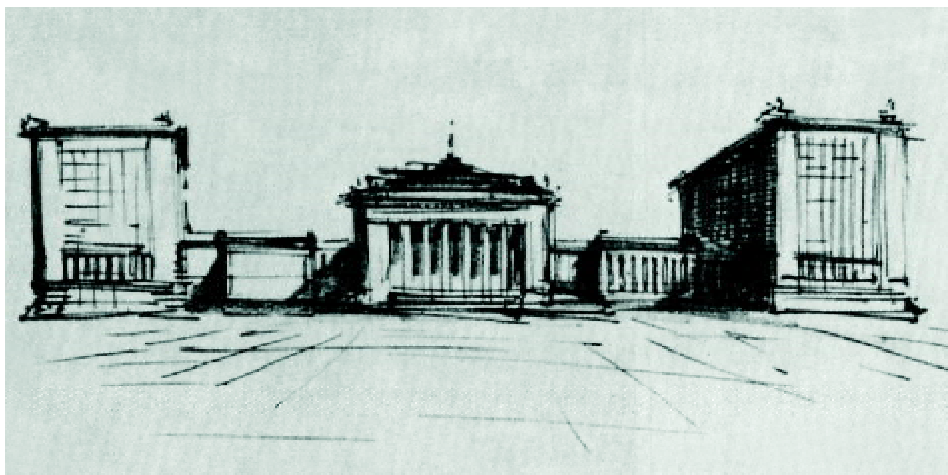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建设(创造)本能和破坏(毁灭)本能是植根于人性或人脑结构的。

也许为了更好剖析希特勒的妄想和疯狂,我们不妨进一步借用精神病学的理论。请莫误会,我不是说,希特勒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双脚站在精神病院围墙内的患者。

精神分裂症有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

阳性症状是妄想、敌意、兴奋、非现实的确信、根据幻想去行动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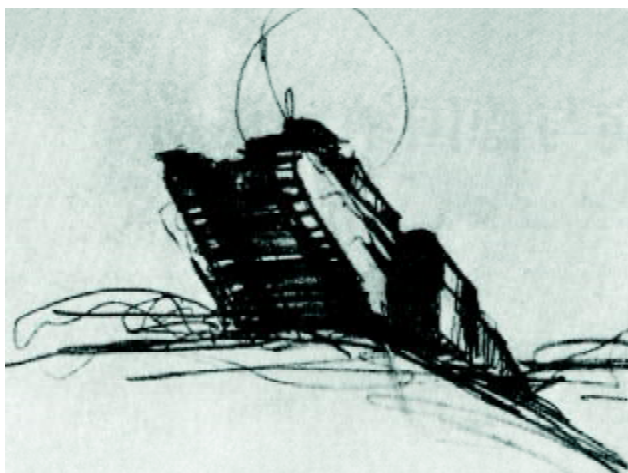
希特勒的言行全符合阳性症状，他抱有敌意的对象真是太多太多，他听到炸弹爆炸声就兴奋异常。可怕的是，他根据病理性的、非现实的幻觉和妄想（比如领土妄想）去行动。一个普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危害很小，但希特勒手中握有德国的国家机器，其危害程度便很大很大。好几百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和盖世太保，再加上德国的世界一流科学技术，统统都在他的手掌中！



这是1925年希特勒画的建筑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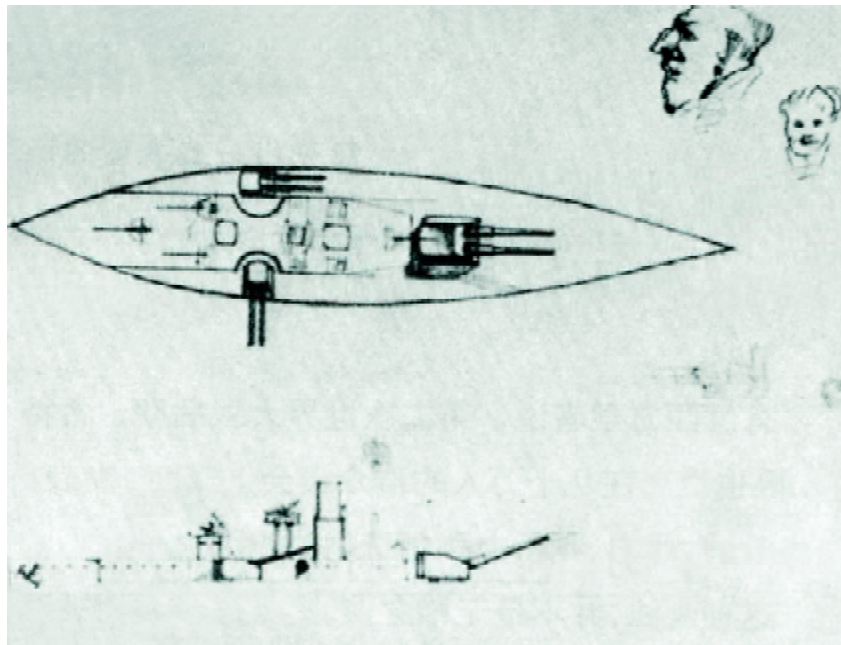
八年后，他掌了权。1939年，他发动了战争。

在作建筑草图的时候，是希特勒的“我”所为。



这是希特勒画的坦克草图，1925年。

^①笠原嘉《精神病》，1998年，日文版，第85页。



这是1925年希特勒画的坦克和军舰草图。它是“俺”所为，“我”和“俺”在他身上是同时并存的。14年后，他发动了战争。可见，他很早就下定决心，通过战争手段去实现他的各种妄想。

他是真干，动真格儿的，这是他同精神病院院墙内精神分裂妄想症患者的最大区别。

希特勒的兴奋是破坏本能的快乐或杀人的快感。

记得19世纪有位德国哲学家说过：

“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Die Lust der Zerstörung ist auch eine schaffende Lust)

这两者交叉也是一个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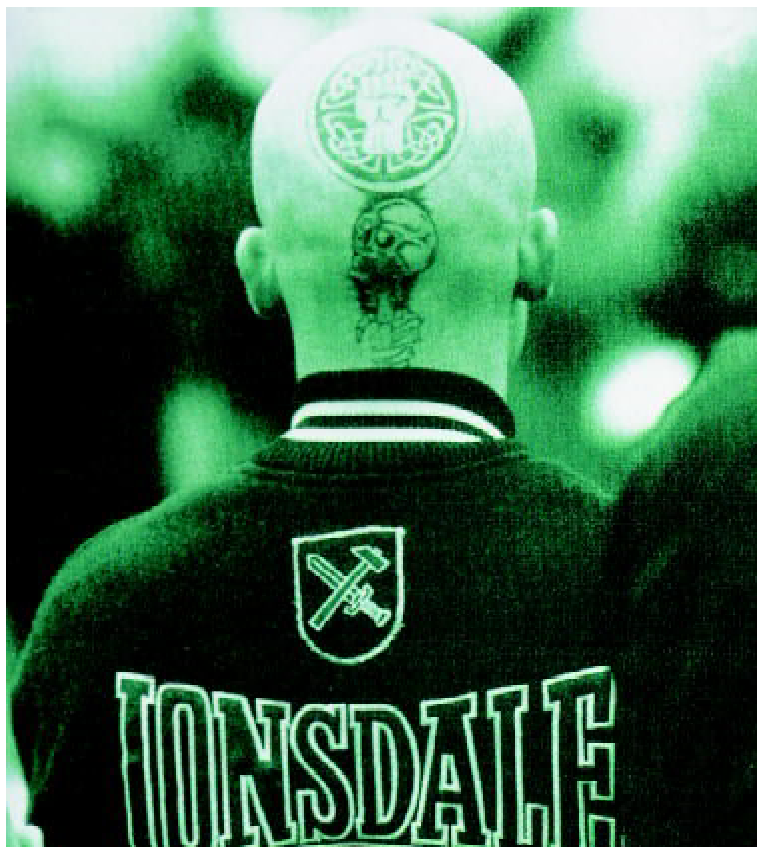
把它写成一个公式：

一个人的社会行为 = $\frac{\text{创造本能}}{\text{破坏本能}}$

这是一个重要公式。

人是受该公式支配的动物；人是分子和分母这两种力进行殊死较量、格斗的战场。

海滩上有群男孩在做搭沙屋的游戏，他们是那样投入、认真、专心一致。沙屋搭成，他们围着屋子又是唱来又是跳，几乎到了手舞之、足蹈之的程度，



德国东部新纳粹分子。

我见过他们，我总是避开德意志民族的这些“俺”。当然，他们力量较弱，成不了气候。但要完全消灭他们却是办不到的。

在东西部城市的一些角落，我见过他们写下的排外口号：“外国佬，滚回去！”

这便是“我”。

之后，他们便开始了破坏行动，每人踢上几脚，直到屋子被踏平。在“俺”摧毁屋子的时候，男孩同样是满怀激情、真诚、兴奋、欢呼雀跃，过足了瘾。

在希特勒身上，分母（破坏本能）很大很大地占了绝对优势，至少在他下令进攻波兰的时候是这样。

上述公式也可以用来刻画德意志民族。在纳粹时期，由于互感，分母也很大；战后和平时期，分子占绝对优势，分母很小。

其实，上述公式同样可以用来观照人类文明之旅的“我”和“俺”：



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他的民族和国家跪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认罪、忏悔。

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德国总理跪了下去，德意志民族站了起来。”

日本呢？今天的日本首相会下跪吗？

2005年5月19日和20日，日本侵华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分别在卢沟桥上和淞沪抗战纪念馆内下跪，为自己的罪行忏悔，这同小泉首相的言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卫星、电脑、电视、手机和医学，以及艺术……是“我”，是分子；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以及塑料地雷……是“俺”，是分母。

战后，德意志民族一次又一次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俺”，洗刷了布痕瓦尔德的耻辱，回归到了魏玛昔日的光荣。

今日的德国，从媒体到教科书，都不会为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而辩护，于是德国在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中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日本则不然。

战后，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遏制苏、中、朝，即联日制共，刻意保留日本天皇体制，没有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责。这样，不少日本人也对战争罪行没有做出应有的反省。

年老和年轻一代日本人只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对亚洲诸国均视为

“手下败将”却毫无低头认罪的意识。

“什么？我们曾败在中国人手里？天大的笑话！”不少日本年轻人这样想，这样说。

日本许多人从心坎里藐视曾被皇军征服过的亚洲邻国，向“手下败将”认罪是种耻辱，是无法接受的！

然而孔子有句名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礼记·中庸》有言：“知耻近乎勇。”

看来，用中国的儒家精神去比较德、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我们便可以说：

德国人是真正富有勇气的，他不但没有因此蒙羞，反而在世界政治事务中赢得了谅解和支持，在道德上得了高分。

德国人能做到的，日本人为什么做不到？

德国人的“我”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彻底清算“俺”，并把“俺”压制到最低最低，使他成不了任何势力或气候，为什么日本人做不到？

五、健康世界和病态世界

这又是“我”和“俺”的错综复杂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你我他（还有她）都生活在这个“十字架”的大网中，谁也挣脱不掉它。

一个人出现“我”和“俺”毕竟是小事一桩，无关大局。

一个民族出现“我”和“俺”是大事，有时危害极大，如日本军国主义的刀。

若是整个世界或人类文明之旅出现“我”和“俺”的严重对立则是事关重大，生死攸关，因为它涉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醒目起见，下面我想分两小节来论述：

A.“异化”这个概念

在1843~1845年这段时期，25~28岁的马克思试图用“异化”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来概括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特征。其实对这个概念的形成最有贡献的当推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但它没有到此为止。今天它还在发展中，在与时俱进，或者说，今天这个概念有着更广大的概括性。时至21世纪它不但没有丧失其生命力，而且超出了原先，极富有时代气息。

可以说，今天的病态世界正是健康世界“异化的产物”（enfremdete Product），是健康世界的陌生形式或自我疏远，是健康世界同自身相离异的

一种存在方式。

弄清“异化”的定义和种种形式表现是重要的。它有许多侧面，而且相当模糊，因为它只是个定性概念，不是定量概念。19世纪欧洲人提出了一些重要概念（或观念），其中两个是：

能量（属于自然科学领域）；

异化（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文学、文艺理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

可以说，今天的21世纪，依然被这两大概念牢牢支配着。比起19和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人类社会更受能量和异化的支配。

能量是个定量概念；

异化是个定性概念。

异化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出现危机的总的概括。

全球气候变暖同能量密切相关，归根到底它是异化现象。从层面来看，异化比能量更基本、更哲学，因为哲学问题比物理学问题更深层。前者属于形而上，后者属于形而下。物理问题的极至是哲学。

关于异化，我想提出如下七点供读者探讨：

1. 马克思把异化看成是社会结构（首先是经济结构）的属性。人的创造物（如宗教、国家、法律、商品和意识形态等）最后与人疏远，成为一种敌对力量，成为控制和驾驭人的异己力量——这是人在事先绝没有意料到的！

简而言之，异化是一个带有动态概念的、抽象的动名词，指的是客体作为主体的产物反过来却成了主体的对立面，成了凌驾于人类文明之上的一种敌对力量，从而支配、控制、压迫、统治人，甚至毁灭人类。

在童话和寓言里，有自我异化的动物，如胆小的狮子和天真的狐狸。

在今天的现实世界，有怕老鼠的猫，因为有钱人家养的猫太娇贵了！有的狗居然天天喝牛奶，吃巧克力！

S太太是我们家熟悉的一位富婆。自从春节那天我知道了她经常用巧克力喂狗，我开始对她很冷淡，因为我打心眼里厌恶她，瞧不起她！她多吃多占社会太多太多！她是个典型的“不劳而获者”。她仗着丈夫是个房地产商，过着醉生梦死的异化生活。

让她的狗吃巧克力正是她的异化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

狗是食肉动物，肉才是狗真正最喜欢的食品。用巧克力喂狗，不仅会使狗肥胖，还会导致狗中毒。因为巧克力中含有基黄嘌呤的物质，会使狗丧命。

首先是人异化了，然后把异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给了狗，结果成了异化的狗。

动物园的动物出现自我异化是普遍现象。

2. 异化就是“作茧自缚”，即自己的产物最后成了支配、控制和束缚自己的力量。

宗教是典型的异化现象。

费尔巴哈说，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结果神反过来统治人。

1932年年底，德国人选出了希特勒，结果希特勒成了神，反过来统治了8000万德国人，把他们引向战争的深渊。在本质上，12年的纳粹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其规模和严重后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

3. 今天，异化现象表现在几乎一切领域。

比如，我们的服饰不仅仅是原先的御寒保暖的功能，而是为了满足人（尤其是女人）追求变化的手段。一个女人如果一个月不买件新衣服，她就觉得人生太单调、太死气沉沉，没有生机，对不起自己。男人很少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这种追求，至少我没有。这是男脑女脑构造上的差别所致。

T台上名模的服装新秀是典型的异化现象。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为人成了异化了的人。今天的运动员便是异化了的人：六岁的小孩与合众的家庭生活隔离开，用各种非人的训练、技术和仪器去锻造他（她），最后制造出一架能拿金牌的机器。这已经背离了健身的原点。

4. 今天，异化成了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文艺理论学家争论的对象。

5. 异化是一种变态现象。

在精神病学中，异化指失去常态，也就是精神错乱。

“俺”便是变态现象。

6. 异化是人类及其文明之旅结构本身的一种属性。

或者说，异化是人存在的一种永久性的结构危机。

对异化这个概念的去、现在和将来，我都有浓厚兴趣。我说过，异化现象比以前更为普遍、更为深重。

关于异化的未来，我想说，把异化程度控制在无毁灭性的范围之内是可能的，但完全、最终消灭异化却办不到。

人总是自我异化的，否则，他（她）就不是人。

人总是同自己过不去，老爱折腾自己。

“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 中国人如是说。

这种状态是人脑构造决定的。

7. 面对异化如此多的定义，很难说哪一种最好。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去利用它。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定义；面临另一个问题，再去利用
另一个定义。

B. 人类文明精神病理学

这个学科的名称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它是我多年思考相关问题的一次
顿悟。当时我的心境如《五灯会元》所说：

“一轮皎洁，万里腾光。”

过一两年，一旦时机成熟，我便动手写本专著：《人类文明精神病理
学》。我希望新华书店营业员不要把它放到医学的架子上，恰如不能把《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归类到冶金。按性质，我这本书是哲学书。

我的思路是：在当代人类文明之旅和精神病理、精神病学之间架设起一
座桥梁，使之发生联系。或者说，我是想进一步系统地从精神病学借来亮光，
为的是理解、把握我们这个有病的世界。

因为患者不是某个具体人，而是当代人类文明整个世界。

前些年，我读到一个德文术语：“自我病理”(Egopathie)，我的心一震，
一跳，拍案叫绝：妙哉！

别小看了一个关键性术语。一个重要术语就是一种世界观，就是一把打
开一个新世界的钥匙，就是“芝麻芝麻，开开门。”

纷然杂陈的万千现象因一个重要术语(比如能量)的出现而霍然变得秩
序井然。

我特别看重如下术语：“分裂的自我”，“失落的自我”，“迷茫的自我”。

如果把“自我”撤换下来，用“世界”去顶替，那便是“人类文明精神
病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组成部分：

迷茫的世界、失落的世界和分裂的世界。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世界。

战争或流血冲突是最重的病。

二战结束，人类并没有从中接受任何教训！

以亚洲为例：

这60年(1945~2005年)仅仅是一段相对和平时期，或叫不稳定的病
态的和平时期。其间，发生了九次国际性的战争冲突，14次内战，10次游

击战，12次国家暴力政变。

目前，亚太地区购买武器占世界军火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今天，亚太地区有将近八亿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三美元，而最近10年购买武器的费用便达到人均64美元！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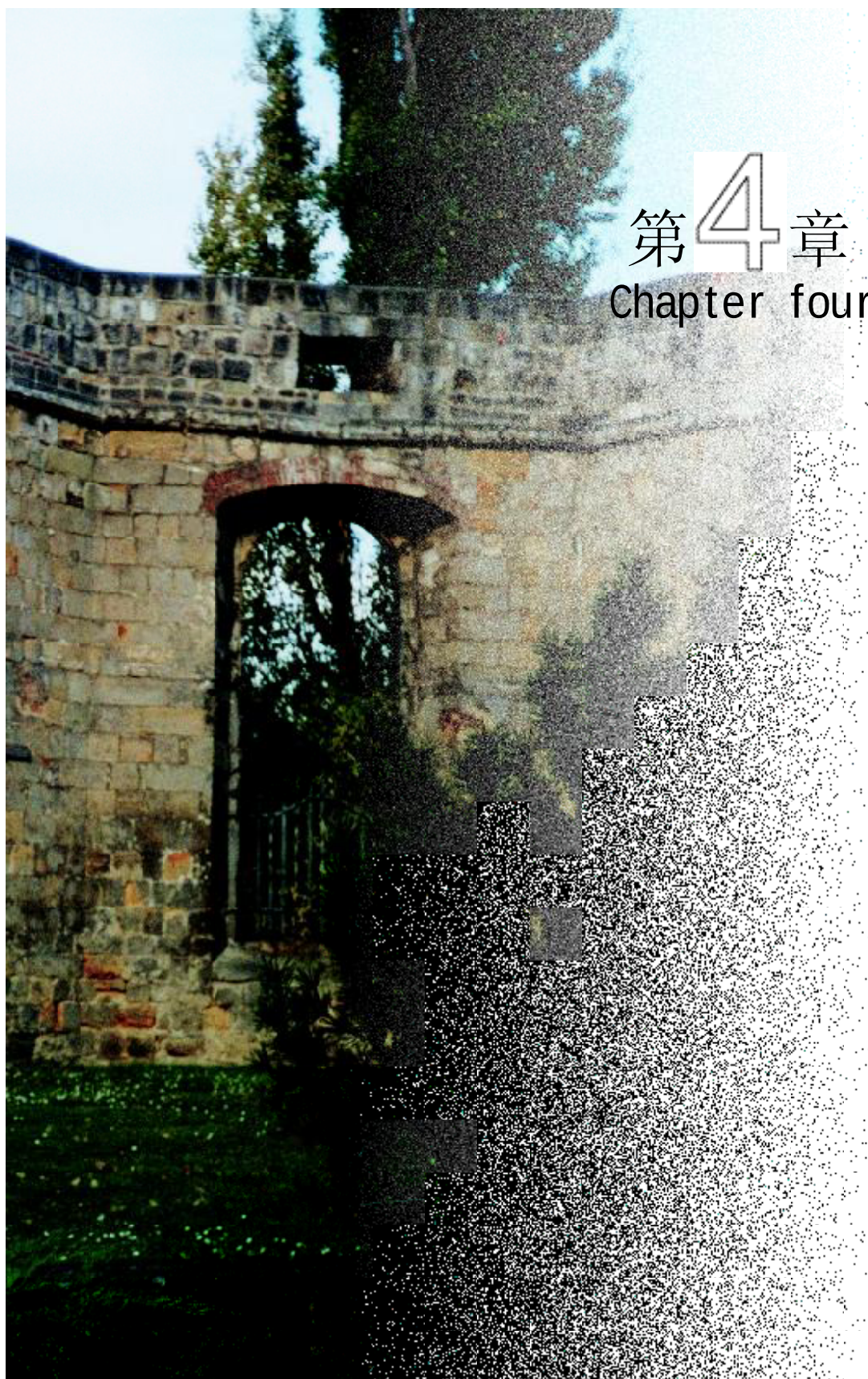
这不是世界的“自我病理”临床症状吗？

不提出这个课题来研究，我就是失职，就是有罪，对不起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也对不起半个世纪（1955～2005年）我的“自我觉醒”和一连串的自我努力。因为正是1955年我考进北大，今年恰好是50周年。哲学的觉醒需要经历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



第4章

Chapter four



自然律和道德律

这又是一个黄金大十字架，而且非常壮丽。对于人类来说，这个宏伟、崇高的十字架还是生死攸关的。

日出于东（日掌阳）是纵轴；月生于西（月掌阴）是横轴。两者垂直交叉，为日月无私照耀，照亮了人类文明之旅。

你能想像没有自然律和道德律交叉的人类文明之旅吗？

那会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中国人崇拜日月，《易经》有言：

“日月丽乎天。”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我们不妨把此处的“明”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明”。

其实我书房墙壁上那个姿态横生的十字架便包含了自然律和道德律，它日夜都在提示我，提高我：

这个十字架是一幅最高的世界哲学图画。最要紧的是我要学会立万象于胸中，须自己心胸高旷或高朗。

这才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需要我一辈子的努力。

一、巨人和矮子：一个残缺的十字架

比起一百多年前，今天的自然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潜入了上帝的工作室，偷看到了他设计、创造世界的一些图纸——这是一些属于A级的绝密。

对自然律，我们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层的了解。

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便是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

比如在天文学领域。

科学观测发现，引力总是力图制造出两种空间几何形状：球和盘。

如星系盘。在星系演化中，恒星盘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还有银河系的

盘，以及盘星系。

当人类在宇宙时空中瞥见“有序的盘结构”，我们只有惊叹万分和无比敬畏的份——在今日认识自然律的道路上，我们又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科学家对彗星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也许在地球生命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彗星同时扮演了创造者和毁灭者的双重角色。（不用说，又是一个十字架——这具有宇宙的性质）

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遭到了一场彗星雨^①。这场雨在不久诞生的年轻地球上播下了生命种子——复杂有机分子。（这是彗星的“我”，即创造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后来的彗星“俺”出现了，它撞击了地球，使不少生命种类（如6500万年前的恐龙）归于灭绝。

在太阳系中，彗星是最原始的天体。

人身上的双重人格——创造的快乐和破坏的快乐——是否源自彗星？地球的生命归根到底是彗星创造的，也是它毁灭的。它是受上帝的指使吗？

人们期待从彗星上获得样本，探究太阳星云各个阶段的化学进化，进而探索生命分子的起源。

再就是神经生理学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比如：

夫妻吵架，丈夫看到妻子在整理箱子，便犯愁，知道她动了真格儿的，决心回娘家住，不再回来，开始分居。

现在要问：丈夫怎么知道妻子在想什么？人如何知道别人的感情、意图、目标或信念？

最近意大利有个科研小组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神经元，他们称之为“镜子神经元”(Mirror Neurons)。

它是解读他人心理的一种脑细胞^②。

镜子神经元在心理学上的作用，会像DNA在生物学上的地位。它将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帮助解释迄今仍是一团迷雾的心理能力的难题，即有关人类的进化、语言 and 大脑等重要问题——人之所以成其为人，这些问题是核心。

它使得人类在朝“认识自己”这个最终目标推进的道路上，又跨出了一步。

^①自《American Scientist》，2001年5~6月号。

^②A. Motluk的论文，载“New Scientist”，2001年1月27日。



这是柏林繁华地段一座在二战中被毁的教堂。

柏林人有意不去重建，使之成为一个醒目的警示符号：

不再要战争！

我就住在附近，常经过这里。德国所有的城乡都有教堂，当晚祷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总是能从中听出一些叫人沉思的句子，其中一句便是：

“爱人吧！”

但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还是一再发生。欧洲遍地的大小教堂并没有有效地阻止反人类、反道德的战争。可见道德力量经常不是人性中恶势力的对手。

为什么会有战争？

再就是 DNA。

1953 年 2 月 28 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沃森和克里克设想出 DNA 双螺旋结构的存在，从而掀起了一场生物学的革命，标志人对自然律的深刻理解。

今天，DNA 已经成了一种强大的、万能的和无处不在的工具，以至于有人在“Nature”杂志发表文章幽默地说：

分子生物学已经死了，因为 DNA 可以归类到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说，

①自“Scientific American”，2003年3月10日，该杂志采访沃森(J.Watson)的纪要。

DNA 已经成了一种万能的工具，什么事情都来自 DNA^①。

的确，这半个世纪（1953～2003 年）是 DNA 的世纪。原来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按照搭载在 DNA 分子上的信息链上的指示组装而成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律的伟大成就之一。

沃森(J.Watson)有这样一段自白

“对我而言，分子生物学已经谢幕了。以 DNA 为基础的理论贯穿了整个生物学，使得众多原本独立的领域已不复存在。”^①

为了了解 DNA 的广泛应用，我想从犯罪学领域列举两个例子：

A. 据《纽约时报》2005 年 4 月 27 日的一则消息报道，32 年后，从一条女三角裤上提取的 DNA 成为侦破 20 多起强奸案的关键证据。

现年 58 岁的沃雷尔先后犯下过 24 桩强奸案。

在一个收藏了长达 32 年的文件夹里，检察官发现了一名受害者（女）的一条内裤。当局利用全国 DNA 数据库，把沃雷尔原先旧的 DNA 和新从他身上提取的样本进行了比较，从而锁定沃雷尔正是一名惯犯。

所以检察官说：“过了 32 年仍可以检验出 DNA，这会使许多罪犯不寒而栗！”

B. 2004 年 12 月，美国阿灵顿地方有一栋屋被人焚毁，现场只发现一项

年份	战争次数
1480—1499	9
1500—1599	87
1600—1699	239
1700—1799	781
1800—1899	651
1900—1940	892

最近半个世纪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几万年前狩猎和食物采集阶段的原始人那里，战争较少发生。随着文明的进步，人脑、语言符号系统和双手的随之发达，战争也越来越频繁、残酷。上面一组统计数字说明欧洲地区的战争次数（频率）。

其中 1900～1940 年最触目惊心。因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在这短短的 40 年间。这是对人间道德律的严重亵渎。许多德国知识精英都被卷了进去，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迷失了善和恶的大方向。

也是在这 40 年间，科学技术文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这一极端病态的自然律和道德律的非对称一直令我吃惊。

^①转引自 W.Gilbert 的文章，载“Nature”，2003 年 1 月 23 日。

帽子和一条裤子，除此之外，纵火犯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后来警方发现，在裤子上找到的DNA跟在其他几处纵火现场找到的证据完全相符，全都来自现年50岁的斯韦特，最后这名纵火46起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网。

今天，世界各国在给罪犯定罪时，“出示DNA证据”已经变得同“核验指纹”是一样的重要。DNA证据最具科学和法律效力，因为最可靠^①。

——这是基于人类对以下自然律的深刻认识：

因为几乎人体的每个细胞均含有DNA，而且几乎每个人（除同卵双胞胎之外）的DNA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DNA测试成了识别人的最好方式。（又是一个因果关联句子，它是上帝造物主造的句子，人类听懂了）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无意当中都在不断地留下自己的皮肤细胞、毛发和唾液等种种含有DNA的结构材料。

所以有关研究人员可以唾手得到DNA证据。

世界首次借助DNA手段起诉了一名强奸和谋杀罪犯是在英国，1986年。第三个例子来自纯科学领域：

一切动植物均享有同种DNA密码，所有地球上的生物均具有DNA结构。地球上的生物来自共同的祖先，没有DNA就没有地球上的生物。

比如最近科学家就破译了鸡的基因密码，发现三亿多年前人类和鸡曾经共有同一个祖先。

今天家鸡的祖先是原鸡。原鸡约有2万~2.3万个基因，数量与人类大致相同。这从分子生物学的深层面证明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

可以看出，近百年来人类在认识自然律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在这个领域，人是一位巨人。

那么，在道德方面呢？

人却是矮子，侏儒。这是严重的不对称！可见，人类文明有病。

其实在道德哲学上，人类很早就有很深刻、很系统的认识。但道德律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

人类的行为（道德实践水平）落在自然科学进展的后面。这尤其是在伽利略拉开近代物理学的序幕之后，两者（自然律和道德律）的差距便更大，更明显。

两千多年前人类对道德律认识水平遥遥领先于对自然律的把握。当时人

^①S. Conner “DNA改变世界的23种方式”，载《The Independent》，2003年2月26日。



金边街头一座雕塑。作为禁止私人拥有武器的一种警示，证明当地武器买卖和扩散很猖獗。

一个私人拥有武器的世界无疑是一个病态的世界，是世界精神病态的临床症状之一，公民的道德水平也可想而知。至少道德受到普遍的亵渎。因为在武器和恐怖活动泛滥的世界，居民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



哥伦比亚内战期间居民大逃亡的情景。自1985年以来，哥伦比亚约有200万人逃离家园。这时候，人们的道德律到哪里去了？



这是哥伦比亚内战期间，飞机喷洒化学制剂，摧毁敌方农作物的情景。

动用生物武器作战是世界有病最严重的临床症状之一，也是对道德律的亵渎。它使人想起六七十年代美军在越南大规模使用落叶剂，其严重后果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压根儿就不晓得空气和水的构成，更不知道元素周期律以及微积分和微分方程，当然也不知道致病的原因是细菌和病毒。

但东西方的儒释道和基督教在道德律方面都有很高的哲学智慧。比如孔子提出了人与人相处的一条最高准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实行起来却是两码事，今天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

有了准则，不实行，白搭。

孟子提出的准则更详尽、系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正是因为有了这四端的缘故。正是这四者使人从动物界区别了开来。所以孟子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进入21世纪，孔孟之道依旧如日月之明，普照东西方人类文明之旅。我们理应把它写进中小学教科书，让它流进21世纪中国青少年一代的血管里。

或者把这些有关道德律的智慧格言写进校训。

我们没有这么做！

或者做得很不够。

关于天理与人欲，宋代的朱子也有很好的解说：

“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饥食渴饮，加上三口之家住两室一厅，是合理、正当的天理——这也是我推崇的小康或安居乐业。

过度、对地球生态环境有大害的欲望则是恶。

美国生活方式便是恶。今天中国有些富婆用牛奶和巧克力喂狗也是恶。

把人作为研究、思考的对像是一切宗教和哲学学说的源头，基督教当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有关道德律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上帝就是爱。”

效法基督，就是效法基督对世人的爱。

因为基督是真正的人，是人的典范。

我们愈效法基督，便愈成为人。

在《新约圣经》中有大量经文是告诫效法基督的，因为神学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效法基督，人的生命才能提升。

但实际情形呢？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在教堂钟声缓缓悠悠敲响的时候爆发的吗？

当时欧洲人对自然律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

1900年既是普朗克发现能量量子的日子，也是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的年份。1905年相对论在欧洲诞生，九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量子力学呱呱落地之后只有十多年，二战战火即点燃了起来！

自然律和道德律这两者是多么不相称！

2004年夏秋两季，我作为国际评委之一，赴柏林和巴黎参加“尤利西斯”报告文学评审议论。参赛的二十多部作品绝大多数的主题是揭露当代人的恶或道德沦丧，悲剧性的事件均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日子：比如种族大屠杀；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仇恨和相互残杀。

美国报告文学作家哈茨费德的《卢旺达大屠杀》荣获二等奖。

作者呼唤道德和良心（即孟子的“四心”）的回归。

1994年，在不到六个星期内，卢旺达便有80万图图人遭杀害。就是说，每六个图图人便有五人被害！冲突双方均属于同种、同语言，不同的仅仅是被害一方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卢旺达是非洲的一个小国家，面积只有丹麦的三分之一，人口为550万）



在欧洲公路上，我经常看到这个警告来往车辆的符号，令我感动。它在提醒驾车者，路上有可能出现野生动物，过往车子别伤害到它！

在我看来，这就是“地球神学”或“生态宗教”的精髓了。自然律和道德律这两个无形轮子的对称是汽车四个轮子运转的伟大前程。

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认识自然律的伟大、辉煌的世纪，但也是道德沦丧的悲惨世纪。

19 世纪末，曾经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气数将近，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已先后独立。土耳其人把国家分裂归咎于亚美尼亚人与外部势力勾结，所以决定实行“种族大屠杀”。

1915 年，先是对 650 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精英和显要人物下毒手，后是全面灭绝。原先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约有 200 万，遭屠杀的便达到 100 万至 150 万！这不比德国纳粹“逊色”。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善与恶的格斗史，也是“我”与“俺”的冲突史。

今天，在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公路旁边兴建了青蛙隧道，令我感动，增强了我对道德律及其实践的信心。

夏季是青蛙交配期，公路两旁水塘的青蛙常成群结队爬过公路去寻找伴侣，于是不少青蛙成了轮下之鬼。“青蛙隧道”便是为保护这种动物而设置的。

——这是环境伦理学（或叫宗教生态学、生态神学和大地神学）的体现。我双手赞成，并拍手叫好。

大地神学是孔孟、康德道德律的扩充。

只有扩充了的道德律水平才能同今天人类所认识的自然律水平相称，构筑成一个健全的、与人类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十字架”。

人类文明是辆车，它安放在两个轮子上：

自然律和道德律。

很遗憾，自然律很坚固，结实；道德律则很脆弱，混乱，常常失灵，玩儿不转。

这便是当今人类文明之旅运行的实况。左右轮子很不对称，有翻车的危险。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伤残的十字架，在西风残照下，它显得十分忧郁，

心事重重。

最后，作为本小节的结尾，我要提一下王宗仁先生的一篇散文《藏羚羊跪拜》（载《新民晚报》，2000年9月25日）。文章谈到母羊为了保护小羊，跪在猎人枪口底下求饶的一个真实故事。读后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原因有两个：

1. 我放过六年羊，我抱过小羊。小羊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

2. 好几年前，有几个从青藏高原来的人在上海街头巷尾贩卖藏羚羊头角。我劝他们不要再捕杀这些可爱的动物，他们一句也听不进。最后我斗争了一场，决定用100元买下一个。我知道，我买，是在支持捕杀行为，恰如有人去买象牙工艺品。但我发誓：我要把这个小羚羊头角作为一个警示符号，挂在我的书房门口上方，时时提醒我，让我至少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坚定的野生动物保护者，把人间道德律推广到整个自然界——我指的是“大地神学”或“生态宗教”。

据报道，全球野生动物年贸易额高达6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法的，利润率为1000%。

在阿拉伯国家每年隼的走私量在600~650只，每只价值五万美元。这个物种的生存正面临严重威胁。

我记起一首唐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才是“生态宗教”的精髓。

我是一名忠实的信徒。

二、物理基本常数和数学基本常数的哲学意义

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神论的课题。我们对它探讨得越深，内心对上帝宇宙(God-Universe)也会愈加敬畏，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说过，1997年有人算出了¹小数点后面的515亿值，还没有穷尽。

人能如此精确地知道这个数值，但对它的起源和为什么是这个值(比如为什么不是4.14或2.14)，我们却一无所知——这是人类最大、最根本的无知！（知和不知这个十字架十分荒诞！）

归根到底它属于上帝（造物主）的绝密。

写到这里，我仔细对着镜子看了一下我的黑眼珠，相当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其他几何形状，如长方形、三角形和正方形？如果某人的黑眼珠呈三角形这不是活见鬼了吗？可见，圆才使我们成其为人。

在我们的黑眼珠里头也有¹。

¹参与规定了我们的“眼 - 脑系统”。

如果¹的值是4.528,那么,太阳系、地球、人和其他生物……可能会不存在,要不就是另一个模样,别的什么图景。

也许,我们人类和人类文明正是 3.14^1 的产物,是¹人,¹文明。

¹和其他常数是自然律的主角。这些常数支配了整个宇宙,也决定、规定了人类及其文明的性质和命运。

在我的书架上有这样一本厚厚的书:

《Astrophysicae Quantities》,1973年,英文第三版,C.W.Allen,译成汉语是《天体物理量》。其实这是一本详尽的手册,会集了各方面的数据,但没有作任何解释。编者仅仅是把许多实验结果、数据和基本事实排列出来(当然是分门别类)。

这本书跟随了我将近30年,经历过十多次搬家的考验,我没有把它扔掉。即便是传到我孙子的孙子手里,它也只不过是有些数值的精确性需要作些细小的修改罢了,百年之后它也不会过时。

编者在第二章用了三小节列出了数学常数、物理常数和常用天文常数。

其中包括焦耳当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标准大气压、精细结构常数、光速、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电子电荷、电子质量……

下面我从中选择几个作些自然哲学的探讨,最后必然会引向泛神论,即上帝 - 宇宙或宇宙 - 上帝,也就是宇宙宗教感。

A. 光速,每秒约299792公里,非常接近30万公里。

在现代物理学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物理常数。

第一次提出“光有速度”这个观念的是伽利略。然后他进行了有关光速的测量,时间约为1600年,即我国的明末,用的测量方法是提灯的一开一关。由于技术、仪器太粗糙,不过关,得不出一个定量结果,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不是瞬时,也是非常之快。”

万事开头难。

后来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仪器的不断精密,光速的测量结果也有了明显改善。

1675年,法国的罗麦用天文学的方法测得光速为每秒20万公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后来每隔些年,便有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用一种先进的方法进行测量。

1876年,法国的考纽用齿轮方法测得每秒约为299990公里,非常接近

今天的值。

不过这个时候战争也越来越频繁、残酷，包括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880年，美国的迈克尔孙用旋镜方法测得光速每秒为299910公里。可贵的是，他为了求得更精确的值，一直在努力改进方法，作了一系列的测量，历时半个世纪之久。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好像就是要见证光速究竟有多快——这是健康的、追求真理的“强迫症”。

人类认识自然律，要的就是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迫症”。

爱因斯坦称赞迈克尔孙设计实验的巧妙和高超，认为他富有艺术家的气质。

1973年，一个美国科研小组用激光技术测得光速为每秒299792.45公里。（这是个无理数）

现在我要在这里作出如下五点评论：

第一，将近400年，人类一直在不断地精益求精，企图得出光速的精确值，可谓前赴后继，非常悲壮，英勇，坚韧不拔，可歌可泣，为的是加深对自然律的认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这400年，战争爆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自然律和道德律愈加不相称，失去了平衡。这是世界有病的临床症状，也是一个残缺的十字架。

第二，数十次测量，尽管用的方法不同，但都趋向于同一个数值，或者说总是在299792公里左右作些微小的摆动，也就是每秒接近30万公里。

这说明在宇宙间的确存在一种永恒的不变量，这种量是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

第三，光速（用C这个字母来表示）在现代物理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知道，可见光仅仅是电磁波的电磁能的一种形式，只是一个特例。

自1923年至1952年，人们用不同方法测得无线电波的发射速度（公里/秒）同光速是惊人的相似——两者统称为“电磁辐射速度的测量”^①（本来它们就是一个家族）。比如：

1950年博尔用谐振腔法测得无线电波速度为299789公里/秒。

1952年弗鲁默用微波干涉仪法测得无线电波速度为299792公里/秒。

到了20世纪，牛顿古典力学失效，原因是它把光速当作无限大处理，直到爱因斯坦才把它看成是有限的。所以上述一系列精确测量才显得很重要。

^①G.R.福尔斯《现代光学导论》，陈时胜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5页。

光速 C 是区分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的界限。

牛顿定律对于一个范围内的观察还是高度精确的，牛顿力学对它们的解释都很成功，只有对于以接近光速运动的质点，我们才要用到相对论力学。

我们只有在处理原子核物理学的时候，才会遇到这样大的速率。

在著名的爱因斯坦公式中，便有光速 C ：

$$E=mc^2$$

关于这个质能相当性公式，爱因斯坦是这样说的：

“……这里 C 代表光速，大约每秒 30 万公里， E 是静止物体所含的能量； m 是它的质量。属于质量 m 的能量等于该质量乘以光的巨大速率的平方——就是说，对于每一单位的质量都有一巨大数量的能量。”

第四，可见，今天人类文明（包括无线电广播、手机、电视、核电站、核武器……）在本质上是光速的文明。光速是当代人类文明大厦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如果光速的值发生很大变化呢？

比如今天是大约 30 万公里，明天突然变成 2 万公里，后天又是 24 公里，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只能是整个人类文明大厦的“9.11”。

幸好，大自然不会这样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

这才是自然律的最重要的品质。

所以 18 世纪法国哲人卢梭才说：

“别去谈论人，还是谈谈大自然吧！”

这是对自然律的信赖、崇敬，对道德律的失望、悲观的流露。当然，这也是我在极“左”政治时期（1957～1978 年）独自一人偷偷跑到自然科学王国去漫游、惊叹的主要动机。

我是在道德律没落、自然律的智慧之光依旧普照大地的时期渐渐成长起来的，尽管我今天并没有成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不过自然律的多彩多姿和壮丽却营养过我，安慰过我，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在我看来，坏政治是对人间道德律的最大亵渎和最严重的破坏。

因为一个杀人犯只能杀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坏政治（比如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却能屠杀好几千万人。

第五，在自然界有没有超过光速的运动呢？

“Science News”（科学新闻）是我经常阅读的一本国外杂志，许多年，它是我的至爱亲朋。对于我，它有两大大帮助：

让我经常知道“天高地厚”，避免“井底蛙之见”，从不会去“夜郎自大”。让我的哲学思考和概括尽可能地可信。哲学抽象必须来自两大领域的基本和普遍事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1994年9月3日的《Science News》登出了一则报道，说近年来科学家观测到了在遥远的星空中心有物质猛烈喷射，其速度可能是光速的几倍。

如果在遥远的宇宙某处有比光速还要快的速度存在，我们现有的物理理论便要作出重大的修正。

也许我们观测到的宇宙仅仅是“人类眼—脑系统”的宇宙，它仅仅是全体宇宙中的一个极小部分，海滩上的一粒沙子。

我家养了三只小乌龟，昨天有一只龟把长颈和小头伸了出来，总长约3厘米。我朝它扬了一下手，它马上把头 and 颈缩了进去，说明它有感知，也许还有一定的智力。

不过乌龟所感知和把握的宇宙仅仅是“龟眼—脑系统”的宇宙。这个宇宙同人的宇宙能平起平坐吗？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吗？但从全体宇宙来看，人的宇宙不会比龟的宇宙大多少。

B. 普朗克常数

大自然像人，我也喜欢把她人格化。量一量她的脚趾，也就等于量了她的全身。光速 C 是她的一个脚趾度量，普朗克常数则是另一个，当然还有精细结构常数、电子静止质量、电子电荷和玻尔兹曼常数等大约十多个。

光速 C 是相对论的表征，普朗克常数 h 是量子论的表征。两者垂直交叉，又是一个十字架，它是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理论，奠定了我们今天后工业文明的基础。

1900年，德国伟大物理学家普朗克发现了 h ，故用他的姓氏命名。

在研究原子系统行为的时候， h 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质，因为原子的大小以及海森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等均取决于 h 的值。

该值很小很小，所以在1900年之前一直逃脱了人的眼、脑系统。 h 的出现，表明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作用量都比普朗克基本作用量量子要大，且大得多。

普朗克本人特别注重精确测量，要求不断提高精确度。因为：测量愈是精确，自然律的真实面貌也就愈加清晰地披露在我们面前。

但与此同时，道德律也越来越受到挑战、亵渎和玷污——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剧。

普朗克先后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尽了苦难，他的两个儿子

分别死于两次战争。

他深深懂得道德律的重要性。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作为德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去会见“元首”，同时也为犹太科学家说情，但遭到希魔的断然拒绝。这才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在当年的西方，希特勒是亵渎、践踏和伤害道德律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使西方文明倒退到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普朗克则是维护、颂扬和推进自然律的圣人。

圣人和罪犯同时在德国出现，构成了一个伤残、荒诞的十字架，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

一部人类文明之旅的历史，为什么常常会冒出这样一个不相称的十字架呢？

我们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吗？

荒诞是人类文明固有的、不可消除的结构吗？

C. 精细结构常数

它是由这几个基本常数构成的：

e （电子电量）， h （普朗克常数）和光速 c ，以及 1 。

四种成分都是非常基本的，可见精细结构常数的高级、基本和重要。打个比方吧：

它是一种高级瑞士巧克力，其成分是牛奶、可可脂、蔗糖和果仁——你说能不好吃吗？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常数，其值约137。

它决定了原子和分子的性质，影响电子和质子的相互关系。如果它的值过大，原子和分子便不能存在，恒星也不能形成，也就不会有地球上的人类。

最近半个世纪，一切进行哲学思考的大物理学家都想进一步阐明精细结构常数，比如：

该常数为什么取137这个值，而不是156或98？有人用幽默的口吻说：

也许上帝生出另一个手指头或半个脚趾，否则这个数值不会变动。

总的来说，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常数（包括电子电量）之所以是这些值，而不是其他值，才使得原子得以形成和结合。如果出现偏差，银河系、太阳、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便不可能存在^①。

^①参见A.Eddington《基本常数》，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第37～58；D.E.Thomsen《物理常数在变吗？》载美国《Science News》，1976年，第4期；J.Barrow《变化之谜》，载《New Scientist》，2002年9月7日。

最高的自然哲学命题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形而上，哲学味十足。

又：如果上述常数发生改变——最后滑出了人类生命存在所允许的范围或界线，宇宙会成为另一种情景，地球便不再适宜人类生存和居住了。

在宇宙茫茫的时空，宇宙没有理由或义务一定要维持人类永远存在下去，更谈不上让人类永远安居乐业。

当然，这是上帝 - 宇宙考虑和安排的事，人无能为力。

人唯一能做的事只有一件：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去实践道德律。

康德的道德哲学作了多好的规定！希特勒一上台，多数德国人感应了非理性的妄想，道德律不是荡然无存了吗？

今天，我们不缺自然律，而是严重欠缺道德律及其实践：

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

自然律和道德律这个十字架理应用“敬天爱人”这个由四个汉字构成的十字架去替换下来，因为“敬”和“爱”是两个动词。

今天我们最欠缺的不是认识，而是行动；不是名词，是动词。

写到这里，本章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不，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又起。

要知道，上述基本常数又叫自然常数或普通常数。英文是The universal constants, 德文叫Die Universellen Konstante, 它们有一个特点

目前测定的所有这些基本常数都是无理数（无限不循环小数）！！！！

迄今为止，科学家还没有找到数值为有理数的基本（自然）常数！！！！

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我们对此不感到万分的惊讶吗？

这是上帝性格、个性和偏爱的反映吗？

在骨子里，宇宙—上帝或上帝—宇宙喜欢无理数，所以他在设计、建造宇宙的时候总是使用具有无理数的基石。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以下自然（基本）常数的数值便是近似值（无理数）：

光速：299792

普朗克常数：6.6260755……

万有引力常数：6.67259……

电子电荷：1.60217733……

电子质量：9.1093897……

阿伏伽德罗常数：6.0221367……

玻尔兹曼常数：1.380658……

玻尔半径：0.529177249……

精细结构常数: 137.03599976……

在人类的心目中,自然律一向是严谨、精密和毫不含糊的典范,但在骨子里它又是蛮不讲理的!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反映、刻画自然深层结构的基本常数都是无理数呢?

这一叩问是形而上的性质,没有人能回答,爱因斯坦也不能,100个爱因斯坦也不能——可见人和上帝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恰如我家养的乌龟和人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归根到底,我是个不可知论者。

即便我们把一切一切的哑谜之球踢到上帝跟前,最后还会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那么,上帝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赞成建立一个新学科:基本(自然)常数学,这门学问的最高目的是人不断走近自然律,走近宇宙—上帝。

该学科主要研究常数的测量方法及其改进,减少误差,有时候这会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可能是一大片新天地发现的前奏。

探索常数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的背景。

比如上面提到的一长串数字可以说是上帝手机的号码,不止一个,是许多个。拨打每一个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听到上帝—宇宙在幽谷、深谷或大峡谷的回音。

我们无法直接听到宇宙—上帝说话的声音,只能听到它在万米深的幽谷里的回响。

道德律也有专门的学问。

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R.Rawls)写了一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便属这门学科。

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w)也属于道德律的探求。

“法律和社会秩序”(Law and Social Order)是个很有搞头的课题。

注意,自然律和道德律的“律”,英文都是Law,所以我建议把这两者合并成一门十字架的统一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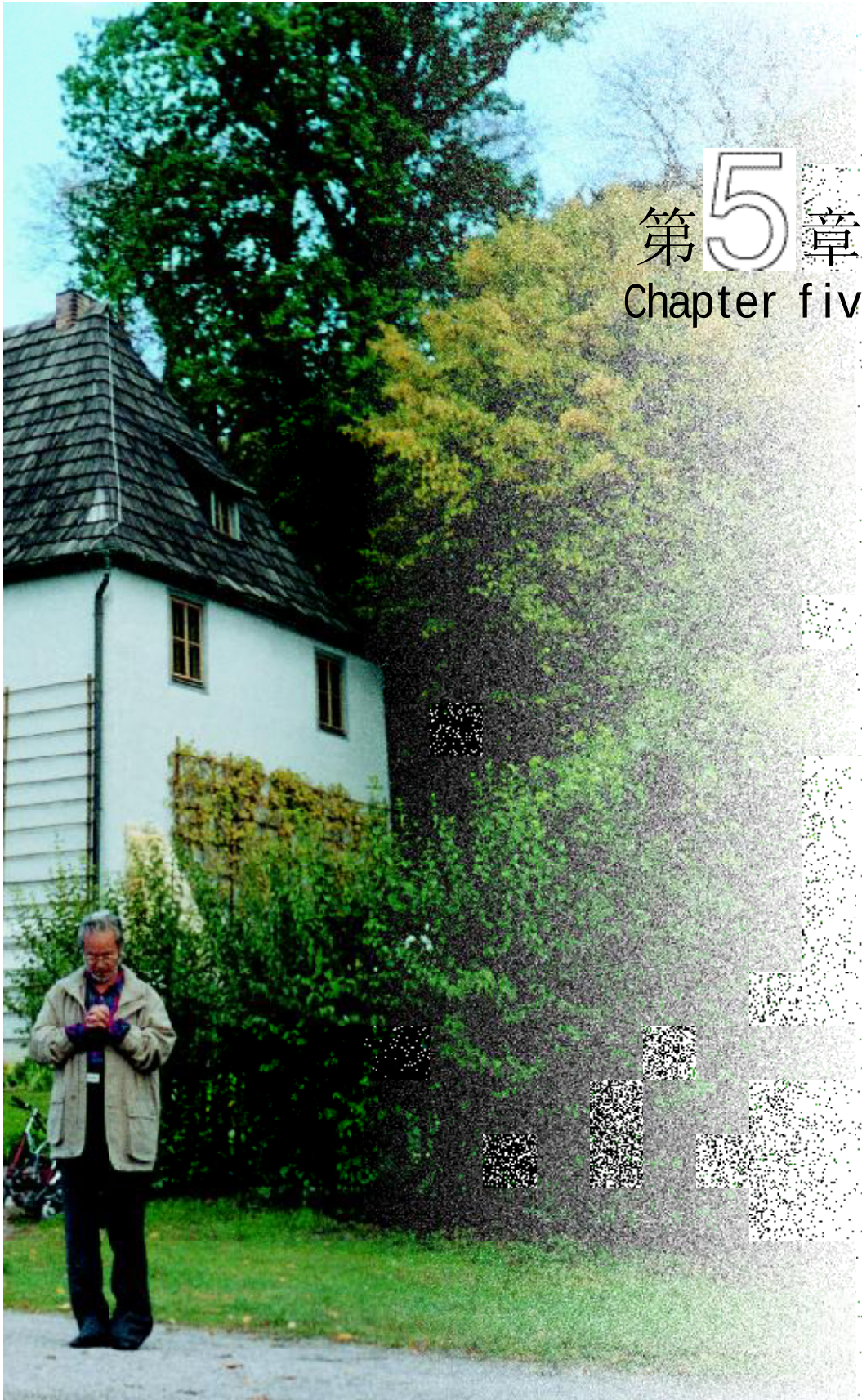
我们每个人都钉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

这才是“落地哭三声,好歹命生成”。



第5章

Chapter five



男人和女人

把男人和女人这个十字架扩充到自然界，你就会立即感受到公（雄）和母（雌）的成对出现是多么普遍！

作这样的安排，只能出自上帝大自然那双无形的、万能的手。

——2005年5月15日于浦东“十字架”书斋

其实，许多年前，我就打算做一个“性”（Sex）哲学家——而不是性社会学家。

性哲学探讨的是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比如性的生物学基础，性的进化，甚至是性的形而上背景：

性是如何起源的？

大自然为什么有如此普遍的性现象？

男女之间的性爱、情爱、婚姻和家庭为什么有欢乐也有痛苦，而且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

2004年初秋，我在卢森堡。走累了往咖啡馆一坐，顺手翻开一张小报，有一版是寻友和征婚广告，读来很新鲜：

1.“欲寻找40岁以上女人，用英文神聊，或者再进一步发展。”（紧接着留下了E-mail）

2.“田园摇滚——德国最大的摇滚乐节。你想去吗？我去！愿同我一道去吗？”（留下了E-mail）

3.“男42岁，正在生锈的男人，欲觅寻能润滑自己为我除锈的女人。”

4.“性格开朗，身材修长，乳沟大峡谷风光无限。40岁一枝花的徐娘。寻觅宽肩厚胸、身体伟岸、不服伟哥也照样雄风四起的猛男。期盼缠绵的亲吻、拥抱。”

5.“热血沸腾的35岁女士。寻求已婚并不打算抛弃家庭与第三者私奔的规矩男士。期盼与之共享美酒和高潮迭起的性爱。互不约束；拒绝海誓山盟的俗套。”

放下报纸，看着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突然有个二十多岁穿了件T恤的小伙子走过，背面写有这样一句：“我的阴茎很短，你不在意吧？”

我会心地笑了。他是写给女人看的。



坐在巴黎街头露天咖啡屋，我经常看到男女拥抱、接吻的情景。我意识到：男女是一个奇妙的十字架。

男女共一把伞，容易像荷叶上的两颗水珠，合而为一。日后它会成为最甜美的回忆之一。其实，男女是很不相同的两种人。比如女人容易流泪，男人则不轻易哭，这便是区别。家庭的本质之一是努力把这些区别统一到一把雨伞的下面，风雨同舟，共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夫妻双双寻找家的感觉。

于是我当场在咖啡座写了一首小诗：

共把伞
才发现伞底下
能够包容差距
当我低下头去吻你
你也踮起脚
双方才感到因配合
带来的空前默契

性爱的实质是两性器官的相互利用。

性交是男女性器官的交叉，构成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会生育子女，所以是神圣的。为什么它见不得人？当有的女人达到性高潮，死命地兴奋狂叫乱喊，男人要用手去捂住她的嘴，怕声音穿透厚墙，因为隔墙有耳。

是的，秦始皇、汉武帝、拿破仑、斯大林和爱因斯坦……统统都是这种十字架的产儿，且无一例外。这还不神圣？

形形色色的男女关系，其实是形态各异的一个个十字架。

2005年5月初，东京地铁为了保护女乘客在拥挤的车厢内免遭某些男乘客的猥亵，特推出了女士专用车厢。据调查，在20~40岁的女性中，差不多有2/3的人说她们在地铁车厢里遭遇过猥亵。（男乘客浑水摸鱼，用手和手臂去碰撞、触摸女人的丰乳和肥臀）

在东京地铁站，我就看到过由警事厅制作的宣传警世画，上面写着：

“摸女人屁股的花痴是犯罪行为。后果是严重的：你的名声扫地，单位不再信任你；影响你的家庭；友人避开你……代价太大，犯得着去摸一下吗？！要三思而行啊，切记！！”

在德国，听说也有此类事件发生。

在北京、上海，这类案件也零零星星地传到我耳朵。在拥挤的车厢，美乳丰臀的女人遇到此事的几率会更大些。女人躲开他，挪个地方，他紧跟不舍。有的女人出于愤怒，用力踩他一脚，他只好哑巴吃黄连。

还有更恶劣的流氓：在拥挤的车厢，掏出阳器，紧贴着女人丰臀，失控地射精，把对方衣裙弄脏弄湿。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东北田间除草。有个村姑臀部非常饱满、发达，在她后面除草的农场工人张某（38岁，已婚）受不了刺激，他的“眼-脑系统”指示他的阳器勃起、射精，这引起了在场人起哄。

亚里士多德说过：“性爱起源于视觉快感。”

用今天脑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性爱起源于人的“眼-脑系统”。

的确，男人喜欢女人的三大件：丰乳、肥臀和美腿，很难抵挡这三大件的联合进攻，恰如女人喜欢男人的宽肩厚胸、伟岸的身材。

不过在车厢里，有女人去主动触摸男人吗？

几乎没有！为什么男女有这种差别——又要归结到男脑和女脑的不同，因为人的各种行为是接受大脑相关部位下达的指令才启动的，脑是司令部。

自古以来，两性问题还涉及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性与政治。比如当今被查处的贪官污吏95%有情妇，贪官为了“性贿赂”而疯狂地去贪，去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是为了去爱她，触摸她，闻她的体香，而不是去分析和理解她。
对于女人，男人的存在，是为了求得他的保护，得到一份安全感；去倾听他的强有力的心跳，
感触他的思维韵律，而不是要求他陪你去挑选连衣裙和唇膏。
至少这是男女神秘关系之一。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男女这个十字架的基础之一。
男女之间的最大误解和悲剧是：
双方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当她需要你紧紧抱住她，你却继续在画你的设计图纸；当他需要你
倒杯茶水，轻声软语地说声“这么晚，还不睡！”你却躺在那里照样看32集电视剧。

敛财。因为无论是找相好、包二奶、养情人，还是带小蜜或是嫖娼狎妓，都需要财大气粗。有些官员认为，如果不趁年轻和大权在握多同几个异性练练床上的功夫便是虚度此生。

再把雄性和雌性这个十字架的视野扩充到生物界吧！

最近我读到一则报道，美国俄勒冈州成了想结婚的同性恋情侣的圣地，其中有个县已经向同性恋伴侣发放了 2400 张结婚证。

同性恋是反自然的吗？

很难说。其实在自然界里猩猩、企鹅和海鸥……也有同性恋倾向。有种猴子从同性恋的行为中获得的快感和高潮，一点也不比从异性恋中差多少。

同性也能构成一个性（Sex）十字架吗？

对性现象，我一直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惊讶！

而哲学起源于惊讶(The Philosophy begins with Wonder)——这正是我打算撰写《性哲学——性的脑科学根源》一书的第一动机。

有一种蜘蛛，在做爱时，雄性最乐意被比自己的体形大100倍的雌蜘蛛活活吃掉，因为这样一来，雄蜘蛛可以留下更多的后代！

这种性行为是很悲壮的。

这一悲壮事件也发生在唯一确定的时间和空间十字架坐标内。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大十字架，也有小十字架。

身与心

身（躯体）与心（精神）既对立又统一，这又是一个十字架。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十字架，且无一例外。

有许许多多次，我的牙痛。我对我的牙说：

“牙呀，求求你了！看在我们相处五六十年的份上，别再痛下去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痛得我坐立不安，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猛烈觉醒到：原来，我的身与心经常是分开的，不是一回事！我的身常常不听我的心（其实是脑）指挥，闹分裂。

因为我的牙还是痛了整整一天才停下来。

这里所说的心其实是脑，人脑才是感情和思维（意志和思想）的器官。

最近我有几位朋友已相继过世，他们在死前深表遗憾，很痛苦，十分不愿，说：

“我多么想再活 20 年啊！”

但他们的身（肉体或躯体）一点也不听心（脑）的话，身心是对立的！身不配合心（脑，或意志）。

我们的心（思维）借宿、寄存在身体（躯体）内，“魂不守舍”这句成语也说明躯体（身）是魂（心或脑）寄宿的房舍。

我们的心常对身不满。

相反的情形没有：身对心不满。

女人不满自己的扁平胸，所以才去做隆胸术。这有很大风险。

我认识一位身高仅一米五八的大学生，但他的心却比天高，大脑发达，很聪明。他很爱漂亮女人，但没有女人会爱他，因为他太矮。他深感身心严重对立、分离的痛苦。

他的床头贴满了性感女人的照片。他经常手淫。手淫的时候，他在想像中全是世界小姐的风情万种。他只能用虚幻世界去代替现实世界。

知道这位大学生的故事，我深深被触动。

身心对立到了这种程度是悲惨的，这是做人的不幸。

这也许是造物主的故意设计。上帝预感到人的身心一旦全面配合相称，统一，力量会太大，会对自己的至尊权威构成挑战。

人心（或脑）有个根本局限：

寄人（身）篱下，心是不独立的。

不错，心（脑）可以指挥左右手去动作，双腿会走路或停在一处不动，但人的身经常不听心（脑）支配。

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很荒诞的。

死亡便是身对心最后说声“不”！

身心的最后分离叫死亡——这是有关死亡的另一个定义。

心拼命拉住身，身还是要走，终于分道扬镳，躯体入土，灵魂归天，十字架散架了。

时间和空间

这才是最大、最壮丽和最宏伟的一个大十字架，所以我把它作为最后一章放在这里来面对，默默地敬而畏之。

在人类漫长而曲折的进化史上，人一旦有了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即说明人脑构造已经发展、进化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阶段。

可以这样说，时间和空间是上帝—宇宙的一双手。它创造一切，同时也毁灭一切——创造和毁灭是同时进行的。高度对称，太对称，原对称。

造物主（上帝—宇宙）用空间和时间搭起了一个十字架状的大舞台，所有的大小事件都发生在该舞台上——世界便是所有这些事件的总和。

比如美国的“9.11”、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和空间都是唯一确定了的。

一、心理学层面

李自强先生和女友刘丽娜最后分手这一失恋事件在他们一生中也是件大事，其时空也是唯一规定了的。那是一段历史，用橡皮头怎么也擦不掉，即便是动用钢锯也割不断。它发生在1970年一个初冬暮霭弥漫的日子，地点在大连海边：

雾起雾散

暮色苍茫

起了雾

我们曾手牵手

踏着林中一条弯曲的小路

后面的涛声已远去

我突然发冷

预感到 前头有

无法排除的

分离 和
孤独

雾渐渐散去
已是我大半生

秋风 秋雨
淅沥 绵绵
环顾四周
尽是茫然

斜对着昔日的海边
有一丘黄土 堆成的墓

原是一个无法穿透的
神秘符号
一种千年的悲伤
一种万年的惆怅
也是一种逻辑必然的

归宿

时间有许多特性，其中一个：它只能向前推进，从不回头。时间是一个有箭头的、不可逆的物理量。

比如：

过去→现在→将来

绝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条逆向链：将来→现在→过去

时间不能像录像带那样倒放。

幸好，造物主给了人一种回忆的能力，借助于回忆，人可以同过去的往事相见。于是我又写下一首小诗：

回忆

传说——

回忆是个魔瓶
你只要把口子拧开
冒出一缕青烟
过去的往事
无忧无虑的童年
外婆门前那口古井
母亲的纺纱机房
那盏忽明忽暗的豆油灯
还有深巷柴门的犬吠
便会个个自告奋勇
一一跳出来
同你重逢 相见

动物有回忆吗？估计没有。

于是回忆成了人从事艺术创作的动机之一，回忆就是把时间箭头倒转过来：

“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陶潜《还旧居》）

电影《城南旧事》是我喜欢的一部片子，因为我在北京西郊海淀住过多年，里面许多镜头能勾起我的好些回忆。

那么，时间是什么？

也许胡同口的刘嫂和田大爷会说：

“唉，你别拿这个孩子都知道的问题来气我、难我了！时间不就是看表吗？一秒一秒，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

的确，那是时间。处处都是时间，时时都有空间。

不过，手表的秒针、分针和时针在向前走动，并发出滴答的响声，那只是时间的现象或影子，不是时间本身或本质。这就好比我们无法揭开手表，永远也看不见机器（包括发条和大小齿轮）的运作及其动力学的机理。

是的，我们只能看到时间各种各样纷然杂陈的现象，比如：

“重到曾游处，多非旧主人。”（唐诗）

“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唐诗）

这些诗句把时间流逝现象刻画得多生动！

翻开你的影集吧！跟你30年前的小学同窗在母校相聚一次吧！你便会



木屋里面的壁炉。木柴在燃烧时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给人平安、康泰和舒适的感觉。这是来自农业文明时代的平稳节奏和悠缓声音，富有诗意。哪里有诗意，哪里便有家（Home）的自在自如自由感觉。

若是屋里改用电炉和空调呢？诗意便会消失。所以农业文明的诗意较多，工业文明的诗意较少。工业文明把追求马力和速度的增长看得高于一切，于是诗意横遭破坏。也许木柴在寒冬之夜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最能催人拧开回忆的魔瓶，教你沉思前事，柳边深巷，露桥闻笛……

哲学的时间和物理学的时间离我们这些普通人毕竟太远，太远，心理时间（文学艺术或诗意的时间）离我们才很近，很贴心。

发现时间明显的踪迹。

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是时间的表象或影子。

至于究竟什么是时间，以及时间的本质，我却回答不上来。中世纪西方著名宗教思想家奥古斯丁（354～430年）有句名言：

关于时间，你不追问我，我非常清楚；你若追问我，我反而糊涂了！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尴尬处境。

二、哲学层面

看来时间里头有深不可测、妙不可言的大学问！

的确，我们自以为司空见惯、最为熟悉的事物，原来是我们最不了解、最陌生、最叫我们茫然和困惑的东西。如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为什么会死，死是什么；光究竟是什么；时间和空间究竟是什么……

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在西方学术界很有名。

比如有人问：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干什么？（问得多到位啊！）

奥古斯丁给时间下了一个定义：

时间是运动的度量，时间是我们观察运动的先决条件。物体在时间中移动，而不是相反。“当时间流逝的时候，它可以被知觉和度量。”

我们在运动中知觉时间。当我们看到物体在运动（比如星移斗转，月圆月缺，春去秋来），便有了时间的概念。“正是在我的心灵里，我度量时间……流逝的事物留给心灵的印象之持续，是我对现在时间的度量；时间的度量不是流逝的事物，而是它们造成的印象。”

这里所说的印象是指知觉和感知状态。

青年时代的我，读到上述思考，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只好习惯性地独自一人跑到圆明园的荒野、废墟中去消化、琢磨。

我开始觉察出了时间的微妙和复杂。

所以，万事万物一旦拿到哲学思考的面前便会发生很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原先看似简单、一目了然的东西会变得非常复杂，迷雾一团；

原先看似错综复杂、纷然杂陈的万千现象会变得非常简洁，统一，秩序井然——这叫一一穿组，收拾。

上面奥古斯丁的定义按性质和类型是主观心理上的时间。

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中国小说里常有这样的句子：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

可见，同是一个人，由于心境不同，同一长短的时间会发生改变。看来用心理、心灵（或知觉、感知）去度量时间是很不可靠的！

8月，你从海上乘船由大连去宁波觉得很无聊，时间过得很慢；10月，你从宁波返回大连。一上船，便在下铺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子，你们是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时候，你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奥古斯丁特别看重现在，紧紧握住现在。

这位深刻的、深思明辨的基督教思想家把存在跟对它的知觉等同起来。凡是不能被知觉到的时间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说：

“过去的时间已不复存在，将来的时间尚未存在。谁能去度量它们呢？除非有人敢说，他能够度量不存在的东西。”

奥古斯丁站在纯哲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的立场强调任何时间都是可以度量的。

他不承认有三种时间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

他只承认“现在”：

过去只是过去的现在，将来只是将来的现在。

我也可以说，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将来是现在的将来。

一切时间都可以归结为“现在”。

我以为这样的人生处世态度很进取，积极。

啊，上帝，那就让我紧紧抓住、过好今天吧！生命于我只有今天一天。昨天已过去，明天尚未到来。

不过，佛教哲学对三种时间却是悲观的：

“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心地观经》）

这是彻底的悲观：过去已经消逝，未来尚未到来，现在又不停留。

说得很到位，也很哲学，是对时间作出哲学的理解和把握。

对时空的本质，佛教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妙得很，玄得很，也深得很！

比如《五灯会元》有言：“人间四百年，彼天为一昼夜”——这种看时间的视野很有些广义相对论和当代天文学或宇宙学的味道。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五灯会元》又说：

“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辰。”

意谓：你们被时间驱使，我却能驾驭时间。

说得多么好啊！让我们向老僧学习！主动驾驭一天 24 小时，即是驾驭生命。

上面从心理学和哲学给时间下了定义。那么物理学家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毕竟有三种时间：心理学的时间，哲学的时间，物理学的时间。

那么，究竟哪个是真正的时间？

你看，问题又来了。

哲学的追问和所探究的对象永远是一些难以说得一清二楚的问题。哲学家眼里永远没有黑白分明的事物。真理和谬论、祸与福、善和恶……总是纠缠在一起。

先说几句空间。

我几乎每天买菜，菜场里有家小饭馆。有时中午我懒得做，就在那里吃盒饭，五元两荤一素。去年 8 月，听说整个菜场（包括小饭馆）要拆，建住宅区。10 月，我路过原菜场，那里已是一大片空地，堆着不少建材垃圾，我突然发觉：

菜场原先很大、很高、相当简陋的三维（长宽高）建筑空间消失了！但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还原为自然空间。

所谓建筑，就是人用建材从自然空间围隔出一个实用的人造空间，用来收容、安顿人的身心，成为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安乐窝。

人可以创造和消灭各式各样的建筑空间，但不能创造、消灭自然空间。一点也不能，半个立方米也不能！

那么，空间是什么？

我国战国末期尸子有个绝好的定义：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这个定义之所以妙不可言，我想有如下四点：

1. 这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祖先第一次把空间和时间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而且对称，共十二个汉字。这里有对称结构之美，气魄很大，到了极至。

就哲学高度和境界而言，它跟古希腊哲学处在同一个层面，为世界顶级。

2. 西方人不懂汉语，尸子的定义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晓。“宇宙”这个术语是独一无二的，它把空间时间都包容了进来，西方文字却没有相应的词。英文的 COSMOS（宇宙）是这样解释的：

把所有的空间看成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体系。

The universe（宇宙）：把一切存在的物（包括星系、地球）统统包容在

空间里。

英文这两个词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时间包括进去，只有“宇”这个汉字，少了“宙”。

3. 日本学者懂汉字、汉语，所以特别推崇尸子有关“宇宙”的定义。不少天文学家在他们专著的开头，必引用尸子的这个最具有概括力的命题。

在我眼里，佛教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流派，或叫宗教哲学，哲学宗教。它把宇宙时间空间作为思考对象。

它把人放在时空这个大框架下来思量。

它把宇宙时空看成是一座大监狱的高高围墙，企图从思想、观念上去冲破这厚墙，于是便产生了佛教哲学。它经常发表有关时空方面的看法，恰如奥古斯丁的沉思——东西方不同宗教哲学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悲壮景色给了我难忘印象。比如：

佛教哲学是这样看时间空间的：♪“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流数有三，方位有十。”（《楞严经》卷四）

意谓：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动、流逝，世界万事万物都在空间、方位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三段时间，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为十方。

农业文明时代的人对时空有这样较深层次的认识，不容易。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看出了更为玄妙的一层含义：

“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各有过去，未来及现在，即为九世。”

意谓：过去未来现在这三段时间各有自己的过去未来现在，三三得九，便是九时。

很深刻的哲学领悟！

《杂集论》从因果关联角度给时间下定义：

“时者谓因果相续流转，假立为时。”

意指所谓时间只是由具有因果关联的事物在相继不断地消失和产生的过程中而假定的一种“时间”概念。

这里把“时间”看成是一种工作假设，而且把它同万事万物的因果关联（事件）过程联系起来——很到位，很深刻！

比如一部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其中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是一连串因果关联的政权更替过程的复杂事件。比如因为明王朝腐败，所以才有清军入关，建立清政权——这是一个因果关联事件。

所有这些因果关联大小事件的总和便是中国的过去。

4. 李白是我最推崇的一位具有哲学气质的大诗人，他是这样理解时空的：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天地即空间；光阴即时间。

尸子有关宇宙的定义完全是个空筐。李白则把万物之逆旅和百代之过客的丰富、生动事件放进了空筐，有了内容，有血有肉。很好，更打动人。

“逆”字说明旅途艰难、险阻，决不是旅途风光一派大好，或旅途愉快。“过客”说明生命短暂，匆匆来，又匆匆去。

三、物理学（宇宙学）层面

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屋半明半暗的一处角落，我便会感到时间是最微妙的一种物理量。有则为某咖啡品牌做广告的广告语说：“品味时间。”

这句广告语写得很好，时间什么味道都没有但又什么味道（酸、甜、苦、辣）都尽在其中。

相对于中午，早上已是过去，已是历史，我们无法再回到逝去的早上。相对于下午，中午是历史，是过去。时间的箭头是不回头的！

桌上一个玻璃杯子摔在地上，碎了，成了上百块的碎片。但它永远不会自动地重新跳回到桌上，组合成原先那个完好的杯子——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精髓。我觉得，上帝（造物主）便隐隐约约伫立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后面。

1929年，爱因斯坦为《英国百科全书》撰写了“空间—时间”这个条目。一开头，他便说：

“相对论引起了空间和时间的科学概念的根本改变。用明可夫斯基的名言来说就是：‘从今以后，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都已成为阴影。只有两者的结合才保持了独立的存在。’这种结合叫做‘时间—空间’……”

在这里，我想先谈谈牛顿的时间观和爱因斯坦的时间观。

敏锐的、深思明辨的天才牛顿确认并坚信：时间是绝对的，真实的，而且具有纯粹数学空筐的性质。它同任何物体没有关系，永远在均匀地（不慌不忙、不快不慢地）流逝……

用“时间之河”这种说法是很高明、贴切的。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也这样感叹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站在河的上游对弟子说：过去的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都在流逝！



这是我在德国拍摄到的一座坟墓。

死者是个婴儿，叫罗宾，生于1998年6月27日，夭折于1999年4月28日，还不到1岁，上帝开了他一个大玩笑。他这个“小过客”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久久站在墓碑面前，猛然觉悟到了一个定义：人生之旅是由时间和空间规定的了。



夫妻合葬墓。生卒年月日写得清清楚楚。德国人的时间观念很强。

我们的坟墓则不。大多数墓碑把死者的生卒年月日写得很含糊。有的只写“二〇〇〇年立”，立是指建立这块墓碑的时间。也许死者卒于1988年，由别处迁来，再在这里立此碑。人出生和去世都是事件。

一切事件均发生在时空中。

孔子说这话带着感情色彩。有人说他悲观——因为时间永不回头，人生也永不回头；有人说他乐观，鼓励学生像一个个向前推进的浪头去不断进取，永远向前！

不过牛顿在思考时间本质的时候估计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因为他是个物理学家。冷静、客观是他的灵魂状态。如果有什么心境，那只能是对造物主的敬畏。

牛顿有关时间的本质观点，可以从他的力学推导出来，也促进了经典（牛顿）力学的形成。

在牛顿的心目中，时间只有长度这一性质，此外没有其他性质。宇宙中的一切戏剧性事件都在不变的时间和不变的空间中展开。

在牛顿的世界图景中，“现在”、“以前”和“以后”的概念是绝对明白无误的。

然而对上述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时空假定或框架，第一次打击正是来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时间之河并不像先前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比如时间之流逝与物体的运动便大有关系。

观察者相对物体运动得越快，时间的流逝便越慢。（今天基本粒子实验已经测量到了这一事实）

所以时间并不是看上去不变的。

时间也不是先前所说的是统一的，绝对的。

时间之河不是处处平稳、均匀、缓缓地在流动，在有些地方它是湍流，是奔腾，在另一些地方它又是缓若细流，潺潺地，不慌不忙……

事实上，引力场会影响时间流逝的速度。

在较强的引力场中，时空还会弯曲——这就是引力场的时空结构弯曲特性。

所以相对论是这样一种物理理论：它的基础是把运动、空间和时间这三个概念联系起来，进行统一、通盘地考量和解释。

相对论是力图摆脱小我、自我，消除人类的感觉和知觉，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靠的。相对论的成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相对化和客观化——这是奥古斯丁和牛顿不曾想到的！

牛顿力学里的一维时间和三维（欧氏几何）空间是彼此分离、各自孤立的。

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宇宙时空结构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

比如：

1. 许多年前我便关注 CPT 对称。其中 C 涉及电荷，涉及物质和反物质；P 为空间性质的宇称；T 为时间方向。所以 CPT 又叫“电荷—宇称—时间”不变量^①。

2. 初冬之夜，我会问：宇宙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

宇宙时间和空间是在一瞬间突然产生的。

有一种理论说：空间和时间是永恒的，物质不是^②。

宇宙时间有起始的第一时刻吗？时间会向前延伸至永远吗？

时间和空间是紧密纠结、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经纬线织成的一条地毯。

3. 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人类一直在争论下去，探索下去。这取决于时空的几何结构，即时空曲率。不外乎三种情况：正数、零或负数。

爱因斯坦相对论包括了这三种可能性。他本人偏向认为宇宙时空曲率为正数，即宇宙是有限的。

4. 2005 年是铯原子钟诞生 50 周年。

《Scientific American》1957 年第 2 期发表了 H. Cyons 的论文《原子钟》(Atomic Clocks)，值得一读。

有一点是肯定的：地球的自转不是一个理想的时钟。

铯原子钟是英国人研制出来的，其准确率是 300 年内只有一秒的出入。

今天，日本人制造了一种超级精确的钟，精确度达到百亿亿分之一秒。就是说，假设该时钟是在宇宙诞生那一刻（即 137 亿年前）开始滴答行走的，那么，它走到目前为止，误差仅为半秒！（啊，当代的科学技术水平！）

5. 如此超精确的原子钟有助于我们研究量子论和相对论的自然哲学基础，逼近时间的本质。

当代宇宙学有这样一个高深度的课题：

时空有量子吗？它的尺度是多少？

这一章就此搁笔，再往下讨论便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总之，时空对称结构才是宇宙第一个十字架，原(元)十字架，太十字架。万事万物都从这个十字架导出。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

“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事件都是由空间坐标 x ， y ， z 和时间坐标 t 来确

^①S.W.Hawking, R.Penrose“时空的本质”，载《Scientific American》，1996 年 7 月。

^②P.Davies“时间的起始”，载《New Scientist》，1996 年 4 月 19 日。



德国哥丁根小城伟大数学家黎曼住过的屋，今天成了名人故居。我把它拍下来出于以下原因：

1. 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探索宇宙时空结构时，用上了非常抽象的数学工具——黎曼几何（如黎曼曲率）。
2. 黎曼在这栋屋住了三年（1854~1857年）。九年后，他去世。人的一生是同时空打交道的一生。屋空间归根到底是自然空间，建筑空间的层次比自然空间低，且低得多。

定的。”

有人把这四维(x, y, z, t)看成是一座大监狱的高高围墙，谁也冲不出去。
我看也是，我的感觉经常告诉我这一点。

我们要把牢底坐穿。

最后，作为本章结语，我想借用中国哲学的命题和思路说几句：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

我说：道生一，一生时间空间，构成一个十字架状的大舞台，万事万物登台演好自己的角色。

万事万物都是成对出现的，只有太极是单独的，唯一的，绝对的。所以宋代朱子说：

“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

又说：

“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

“太极者，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到这里更没去处，理之极至者也。”

我受到启发，于是写出下面两个命题：

1. 太极——时间空间

2. 道和太极这两个中国哲学概念气魄特大，但毕竟太空洞。如果用当代科学成就去填充，便近乎十全十美了。所以东西方文明各有长处，理应互补，才健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理应构筑成一个伟大的十字架。

我敬畏，故我在

——结语

我相信，读者到此已经明白，本书借用的“十字架”这个符号原是“对立统一法则”。于是我在这里写下了几行诗：

有则古老的童话说——
时空是张无形的大网
你我他（她）只是网中的小鱼虾
挣扎在网中的我们
又是哭来又是笑
又是蹦来又是跳

时间到了
无奈的鱼虾
只好心怀敬畏
默默地眺望
霞光万道
夕阳西下

2005年秋冬之交最后定稿于上海浦东十字架书房